

# 中國共產黨內幕

李紹忠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之二

1945



# 中國共產黨內幕目錄

- 一、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 一
- 二、國共第一次合作 ..... 五
- 三、國共兩黨合作的經緯 ..... 八
- 四、革命的進展與國共分裂 ..... 十二
- 五、八七會議以後的暴動政策 ..... 十六
- 六、六大會與陳獨秀的除名 ..... 一九
- 七、李立三路線的清算 ..... 二二
- 八、蘇維埃政權的樹立 ..... 二十四
- 九、五次圍剿與「二萬五千里長征」 ..... 二七
- 十、中國共產黨的新方略 ..... 三一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35 6915B



516608

十一、西安事變前後.....

三二九

十二、中日事變爆發以後.....

三四〇

十三、事變後中共軍全貌.....

四四一

十四、新民主主義・三三制・三風肅正運動.....

六〇六

十五、一對左傾的美國夫婦筆下的西北特區.....

六八一

十六、渝共摩擦的演變.....

八七一

十七、渝共談判破裂的經過.....

一一一

十八、中共對付國民黨的新策略.....

一六一

十九、中國共產黨法規全文.....

一七〇

二十、最近的中共與蘇聯.....

一七七

二十一、赤都點滴.....

一八一

二十二、延安的窮途.....

一九八

二十三、後記.....

二〇九

#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

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之春，蘇聯派遣第三國際遠東部長威金斯基來華，在北京與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會見。當時正當五四運動（一九一九年）發生以後，中國國內以對外打倒帝國主義對內打倒軍閥為目標的國民運動蓬勃一時之際，蘇聯因注目中國大局之變動，企圖實施東方赤化政策，乃有派遣威金斯基來華之舉。

李大釗氏當時任北京大學教授，並兼該校圖書館長之職，正致力組織一馬克斯主義研究會、專心於馬克斯經濟學的研究。威金斯基授意李氏，囑在中國著手共產黨之組織，李氏乃推薦陳獨秀氏作為中心人物。陳獨秀原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提倡白話文運動，在學生大眾羣中，乃一風頭極健的社會主義者。一九一九年四月陳氏被北京大學當局所逐，南下暫居上海。威金斯基於一九二〇年七月由北京往上海，在某處和陳獨秀會見。威陳會見的結果，已相互交換關於組織中國共產黨的具體意見。同年九月在上海法租界霞飛路漁洋里二號（陳宅）舉行了一次關於成立中國共產黨的會談。出席會談的，有陳獨秀，張東蓀，李漢俊，陳望道，戴季陶，施存統，俞秀松，沈玄廬，楊明齊等十數人。此實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大會——創立準備會。不過此次會談，並未決定政綱，也無宣言發表，僅不過是一種俱樂部方式的存在吧了。（至同年末黨員已逐次增至七十人左右）。當時工作的目

標有二：（一）在國內的運動，以勞動組合之組織及獲得勞動者為主。（二）派遣留俄學生，以設立俄文學校為前提。前者由張國燾負責，從事組織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地址——上海公共租界南成都路十九號）；後者以楊明齊為校長，在上海設立俄文學校。

在上海中國共產黨組織之同時，李大釗氏在北京，也以馬克斯主義研究會為中心，逐漸展開共產黨組織之俱樂部性質的工作。同時十月，陳獨秀前赴廣東，因汪精衛先生之推薦，擔任廣東全省教育會委員長，陳乃利用職位，努力強化共產黨組織的擴大。結果有陳公博、譚平山的入黨。譚平山在當時與李大釗氏，有「北李南譚」之稱，廣東共產黨的組織，由於譚之活動，漸次擴張。在工商業中心地的上海，政治及大學中樞的北京，中國革命發祥地的廣東——三地共產黨工作活潑進展相前後，乘馬克斯主義世界流行的浪潮，在巴黎的中國留學生之間，也開始了共產黨俱樂部的組織，同時在國內漢口及長沙等地，也先後成立了共產主義者的俱樂部性質之組織。總觀當時組織運動的大勢，在北京專圖學生大眾的獲得，而在上海則重在向勞動者及學生羣中進行活動。

一九二一年五月，在上海法租界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一全大會），除討論黨綱草案外，並決定黨的指導部之中央委員會的組織。一全大會有下列各地代表出席：廣東代表——陳公博、包惠僧、上海代表——李漢俊、李達、北京代表——張國燾、劉仁靜、武漢代表——董必武、陳潭秋、長沙代表——毛澤東、何叔衡、留日代表——周佛海。並有第三國際代表威金斯基、馬林列席。當時因陳獨秀遠在廣東，不克來滬出席，大

會乃將黨綱草案送請審議。惟黨綱並未對外發表，僅以草案保留，因黨的中心人物陳獨秀未能參加之故。此次大會討論結果，決定：（一）黨的名稱爲中國共產黨。（二）黨的活動根據共產主義的原則。（三）最高目標爲普羅列塔利亞（無產階級）的組織及在黨的指導之下，掌握政權。關於第三項掌握政權問題討論之際，日後脫離共產黨之陳公博、李漢俊二氏，曾提出爭辯。其根本意見的分歧點，乃在普羅列塔利亞（無產階級）革命，抑爲布爾喬亞（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問題。

一全大會具體的決定，有左列委員之選舉及黨機關刊物的舉辦。後者除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作爲黨的外圍機關雜誌外，並新刊行「共產黨月刊」一種。

委員長——陳獨秀

副委員長——周佛海

宣傳部主任——李達

組織部主任——張國燾

農民部主任——譚平山

職工部主任——陳獨秀（兼）

與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有連帶關係的，即爲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成立。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實爲中國共產黨的補助團體，於一九二〇年八月，在上海成立，最初稱爲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此一組織，以改造社會爲目的，由八名之青年社會主義者（陳獨秀、俞秀松

、楊明齊等）所組織。團員之中，有馬克斯主義者，有無政府主義者，有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有勞動共產主義者，因此在思想意見上不能一致。除派遣張太雷爲代表出席莫斯科之青年共產主義國際外，復以上海工讀互助團爲中堅，積極吸收團員，展開活動。然而由於思想上的對立，失去統制的中心，遂於一九二一年五月，依據陳獨秀的意見，將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加以解散。及至張太雷受命爲青年共產主義國際中國支部組織由莫斯科歸來後，於同年十一月復活再建組織，再組織宣言發表後不及一年，於全國主要都市已成立有十七個支部。翌年一九二二年五月，在廣東召開一全大會，決定團的綱領，在加入青年共產主義國際之旗幟下，確立與西歐普羅列塔利亞青年及東方被壓迫青年大衆提攜之決議，決定團之策略及目的。綱領的要旨是團爲中國青年無產階級的組織，從事於無產階級的完全解放運動爲奮鬥目標。換言之，即一切生產工具歸於公有，不勞動者不得生存，以建設初期共產主義社會爲目的。同時並謀青年勞動者及農民生活狀態的改善，青年婦女及學生利益的爭取，地方青年革命精神的涵養，一般無產階級解放運動的努力。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及其再建，指導無產青年運動，實爲中國共產黨的一個補助機關，於一九二五年三全大會，始決議改稱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 國共第一次合作

中國共產黨的公開活動，實始於一九二三年七月在廣東召開的二全大會。當時國內正當軍閥鬥爭（奉直戰）開始，香港海員發生大罷工，學生大眾展開非基督教運動等，整個社會情勢正處在激變之中，加之，中國共產黨自身經歷了豐富的經驗與訓練，獲得尖銳精幹的鬥爭幹部，已充實了向達成社會革命突進的基礎。

二全大會所通過的宣言，已顯示中國共產黨當前的主張與戰術：（一）在國際帝國主義搾取下的中國，（二）中國政治經濟的現狀與被壓迫勞苦大眾的苦境，以及（三）中國共產黨的任務與當前的奮鬥，「……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其目的在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鬥爭的手段，建立勞農獨裁政治，剷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到達共產主義社會。中國共產黨，謀致勞動者及貧農的利益，領導彼等協助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且聯合勞動者，貧農及小資產階級，結成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宣言並舉出七項具體的目標。此項宣言，所謂共產黨政策之公式的說明，其目標的主旨，在打倒軍閥，推翻帝國主義，罷工自由，勞動立法等等，由此，通過了二全大會，中國共產黨已由俱樂部性質的活動，轉向於政治鬥爭——勞動者及農民階級之指導。特別於勞動者與貧農的提攜，學生指導的開始，勞動者的組織等等，中國共產黨獲得了相當的成果，同時更進一步，開始關心於農民運

動的展開。

二全大會宣言內容，一與在四個月後（一九二二年十一月）發表的孫中山先生之國民黨新政綱相對比，頗多類似之點。此實為研究當時國共兩黨關係重要資料。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於二全大會後之杭州會議（八月）中，決議與國民黨聯合，陳獨秀、李大釗以個人的資格加入國民黨，此即二全大會宣言中所示「……聯合勞動者，貧農及小資產階級結成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不過此種所謂革命的統一戰線之參加，實際上乃係出於第三國際的指示的。

二全大會之先，同年五月一日至五日，在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指導之下，於廣東會召開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為全國各派勞動組合代表者的第一次會合。決議了第二次大會召集及加入國際社會主義同盟問題，並中央集權的全國勞動組合之統一機關，即全國總工會的組織準備。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所採用的口號：（一）打倒帝國主義，（二）打倒軍閥，（三）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此實表示中國共產黨當時的工作目標。

二全大會之後，一九二二年八月，有平漢鐵路工人罷工的勝利，十月有開灤煤礦的罷工風潮，一九二三年二月，以全國鐵路總工會的成立為契機，發生了平漢鐵路員工的總罷工（二七事件），此實中國勞動運動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頁。同時由於收回旅大（旅順，大連）運動，臨城事件的發生等等，昂揚了反帝國主義運動的情緒，中國共產黨乃急激擴大勞動者的組織（當時僅上海一地，約有三十個獨立的勞動組合，而有組織的勞動者在全

國約有十五萬人以上），發展政治的鬥爭，同時進行民衆運動的擴大，青年鬥士的組織，中共的力量乃大為擴大強化起來。全國勞動運動的成長，罷工風潮澎湃一時，當時因吳佩孚對平漢鐵路總罷工風潮實施武力彈壓，風潮雖告低落，而「打倒軍閥」的口號已由一般勞動者而普遍於全國民衆之中矣。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國共產黨在廣東召開了三全大會，決定了十八項目說明「中國共產黨的任務」之「黨綱」，作為其政治方針的基礎。該黨綱的骨幹，為排除帝國主義、打倒軍閥，並明示與國民黨合作的態度。然而國共合作的公約，在一九二四年一月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始行具體化。

# 國共兩黨合作的經緯

第三國際注目中國共產黨的進展，在達成社會革命的觀點上看來，想以中國共產黨單獨的力量獲得成功，頗為無望，故指示中共在打倒帝國主義的共同戰線之立場，與國民黨提攜合作，以擴張勢力。因此有馬林之訪問 中山先生（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以及孫越（越飛）共同宣言的發表。

當時，中國國民黨總理 孫先生因遭陳炯明的叛變，暫居上海。曾授命廖仲愷同志，往日本熱海與第三國際代表越飛會見，進行國共合作及中蘇提攜的具體折衝。

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國國民黨召開一全大會（廣東），發表「聯俄、容共、勞農」三大政策，承認中國共產黨員得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自此，共產黨員陸續請求加入國民黨，李大釗、譚平山、于樹德、並曾被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甚至譚平山被任為組織部長，林祖涵被任為農民部長。

容共後的中國國民黨，由於共產黨人的加入增多，逐步採用蘇聯制度之委員制度，從事中央及地方的各級黨部的組織，組織部長譚平山的活動，向勞動者，農民、商人、青年、婦女各階層進行組織工作，大眾運動的進展，有非常活躍的成績。一九二三年十二月鮑羅庭來粵，就任中山先生之最高政治顧問，對國民黨內共產黨員指示工作方針，掌握了一

九二四年七月在廣東組織的國民政府之實權。鮑羅庭的政治工作，加龍（其後會任蘇聯遠東軍司令官）將軍的軍事工作，均非單純的蘇聯派遣之「顧問」，而實掌握國民黨全部的指導，組織與訓練之權。

國共合作後的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的覆面之下，專致力於勞動者及農民羣衆的吸收工作，自上海總工會組織以後，逐次成立了海員總工會，全國鐵路總工會的組織。一九二五年二月引起上海紡織業的罷工，四月波及青島的紡織工場，五月在上海發生了五卅事件，打倒帝國主義的呼聲一時遍及全國，六月的廣東沙基事件伴隨而至，排外運動乃如燎原之火，無有底止，特別以英帝國主義為標的。五卅事件，實為中國革命昂揚的端緒，此次排外運動。在上海參加的罷業勞動者在五十萬人以上，全國有二百萬人之多，完全受中國共產黨（以李立三為中心）之指導，此給與經濟界的影響極大。

國共合作一年之後，一九二五年一月，中國共產黨又召開了四全大會，接著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也召開了三全大會，正式改稱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成為名實相符的中國共產黨的外圍團體。中共四全大會中，通過「關於民族革命運動之決議」，展開完成中國共產黨之民族革命的理論。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三全大會中，關於學生運動的決議，指出學生階級為全國勞農大眾的指導者。同年五月，為決定對國民黨二期全國大會的態度，中國共產黨舉行了一次中央政治局的臨時會議，同時在廣東，召開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並成立廣東全省農民協會。第二次全國勞動者大會的結果，有五十四萬的加盟勞動者，統一

了一五六個勞動組合。五月十八日，在廣東完成了全國總工會的組織，同時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因任務終了而行解消，沙基事件後廣東對英罷工的指導者蘇兆徵氏（其後曾任武漢政府勞工部長）被任爲總工會的主席。

國共合作後，因共產黨與左翼派的合作，國民黨逐漸左傾化，右翼份子，尤其是一般同盟會以來的老國民黨員，早已表示反對的態度。然而在中山先生在世時，此種內訌，尙未具體的表面化。一九二五年三月，孫先生逝世於北京，左右二派的傾軋，即行爆發。八月曾擔任與越飛交涉的親蘇派巨子廖仲愷於廣東遭受暗殺。十二月，右派份子在北京郊外西山會合，決議：（一）排除國民黨內之共產黨員，（二）解雇蘇聯顧問。公然表示對共產黨的反對態度。

然而翌年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左派及共產黨員的領導之下，召開了第二次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對國共合作的基底，反形加深一層，此在二全大會宣言的辭句中，已有明白的表示。在此次二全大會中，黃埔軍官學校校長蔣介石氏，就任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初次輝煌登場，掌握軍權。蔣介石氏因三月二十日的中山艦事件正對左派加以彈壓，由此事件，國民黨內的左派勢力大爲減退；更因五月的黨務整理案，共產黨的勢力，自國共合作後，開始受了第一次的抑制。在中國國民黨準備北伐的當時，客觀情勢已相當有利，蔣介石乃排除共產黨側的反對論調，於一九二六年五月毅然進軍北伐。國民革命軍急速展開北伐以後，得到預期以上的成功。在北伐的過程中，共產黨員的工作，以宣傳及煽動工作

爲主，也得到劃期的發展。北伐斷行當初持反對態度的共產黨員，鑒於其後國民革命軍軍事的意外進展，也放棄了反對態度，而以全力推進前衛的煽動工作，此爲國共兩黨再度緊密連絡的成功。

以蔣介石將軍爲總司令的國民革命軍，於一九二六年五月由廣東誓師出發；七月，進擊湖南。九月，攻陷漢陽；十月，青天白日旗飄揚於武昌城頭；十一月初旬，九江城破，孫傳芳敗退，揚子江沿岸諸省，乃先後歸於國民政府支配之下。

# 革命的進展與國共分裂

一九二六年未，揚子江流域諸省，先後歸於國民政府支配之下，政府各機關，以及國共兩黨的組織，都先後由廣東遷來武漢，武漢一時成了中國革命的源泉地。一九二七年一月，以中國共產黨指導下的工人刺察隊為主力，強力收回了漢口英租界，接着九江英租界也為暴徒占領。上海方面，勞動者階級三次發動總罷工，誘發國民革命軍的進攻上海。三月末，國民革命完全占領江南地帶。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以來，能於極短時日之內，將揚子江沿岸一帶完全控制，此固由國民革命軍的素質，比較從來的中國軍隊為優良，而最大原因，實不得不歸功於共產黨宣傳工作的效果。跟着北伐進軍的順利，上海的勞動者階級以上海總工會為中心，展開政治的罷工風潮，也得到驚異的勝利；湖南省的農民運動，在農村發出打倒土豪劣紳，沒收地主土地的口號，也日益激化。此種工作都由中國共產黨員所操縱，而其幕後，則受第三國際於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第七次會議「關於中國問題之決議」的指示：「建立勞動者，農民被壓迫階級的民主的獨裁制。」

基於北伐軍事工作劃期的進展，勞動運動的激化，一九二七年三月，在武漢召開了國民黨的三中全會（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略稱），左派份子占了絕對多數，因有對軍權掌握者蔣介石權力抑壓的諸項決議。

蔣介石氏，因鑑於此種「武漢赤化」的形勢，乃決意對左派份子實行彈壓。先於四月十二日於上海發動清黨「苦迭打」，襲擊上海總工會本部，解除工人糾察隊的武裝，逮捕槍殺共黨幹部，同月十五日李濟深在廣東也發動了清黨「苦迭打」。將江南要衝上海與南京完全收於掌握中的蔣介石氏，乃於四月十八日，以武漢政府移轉的形式，奠都國民政府於南京，結納中間派及右翼派，立於排擊共產黨之前陣。南京政府財政的支持，有浙江財閥爲後盾。以上海「苦迭打」爲契機，南京政府與武漢政府的對立抗爭，日益激化。

在南京與武漢的對立過程中，武漢政府治下，舉行了汎太平洋勞働組合會議，第四次全國勞働大會，中國共產黨五全大會，五月節的祝賀，勞働者的示威運動等等，莫不盡盛大熱烈之能事。然而自蔣介石的清黨「苦迭打」以來，共產黨的工作，不得不局限於湖北湖南二省，同時對於農業政策的改變，努力難局的打開，中國共產黨五全大會中，檢討農業問題綱領，發生了陳獨秀，譚平山一派與李立三，向忠發，瞿秋白一派意見的對立，表現了機會主義的綱領。更因湖南省內農民與地主鬥爭的激化，——沒收土地，懲罰土豪劣紳等等，惹起了共產黨勢力與軍人領袖的抗爭，釀成農民出身的兵士之反感，因而爆發了五月二十一日的長沙馬夜事件。此實與農民鬥爭激化的結果，地主階級之代辯者長沙許克祥軍，實行對農民協會及其他勞農團體的「苦迭打」，即武漢政府的唐生智軍也明白表示出反共產黨的態度，因此武漢政府內部反共產黨的傾向漸次抬頭，六月一日乃有罷免鮑羅庭以下全部蘇聯顧問的決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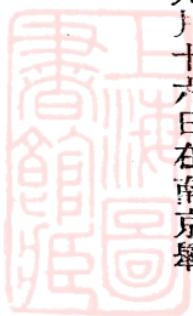
第三國際，爲應付此種逼迫的情勢，乃有所謂五月決議，主張勞動運動的徹底，基於此項決議，於六月初旬，拍發指示農民武裝的密電致當時留在漢口的羅易（印度共產黨領袖），密電指示要旨爲：（一）急速實行土地國有，（二）着手共產黨員及勞動者，農民七萬人之武裝組織。對武漢形勢的變化與國民黨左派的本質認識不足的羅易，其活動結果，反而招致了汪精衛先生實行國共分離的決意，六月二十三日，汪先生發出「國民革命的領導權在國民黨」的宣言，於七月九日舉行的中委擴大會議中，強硬主張對左派及共產黨實行國共分離。

於是，七月十三日，共產黨員譚平山、蘇兆徵、向忠發等發表「對時局宣言」，「退出國民政府書」，脫離武漢政府，而依然根據第三國際的指示，謀隱身在國民黨內，徐圖後舉，汪先生等乃暴露第三國際的密電，企圖農民的武裝組織與暴動，更於八月五日頒佈取締共產黨的命令，八日更發出逮捕中國共產黨的命令。至此，國共兩黨的關係，乃完全宣告決裂。

武漢政府反共的結果，鮑羅庭於七月末由漢口出發，經由陸路歸國，加龍將軍則經由日本回返蘇聯，其餘約一百四十名的蘇聯顧問，也陸續歸國，孫先生越飛宣言以來與國民黨及國民政府提攜的蘇聯勢力，至此乃完全崩潰。

國共分裂的結果，於武漢政府內部爭奪領導權的中國共產黨，完全宣告敗北，其後不得不轉向地下工作，武漢政府追効南京之後，努力實行清黨，蔣介石自承北伐失敗之

責·宣佈辭職下野，以清黨與確立黨權為條件，甯漢發表共同宣言，九月十六日在南京舉行甯漢兩方聯合會議，奠定了其後南京國民政府的基礎。



# 八七會議以後的暴動政策

脫離武漢政府的中國共產黨幹部份子，於一九二七年七月末，羣集南昌，煽動賀龍，葉挺及朱德的三軍，引起兵變，於七月三十一日夜占領南昌，八月一日即在同地組織成革命委員會。所謂八一南昌暴動，以李立三，蘇兆徵，張國燾，周恩來等為指導者，樹立了中國最初的「蘇維埃」組織。

然而，作為南昌暴動原動力的賀、葉、朱聯合軍，由於武漢政府方面張發奎，朱培德軍的進行討伐，很快的即告敗退，六日，放棄南昌，由江西省南部向廣東方面逃竄，十月，逐漸進抵潮州，汕頭一帶，後又為廣東軍所擊破，乃分散於江西、廣東、福建、湖南四省境內。此種四散軍隊的首腦者中國共產黨員，努力進行地下工作，赤化所在地的農民，並加以武裝組織，造成了日後發展為紅軍組織的基礎。朱德、賀龍、毛澤東實為其中最優秀的組織者。

南昌暴動失敗以後，中國共產黨幹部份子，於八月七日在九江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決議了黨的重生新方策。此次會議，即所謂八七會議。新方策決定：（一）脫離國民黨的關係，（二）放棄過去之機會主義，（三）武裝暴動，（四）樹立蘇維埃政權。同時並開除右傾派譚平山一派的黨籍。八七會議的領導者瞿秋白，抨擊陳獨秀有墮入右傾機會主義的傾向，

因取消其中國共產黨書記長之職，並取而自代，瞿之支持幹部有蘇兆徵，向忠發，蔡和森，任弼時等。此爲自創立中國共產黨以來處於中心元老地位的陳獨秀氏失脚之始，也即中國共產黨少壯極左份子抬頭的開端。

八七會議中國共產黨新方針決定的結果，接續有四省秋收暴動，海陸豐蘇維埃的樹立，廣東共產黨的勃發等。同年夏秋之間，由於潛伏各地共產黨員的煽動工作，到處發生了勞働者與農民的武裝暴動。江西、湖南、江蘇、廣東四省，勞働者的罷業相接，農民的武裝暴動續起。宜興、無錫、長沙等地農民蜂起暴動，但並無充份的組織與訓練，結局終歸失敗。這一聯串的農民蜂起，以奪取秋收爲目的，即所謂四省秋收暴動。

十一月九日，在上海舉行中國共產黨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檢討八七會議以來的反機會主義的鬥爭，並基於四省秋收暴動的經驗，決議了新的政治決議與土地問題黨綱草案等。決定採用「一切政權歸於勞働者，農民及兵士代表者會議（蘇維埃）」的口號，作爲其後中國共產黨工作的中心目標，土地問題黨綱草案則否認一切土地所有權，此爲具有歷史意義的最初的農業綱領。於此次會議中，書記長瞿秋白，自承秋收暴動爲盲動主義的失敗，申請辭職，由向忠發繼任，而以李立三，周恩來，恽代英，張國燾爲幹部，李立三則握有中國共產黨的實權。

十一月十七日，放棄汕頭後賀龍，葉挺所屬的殘敗部隊，在彭湃的指導之下，盤據了廣東省海豐、陸豐地方，組織了蘇維埃政府，苟延四個月之久。

同時廣州方面的左傾勞動者，以中國共產黨南方局書記張太雷爲指導者，策劃武裝暴動奪取廣州，會同於十月間從武漢歸還廣東的張發奎軍於十一月十七日發動了「廣州政變」，驅逐李濟琛，並爲防備李之奪回廣州，全軍紛調前線，廣州市內的警備力量大爲減弱，張太雷乃甘言誘騙張發奎，以援助張軍爲條件，要求釋放在獄的共產黨人七百名，並支給省港罷工委員會所屬罷業勞動者一萬二千名的解散費三百五十萬元。

但於十二月十一日未明，共產黨突向張發奎軍開火，占領公安局作爲勞農兵聯合辦事處，襲擊右派的廣東總工會，解除警察保安隊的武裝，並襲擊占領其他各行政及軍事機關，十二日在中央公園舉行了勞農兵代表者大會，選舉蘇維埃委員：主席蘇兆徵，內務兼外交黃平，肅反楊殷，勞動周文雍，司法陳郁，經濟何來，土地彭湃，海陸軍張太雷，祕書長惲代英，勞農紅軍總司令葉挺，樹立蘇維埃政府。然而第二天十三日因遭李福林軍的反擊，全軍戰敗，張太雷戰死，僅有五六百人逃向海陸豐蘇維埃方面，其他全部解除武裝，五千餘名遭受槍殺，廣州蘇維埃僅成立三日，即告破滅，李福林軍奪回廣州之際，檢查蘇聯領事館的結果，證明此次事件的背後有蘇聯政府的關係存在，南京政府遂於十五日與蘇聯斷絕國交。此即著名的廣州事件，稱爲中國共產黨革命退潮期之一戰。

# 六全大會與陳獨秀的除名

八七會議以後勞農暴動政策的敗北，尤其是廣東事件的失敗，第三國際於一九二八年二月第九次的會議中，因有「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由史太林，布哈林，李立三，向忠發四人起草，根據過去半年勞農運動並進的經驗，準備最近將來革命的高漲，揚棄投機主義的鬥爭，傾注全力於大眾的吸收，組織蘇維埃，努力蘇維埃區域紅軍的組織，此種決議的趣旨，於同年七月在莫斯科舉行的中國共產黨六全大會更形深刻化的展開。

廣州事件失敗以後，由於南京政府加強對共產黨的取締工作，在國內召開黨大會十分困難，因就第三國際舉行第六次世界大會的機會，中國共產黨乃在莫斯科召開了六全大會，同時舉行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五全大會。六全大會所決定中國共產黨的根本任務：

- (一) 排除地主階級，實行澈底的土地革命，(二) 驅逐帝國主義，完成中國統一，(三) 以武裝暴動推翻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權，建設蘇維埃制度。六全大會的各種決議，對於自一九二七年五月於漢口舉行的五全大會以來，處於波瀾重疊環境中幾度轉變的中國共產黨方略與行動作一次總清算，其總括的政綱舉出下列十項：(一) 打倒帝國主義，(二) 沒收一切依存外國資本的銀行及企業，(三) 統一中國，承認民族自決權，(四) 打倒軍閥及國民黨政權，(五) 建立勞農兵代表者會議(蘇維埃政府)，(六) 實行八小

時勞動制，實施增加工資，救濟失業者及社會保險，（七）沒收一切地主之土地與耕地歸農，（八）改善士兵生活，給與兵士土地及職業，（九）廢除一切軍閥課稅與實施統一的累進稅法，（十）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及蘇維埃聯邦。

六全大會的決議，實行土地革命，打倒帝國主義，必須先行確立蘇維埃政權，而確立蘇維埃政權，必須編成紅軍及努力充實紅軍的實力。因此，六全大會以來，中國共產黨的工作重點，即在致力紅軍的組織及蘇維埃政權的樹立。同時自八七會議以來，遠離實際的黨中央部的陳獨秀氏，因與第三國際的指導精神不相容，主張右派的投機主義，遂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上投機主義的惡名與彭述之，劉仁靜，李季等同被開除黨籍。陳獨秀對此，因發表一「告全黨同志書」，表明立場，兩者之間展開激烈的理論鬥爭，而陳獨秀派的實際活動，其後漸無進展，一九三二年十月，陳在上海為南京政府所逮捕，即其理論的鬥爭，至此也告終結。

陳獨秀一派開除黨籍以後，中國共產黨即以李立三為中心，完全由新幹部所指導，續向組織紅軍與建設蘇維埃之途邁進。

# 李立三路線的清算

紅軍的發生，始於一九二七年。參加南昌暴動的賀龍，葉挺的部隊，自南征汕頭後，即在江西、廣東、福建等省境地方展開遊擊，八七會議後毛澤東在湖南組織有三千農民軍，當進入江西之際，即與前者會合，入據井崗山，此即為日後紅軍主力之朱毛紅軍的基礎。其後繼續發生以彭德懷，黃公略，許繼慎，方志敏，鄺繼勛等為指揮者的紅軍，至一九二九年未，已成長十二軍一團，兵數七軍五千，步槍五萬枝的紅軍部隊。此種紅軍構成的兵士，第一由農民鬥爭的過程發展而來，第二由兵變所結成，第三為士匪與流氓的結合。一九三〇年五月，據中國共產黨自側調查的結果，當時紅軍構成的份子。貧農五八%兵士，二七%勞動者四%流氓及其他一一%，故中國共產黨自身也承認此非真正的紅軍組織。與紅軍結成的同時，開始進行所在地蘇維埃地區的組織。不單瀰漫於揚子江南北，且發展至珠江與黃河二流域，更由福建，廣東發展至雲南與四川等地。

一九三〇年五月，在上海舉行了第一次蘇維埃區域代表者會議，出席者為來自蘇維埃區域的代表者，包括中國共產黨，紅軍，全國總工會等之代表，會議主要目的在決定蘇維埃運動的方面。會議宣言中曾批判當前的政治情勢說：

今日中國，有著兩種明白相反的政治組織，一為豪紳、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的統治，其他之一，即為勞動者，農民，兵士，勤勞大眾的蘇維埃政權。這兩

個政權正代表兩個相反階級的最後之決戰，將決定中國的解放與勞動者、農民大眾解放的最後命運，更為全世界革命爆發的偉大原動力。

此次會議並決定選擇（一）土地法，（二）蘇維埃組織法，（三）蘇維埃憲法，（四）勞動保護法等。

同年六月十一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曾有關於當前的政治任務之決議。此項決議稱為「關於新的革命之高漲與一省或數省勝利的戰術」。基於軍閥戰爭的影響與世界的經濟恐慌的反應，預料新的革命高潮之到來，具備了客觀的諸條件，一省或數省革命勝利的爭取，以準備樹立全國革命的政權。此項中央政治局的決議，由當時中國共產黨之中心指導者李立三所領導，即一般所謂李立三路線。此項決議的由來，乃因李立三抱有如下的觀測，李氏以為紅軍及蘇維埃運動急激且廣泛的進展，客觀的諸情勢，已進入革命另一高潮期。中國共產黨，根據此項決議，指示都市及農村革命份子的武裝暴動。因國內軍閥戰爭的影響，乃達到相當的成功，即為長沙蘇維埃的樹立。彭德懷的紅軍第五軍，於七月下旬占領了湖南省城長沙，建設了長沙蘇維埃政府。然而長沙蘇維埃僅不到十日的壽命，為何健軍逆擊而告敗北，狼狽退往江西。長沙蘇維埃失敗的主因，乃由於中國共產黨側對紅軍的實力評價過高所致。

長沙事件的失敗，無疑的乃是受了李立三路線的影響。李立三路線的反對論，最先由第三國際駐在上海代表彌孚及其系統所屬陳紹禹、秦邦憲、王稼嘗、何子述等留俄派（蘇

(聯留學生)所發出，糾正李立三政治路線的錯誤，進而提出打倒李立三的主張，此種政治理論的鬥爭，其實不過是掌握黨權的鬥爭，為解決此輩留俄派及彌孚與李立三的衝突，因有第三國際的十一月十六日來函，指摘李立三路線的誤謬，其結果，李立三即一蹶不振了。

對於李立三路線的論爭，表示了中國共產黨非常的動搖混亂，九月，以自莫斯科歸來的瞿秋白為中心，在江西省廬山召開了三中全會，十一月二十五日因接受第三國際的來函，在上海又舉行中央政治局會議，翌年一九三一年一月八日於上海召開四中全會。三中全會，在上海又舉行中央政治局會議，翌年一九三一年一月八日於上海召開四中全會。三中全會，無條件容認第三國際政治秘書處的七月決議，並依據第三國際的來翰，明確指摘李立三路線的誤謬，遂於十一月二十五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決議同意第三國際的來翰。李立三乃宣告退却，前往莫斯科。於此次會議中，瞿秋白發表了一篇「告同志書」，對於李立三路線論爭的始末，有較詳的記錄，留俄派的問題之外，還有李立三派所屬羅章龍、王克全的調和論。最後召開了四中全會。四中全會的決議，於分析李立三路線的誤謬之後，更對李立三路線在理論上實際上作著果敢的鬥爭，克服軍事的冒險主義，糾正紅軍的過大評價，同時並謀已遭破壞的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的恢復，大眾團體工作，即經濟的罷工之組織與指導的改進，——總之，此為勞動者出身幹部與知識份子出身幹部的對立抗爭，結果知識份子獲得了勝利。

李立三失腳後，向忠發繼任中國共產黨的總書記，向於六月二十一日在上海法租界遭受逮捕，被處死切，陳紹禹繼承後任。

# 蘇維埃政權的樹立

一九三一年爲中國共產黨新的發足之一年。對內克服了李立三路線，對外擊退了蔣介石前後三回的大討伐，蘇維埃區域大爲擴張。一九三一年末蘇維埃區域，據共產黨側的記述，聲稱已存在中國全國境內，據國民政府側的發表，則遍及於江西、湖南、湖北、廣東、安徽、河南、陝西諸省。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在江西省瑞金召開了第一次中國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簡稱中蘇一全大會，以下仿此），總括中國的蘇維埃運動，成立了與南京政府對立的中國蘇維埃臨時政府。此實爲中國共產黨史上有歷史意義的劃期的一頁。

中蘇一全大會，出席全國各蘇維埃代表者，中國共產黨，紅軍，全國總工會等代表者共六百十名，會議計二星期，決議並採擇：（一）蘇維埃憲法。（二）勞動法。（三）土地法。（四）經濟政策決議。（五）關於紅軍的決議。（六）關於國內少數民族的決議。（七）時局宣言。並選出了中國蘇維埃臨時政府的幹部。其最高機關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爲毛澤東，副主席爲項英，張國燦。中央執行委員會以下列人民委員會的組織構成之：

人民委員會副主席 毛澤東

人民委員會副主席 项英

同

張國燦

外交人民委員會主席

王稼薈

軍人人民委員會主席

朱德

勞動人民委員會主席

項英

財政人民委員會主席

鄧子恢

土地人民委員會主席

張鼎丞

教育人民委員會主席

瞿秋白

內務人民委員會主席

周以栗

司法人民委員會主席

張國燦

勞農監查人民委員會主席

何叔衡

國家政治保衛局長(格匹烏)

鄧發

(一)中國蘇維埃臨時政府成立之後，中國共產黨系的主要工作，即向下列三方面積極進展  
(二)紅軍實力的充實。(三)蘇維埃區域的擴大強化。(三)展開制霸全中國的赤白兩軍的決死的鬥爭。一九三一年末，紅軍已擁有兵員二十萬，大砲近百門，飛機五架。

關於蘇維埃區內的經濟狀態，中國共產黨方面所發表的文獻，多屬一般論乃至抽象論的資料。完全缺少財政狀態，交易狀態的統計數字。就一般經濟狀態而言，由於外部經濟封鎖的加強，頗感十分困難，外部必需品的供給，既屬不可能。農村乃不得不維持自給的



生活。區內耕農大眾享有田地的分配。據大多區域的統計，每人約有八担田至十五坦田，取消一切苛捐雜稅，繳納農業稅，依各人的收入，採收累進的原則，對於商民，也課以累進的商工營業稅。

一九三四年一月末，在瑞金召開了中蘇二全大會，出席者六九三名，大會中由中國蘇維埃臨時主席毛澤東報告一全大會以後數年間蘇維埃各種工作的自己批判，並決議選擇中國紅軍總司令朱德的「關於紅軍建設的決議」，林祖涵的「經濟建設決議」等等蘇維埃運動的基幹諸問題。

中蘇二全大會之後，實行了人民委員會的改組，推舉新主席張聞天，人民委員會的委員份子也有若干的變動。

中蘇二全大會的宣言，曾指出「最近國民黨四中全會，國民黨領袖高唱統一與建設，國民黨所謂之統一，事實上即為出賣中國給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者，援助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分割，而向蘇維埃與紅軍實行攻擊；所謂建設，即強化對中國民眾的榨取，陷中國國民經濟於空前的崩潰狀態」……「蘇維埃政權乃挽救中國的淪亡，謀根本解放全中國大眾」。

# 五次圍剿與「一萬五千里長征」

一九三〇年對馮戰爭終結以後，南京政府曾發出三個月以內撲滅紅軍的聲明，草擬了精密的剿共計劃，可是結局二進以至三進，均告失敗，南京政府始體驗了討伐紅軍的工作，並非輕而易舉之事。

第二次討伐，乃先以討伐軍包圍整個蘇維埃區域，然後逐漸收縮包圍線，並逐步推進組織地方保衛團，自衛團的工作，另一方面對農村實行反共產黨的宣傳，開始增加新的精銳部隊，輸送前線。結果紅軍完全放棄了湖北省洪湖一帶的蘇維埃區域，而退縮至以鶴峯為中心的湘鄂西蘇維埃區，紅軍已感到相當的棘手。然而第二次討伐，在大局上看起來，決不能算是成功，甚且可說是失敗的。因為動員了二十萬之衆的大兵，費時半載，而結果有第十八師，第五十師，第二十四師，第二十八師等遭到全軍覆沒的打擊，另有江西第一師，第五師，第四十七師，第五十四師，第五十六師，第七十七師及第二十六師均受到極嚴重的損失，幾至不能再編成，師長戰死的有張輝瓈，胡祖玉兩員。

受到二次失敗的打擊，於五月國民會議席上，蔣介石發表了「誓必討伐紅軍」的演說與報告，第三次討伐，蔣乃親自出馬，前赴南昌前線，而所以不能早日獲得討伐勝利的原因，大半是受了廣東政府的樹立及石友三軍反叛的影響。第三次討伐，蔣氏起用顧順章為

最高軍事顧問。顧早年服務於平漢鐵路及漢陽兵工廠，當時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一年一月四中全會前，已爲中央執行委員之一，專負責武器，彈藥的輸入，爲黨內李立三，瞿秋白以次有力的份子。顧於四中全會中被認爲有反黨的意識而遭開除黨籍，乃逃亡武漢地方，蔣介石因特殊的緣故，起用了顧爲最高軍事顧問。結果，顧順章向蔣氏密告了在上海活動的共黨幹部的所在與動靜以及黨機關的所在地等，根據此項密告，南京政府乃實行了對中國共產黨的白色恐怖政策。於上海法租界祕密被捕而遭槍殺的惲代英（中國共產黨青年團幹部，中國有數的左翼理論家），以及在上海法租界善鐘路遭盧家灣巡捕房逮捕，而爲淞滬警備司令部於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三日在龍華槍殺的向忠發，均爲顧順章所告發。

根據瑞金政府——中國蘇維埃臨時政府的發表，一九三一年中共的勢力已遍及華中與華南十一省，蘇維埃全區的人口約六千萬人，擁有飛機及大炮的紅軍三十萬，首都瑞金除行政機關外，並設有紅軍大學，列寧大學，原來人口不及一萬的瑞金縣城，突成爲人口十數萬的都市。

蘇維埃政權實爲南京政府最有力的勁敵，它接受着第三國際赤化遠東的指示。中國共產黨中央部，自瑞金蘇維埃政府樹立以來，放棄了上海的地下組織，移入瑞金，中國蘇維埃臨時政府爲黨與紅軍的中樞機關。在與國內軍閥勢力爭霸戰中占着輝煌勝利的蔣介石將軍，對於盤據在蘇維埃區域的紅軍之堅強抵抗，也不得不感到心焦頭痛，幾至束手無策。一九二八年以來，五次的總攻擊，都未奏功，耗費了南京政府歷年軍事費的大半，動員一

百萬之衆的大軍，爲紅軍的遊擊戰術所困，蔣乃採用公路碉堡政策，大規模建設汽車公路，以便捷軍隊的運輸，構築碉堡以監視紅軍的行動。於一九三四年夏，已將紅軍主力，遂至江西省的南部。

中共被困成袋中之鼠，乃決定放棄蘇維埃政府的首都瑞金，準備長征西遷，於一九三四年十月末，主力部隊十萬之朱毛軍——其領導者爲紅軍總司令朱德，政治部代表毛澤東，開始向湖南省境逃竄。南京政府討伐部隊跟蹤緊追，由湖南入貴州，由貴州省北部渡長江進入四四川省，更由貴州轉襲雲南省城昆明，蔣介石曾乘飛機，往來貴陽，昆明之間，親自督戰，紅軍乃由雲南省北上，強渡金沙江，進入四川省山岳地帶的會理地方。由會理經西康，渡大渡河，於一九三五年初夏，由兩金川地方到達西康省的打箭爐，當時全軍糧食缺乏，士氣極度消沉。從地圖上看起來，紅軍自退出瑞金以來，十個月不斷的行軍，其路程之長，實足驚人。紅軍結集西康之後，不久又全軍北行入四川省，於懋功地方與徐向前軍合流成功。徐向前軍，稱紅軍第四軍，多年盤據於四川省北部，其政治委員張國燾爲中國共產黨的幹部，徐軍和朱毛軍合流的結果，整備再建自瑞金以來的紅軍陣營。一九三五年八月，在四川省包座舉行紅軍首腦部會議結果，引起了紅軍進路問題的論爭，因此分裂成爲兩派：即毛澤東主張北進，渡白龍江進入甘肅；張國燾主張南下，乃率領朱德，徐向前部隊的大部，進入四川省的天全，雅安，廬山，寶興等地方，作爲根據地，企圖與貴州省北部的賀龍、蕭克軍合流。隨毛澤東進入甘肅的紅軍士兵，約有九千至一萬人，在岷縣

南方的分水地方整理隊伍，改編成陝甘支隊，其總指揮有一九三〇年長沙蘇維埃之樹立殊勳者，被稱爲「中國的伏羅希洛夫」彭德懷，林彪，彭雪鳳，鄧發，分任各縱隊司令，葉劍英任參謀長，毛澤東任政治委員，於一九三五年九月實行改編，開始向陝西省行動，而與活躍於陝西北部的徐海東，劉子丹兩部隊合流，沿途隨地招募兵士，充實實力，於一九三六年春與徐，劉連絡成功，乃積極擴充陝北蘇維埃政府的組織，展開赤化西北的陰謀。

# 中國共產黨的新方略

一九三五年八月於莫斯科第三國際第七次世界大會席上，中國共產黨駐蘇代表陳紹禹曾發表「樹立國防政府」與「結成抗日反滿聯合軍」的言論。陳紹禹為第三國際遠東局代表彌孚系統下留俄派的領袖，一九三一年向忠發在上海被捕槍殺後，即繼承中國共產黨總書記之職。自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遷入瑞金後，陳氏因與蘇維埃主席毛澤東意見惡劣，乃讓總書記之職與楊尚坤，而離去瑞金，作為中國共產黨駐蘇代表團主席前往莫斯科，常以王明的筆名發表論文，為一著名的理論家。

陳在第三國際大會席上，發表「關於殖民地與半殖民地革命運動與共產黨的戰術」意見，主張反帝國主義的單一戰線之結成，強化與擴大，當為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共產黨最重要的任務，論及中國當前的情勢，陳說：

某些人，以為在中國一部份領土上，既已獲得蘇維埃革命的勝利，同時階級鬥爭已異常激化，故所謂反帝國主義的民族統一戰線，並無何等重要的意義。此實陷於重大錯誤。事實恰正相反，我敢說現在中國的反帝國主義的民族統一戰線問題，實具有第一重要的意義，而且有決定的重要性。

陳氏更指出帝國主義的中國侵略之現狀：「抗爭帝國主義的進攻以求生存，今日僅有

兩條路，不抵抗，即滅亡。」激發廣汎的勞農大眾的民族革命之情緒。

十九路軍的上海抗戰，福建人民政府獨立，華北吉鴻昌的抗日工作，國民黨軍隊幹部的加入共產黨，孫夫人宋慶齡等發出的「中華民族對日作戰基本綱領」，在在表示出救國抗日思想的激昂，遍及全國。

在陳紹禹於第三國際大會席上提倡新方略的前後，中國共產黨與中國蘇維埃政府於八月一日（一九三五年）連名發表了「抗日救國宣言」。此一宣言，並非普通的一紙宣言，而實為具有重要意義歷史的文獻。中國共產黨與中國蘇維埃政府，向全國同胞提出結成抗日救國統一戰線具體的提議。宣言中明示反帝國主義統一戰線的內容與形式，實為中國共產黨新方略的基幹部分。宣言規定結成抗日反滿聯合軍，「若國民黨軍隊停止對蘇維埃區域的侵略攻擊，為準備對日作戰，而參加聯合戰線，則紅軍即可拋棄舊仇宿怨，中止關於內政問題的反對紛爭，克服與國民黨軍隊的對立。與彼等向救國的共同武裝戰線攜手。」同時主張設立救亡圖存的臨時指導機關國防政府，建立下述之政治方針：

國防政府必須召集由民主主義自由選出的中國全民族眞的代表者，決定保全中國的獨立並展開鬥爭。作為國防人民政府的主要任務，是……抵抗的組織與國土的收復。故國防政府的政治綱領，必須包含下列諸點：

(一)……武裝抵抗，收復失地。

(二)救濟治民，安定民生。

(三)凡……在華財產的沒收，交與政府作爲戰費。

(四)沒收漢奸賣國賊的一切財產，土地，糧食，交與貧苦同胞及戰士。

(五)排除苛捐雜稅，調整財政金融政策，發展農工商業。

(六)增加工資，改善勞農軍政商學各界的生活。

(七)實行民主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人。

(八)實施國費教育，對學業終了的青年給予職業。

(九)實行中國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

(十)聯合一切被壓迫大衆共同鬥爭，聯合援助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諸民族及國家，在

……戰爭之際，嚴守善意的中立，確立一切列強民族的友好關係。

中國共產黨新方略的要旨，即在對日戰爭的準備，換言之，即蘇維埃聯邦的側面的對日備戰。確立蘇聯對外蒙的軍事的支配權。中共此種方略劃期的轉變，實具有歷史性的意義。



# 西安事變前後

上海靜安寺路同孚路口，有一家掛著 American BookandSupply Co. 金字招牌的書店，中文是「美國書業公司」，實在是一個中國共產黨和蘇聯連絡上的有力機關。進行側面的聯絡與宣傳工作，曾獲有相當的效果。一九三七年六月，以妨害治安的嫌疑，為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所搜索，始知所稱美國國籍，乃係偽造，其經營者，實為蘇聯塔斯通訊社上海支社主任蘇孚德之妻，以擾亂治安發賣不穩的罪名，被迫停業。美國書業公司，自一九三六年春以來最重要的工作，即為經手散佈中國共產黨方面企圖與國民黨妥協的五大文獻，所謂五大文獻如左：

(一)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致國民黨二中全會全體執行監察委員書（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日發）

(二) 手澤東至章乃器等四人書（同年八月十日發）

(三)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致國民黨書（同年八月二十五日發）

(四) 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提會議召集和平會議通電（同年十二月十九日發）

(五) 中國共產黨委員會對國民黨三中全會通電（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發）

自滿洲事變以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綱領，由打倒帝國主義而專移注於日本一國，所謂「抗日救國」的口號，「……挽救中國民族的滅亡，必須動員全國民對日武裝抗戰。……對日實行抗戰與否，實為解決當前中國內外一切問題的關鍵！」此為一九三六年六月中共致國民黨三中全會書的內容要旨。同時並提及當時與南京對立的西南派的態度：

「我等對西南派諸領袖的抗日救國之英勇的行動，決給予全面的支持，在破壞統一或內戰罪名之下，彼等之吳勇的行動，實不能否定是抗日救國的。與執行抗日反漢奸政策諸政派的合作聯合，實為當前之要圖。」

毛澤東對於一九三六年七月人民戰線派刊行的「團結禦侮的幾個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小冊的答覆，表示贊同人民戰線派結成民族聯合戰線的提議。中國共產黨乃利用此一機關，積極策動人民戰線對結成民族統一戰線的活動。章乃器，沈鈞儒之人民戰線派展開救國會運動頓然熾烈，因此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所謂人民戰線派之愛國七君子為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會同法租界巡捕房所逮捕。於起訴書中，稱章乃器之行動「……勾結共產黨徒，組織非合法團體，煽動罷工罷課，擾亂地方秩序，企圖顛覆政府之嫌疑。」關於章乃器等人民戰線派之被捕，羣起非難南京政府，「釋放我等的抗日戰士」，「逮捕抗日救國英雄的理由何在？」——此種釋放運動之有力先鋒者，即孫夫人宋慶齡女士。

不久，於十二月十二日，爆發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以此為契機，成立了國民

黨與中國共產黨的妥協，此也爲國民黨「統一救國」理論與共產黨「抗日救國」理論的混合。

西安事件中大露鋒芒的中共代表周恩來，據大公報記者長江氏的描述稱：「在楊虎城公館中和周恩來會見，周氏生氣充沛，質樸的眼光，粗黑的髮鬚，雖經刮剃，尙留著濃黑的鬚痕，穿着灰色的棉布士兵制服，腰纏皮帶，足穿便鞋，在普通話中夾雜著長江流域各省的土音，可以確定是江西人」。〔「塞上行」三二二項〕

西安事變後，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妥協工作，於張沖與周恩來之間進行著。當時南京政府方面，因鑑於蔣介石已具有壓倒的威望，意圖使之偶像化，對於蔣之「赤」色色彩，極力警戒，而中國共產黨側，對期待妥協的成立，也極持慎重的態度，故除了發出宣傳的文章之外，關於國共妥協進展的真相，外間甚少可靠的報道資料。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二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致國民黨三中全會書中，曾以「謹電奉達，恭待明教，並致民族革命的敬禮」之文句結尾，書中要旨，有左列三項的要求：

- (一)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日。
- (二)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與抗日英雄。
- (三)迅速完成對日抗戰的準備。

中國共產黨並提出左條具體的政策：

- (一)蘇維埃政府改爲特區政府，紅軍改稱國民革命軍，服從國民政府及軍事委員會直

接的指揮。

(二) 中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 實現民族統一戰線的共同政綱之確約。

國民黨在表面上於三中全會席上通過了根絕赤禍案，而其內容則與標題迥異，以共產黨組織解消為前提，顯示國共妥協的可能性，表面以紅軍七萬歸順中央軍的形式，南京政府支給年額五百萬元的軍事費，西北蘇維埃地區改稱特區，種種事實逐步證實。

中共於西安事變，放棄了「沒收地主土地」，「階級鬥爭」等政策，由階級的利益轉向民族的利益，由階級的鬥爭轉變為階級的協調，強調農民與地主的協和，這在中共的革命理論上，當然為一大破綻，毛澤東解釋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說：「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是民族的。除了漢奸之外，包括全國民眾及一切的黨派，一切的階級。共產黨僅唱人民戰線，實為皮相的見解。中國共產黨所唱的乃是民族戰線，是比較法蘭西及西班牙的人民戰線更為廣範圍的」。「而集中抗日的一點，並非反對一切帝國主義，而是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在回答其具體的政綱如何的一問題，毛澤東於陝西膚施黨紅軍聯席會議席上，曾舉出下列諸項：

(一) 國內的和平統一。

(二) 對日抗戰。

(三) 人民之民主的自由。

(四)南京政府包括各黨各派，罷免親日派，組織真正的國防政府。

(五)改變爲普選國會制的民主共和國。

(六)人民生活的改善。

(七)商工業的發展。

(八)抗日國家的建設。



# 中日事變爆發以後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爆發了此次中日事變的導火線——蘆溝橋事件，在上海作爲大衆運動之中心者的人民戰線派，再度活躍登場。隨着華北戰局的進展，沈鈞儒等所謂七君子，不待司法院的許可，而以軍事委員會的名義，執行了強請保釋出獄。革命文學家郭沫若自日本歸來後，即加入七君子而爲八君子，以彼等爲中心，抗日民衆運動的工作，頗告活躍發展。於七月八日在尚文小學舉行的上海文化救亡協會等四團體招待八君子茶會席上，郭沫若說明了日本的現況之後，即激動大衆組織對日抗戰的情緒。錢俊瑞在「救國周刊」上發表了「關於蘆溝橋事件的幾點基本認識」一文。上海特別市社會局長擔任了上海抗敵後援會的會長，利用無線電，雜誌，小冊子，新聞紙，早整備了標識「抗日」的國內宣傳陣營。凡此均以所謂人民戰線派爲中樞。自一九三七年七月至八月之間，上海街頭出現的雜誌，例如「救國周刊」，「抗戰」「禮拜六」，「國民」「抗日畫刊」，「戰事畫刊」，「汗血週刊」等等，完全成爲清一色的「抗日」刊物。

八月十三日上海中日兩軍交戰開始，南京政府方面的親日派漸次失勢，而孫科，馮玉祥等親蘇派以及宋慶齡的第三黨份子，人民戰線派，共產黨員，則日益抬頭，把握了實權。同時托洛斯基派也有乘時抬頭之勢。一九三五—二七年革命之當初，有著極大貢獻的



中共巨子陳獨秀，於武漢四中全會時被捺上投機主義的烙印，於一九二九年發表了「我們的意見書」後，又充份暴露了托洛斯基主義者的面目。一九三二年被捕以後，陳派勢力乃漸次失墜。隨着中日事變的爆發，「七君子」保釋以後，陳獨秀也出獄了。第三國營東方局書記，汎太平洋勞動組合書記局中國部長牛蘭，前因赤化中國的罪名，被判無期徒刑也於九月八日被釋出獄。陳氏的出獄實表示了托洛斯基派復活的意味。托派機關雜誌「鬥爭」接着復刊，並參加了人民戰線派。在理論上言，托洛斯基派對中國革命遂行的認識，與周恩來，毛澤東的方略，已漸次相接近。陳獨秀氏，以他過去輝煌的文采，現在他的筆下，當然還保有十分的魅力的。

同年八月二十九日午後五時，於南京政府外交部，締結了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據傳當時馮玉祥與蘇聯大使館附武官蘭平少將之間，成立了中蘇軍事密約。其內容如下：（一）中國正式承認國內的蘇維埃地區。（二）蘇聯過去對中國紅軍的援助，給予中央軍。（三）關於抗日戰爭。中蘇兩國合作提攜。（四）中國從事長期抵抗，以使日本政治的及經濟的困憊。（五）中國不得蘇聯的同意，不得與日本構和。

同時中國政府公開發表了紅軍中央化的公報，任命朱德，彭德懷為中央軍第八路正副軍長。九月八日朱德的就職通電，聲稱「……為貫澈抗日，誓死一戰。」此為國共妥協工作最後關頭，國共軍事協力的事實表現。

九月二十三日南京政府機關通訊社中央社膚施電，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發表宣言」的

消息，宣言的總目標舉出（一）即為發動民族革命戰線的準備，從事中國民族的獨立自由與解放戰爭，以收復失地，恢復領土主權的完整。（二）實現民權政治，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決定救國方針。（三）民生的安定與國防經濟的發展。中國共產黨並表明轉換如下的戰術：

（一）孫先生的三民主義為目前中國的必要，中國共產黨當期澈底的實現。

（二）取消破壞國民黨政權的一切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並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解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的統一。

（四）解消紅軍的名稱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統轄，擔任抗戰前線的職責。

右述四項說明，中共自稱是「……本黨以光明磊落，大公無私與委曲求全的態度，向全國大眾表示。……既得全國大眾之贊許後，自當與國民黨團結，共同執行民族革命戰爭。」

中國共產黨宣言發表之翌日，蔣介石當即發表約一千字左右的談話。蔣氏首言：「國民革命的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與平等。國民黨總理 孫先生曾說明三民主義為救國主義，希望全國國民一致為挽救國家的危亡而奮鬥。……」其次說明十年來的國家統一過程與民族意識的漸次昂揚，國人已認識國家民族的利害乃在個人與團體的利害之上。並言：

「此次中國共產黨發出之宣言，實爲民族革命勝利之例證，其宣言中所舉諸項，例如暴動政策之放棄，赤化運動之解消，蘇維埃區域與紅軍之取消，此均爲救國禦侮集中民族力量之必要條件，此不但與國民黨三中全會宣言及決議案相一致，且爲三民主義而努力奮鬥。」

蔣氏談話的後半段，乃就國共合作一點，作掩護的解釋稱：「……對於信奉三民主義努力救國者，不問過去如何，……不問國內的如何派別，集合誠意救國之志士於抗敵禦侮旗幟之下。……中國共產黨員既棄去成見，確認國家之獨立與民族利益之重要。」——蔣介石之談話，實爲國民黨再度容共政策的口實。

自一九二七年國共分裂後，作爲譚平山，鄧演達之中華革命黨（即所謂第三黨）的領袖宋慶齡女士，素來堅守左翼的立場，監視着南京政府的動態，爲蔣介石所常感頭痛之人物。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上海「救亡日報」（爲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協會於上海事變後所發行的報紙，以郭沫若、茅盾、王芸生、章乃器、鄭伯奇、巴金、田漢、鄭振鐸等爲中心）上發表了一篇「宋慶齡訪問記」，宋女士對中國共產黨的「共赴國難」宣言與蔣介石氏的談話表示了下述之感想。

「國共兩黨，十年前在孫文總理領導之下，共同努力國民革命。不幸於孫總理逝世後二年，竟告分裂，此實爲首唱國共合作的孫先生生前所未思及者。目下在民族危機日重，全國大衆之共同要求下，兩黨捐棄成見，再度攜手，中國共產黨的宣

言與蔣委員長的談話，均表明了在孫先生遺教下兩黨精誠團結的必要。聞此消息，本人誠屬悲喜交併，不勝無限感奮之至。

孫先生生前倡導的三民主義，以民族之獨立，民權之自由，民主之幸福，爲挽救中國危亡之政治綱領。其後並決定三大政策（即聯俄，容共，與扶助勞農），實與三民主義不可分離云。」



# 事變後中共軍全貌

中日事變發生以後，中國共產黨取得了公開活動的機會，表面上以「抗日」爲名，取消了「紅軍」的名稱與番號，而在實際上却積極着眼於以下兩種基本政策的推進：

(一) 積極擴充部隊實力，以建立武力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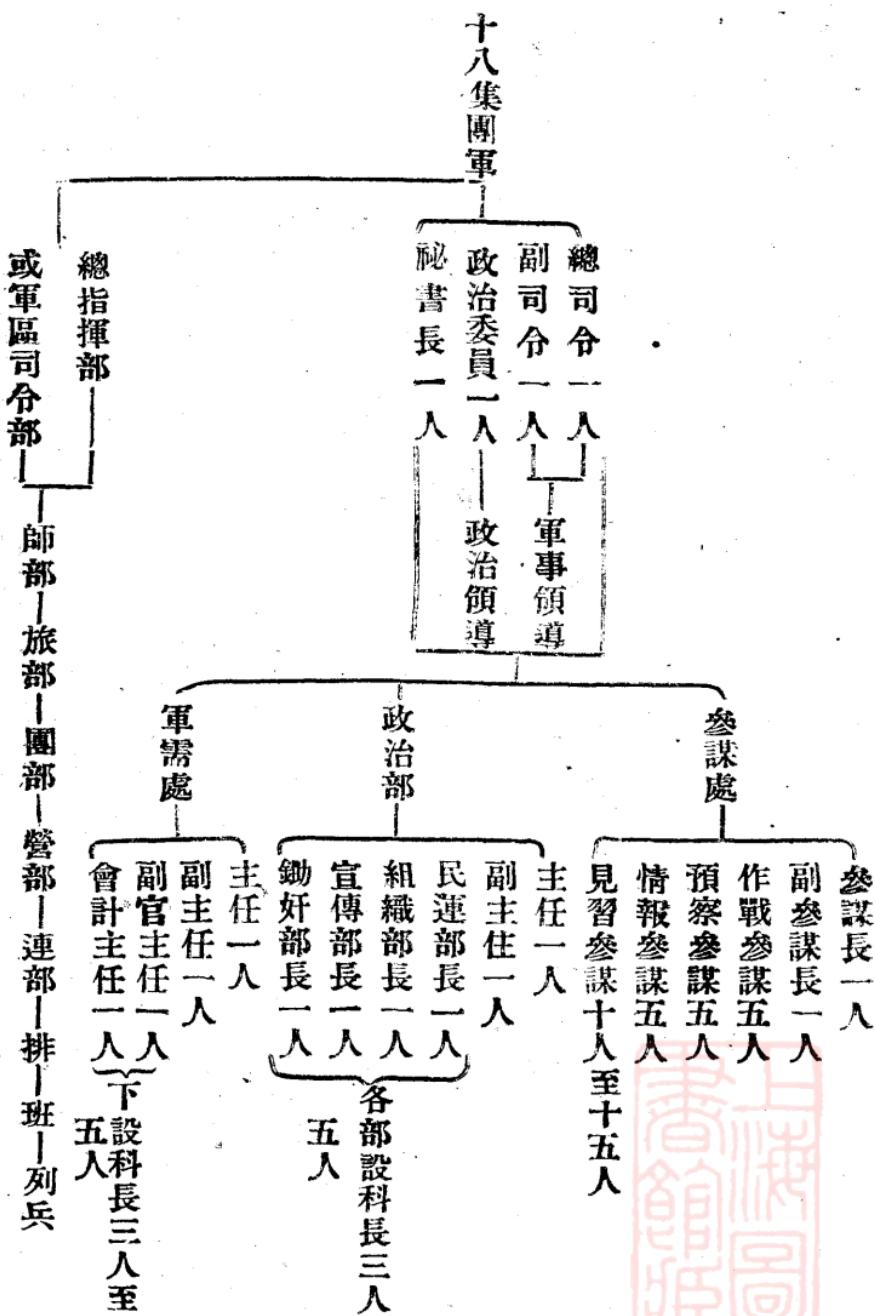
(二) 迅速恢復各省共產黨組織，擴大活動範圍。

基於右述政策，中共在軍事上並不積極參加對日軍的作戰，反之，却極力避免衝突，專力於自身實力的培養與充實。茲將事變後中共軍事的組織及實力簡述於下：

中共  
中央執行委員會

中央政治局  
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周恩來，陳紹禹

中共  
革命軍事委員會



八路軍總指揮

彭德懷

十一路軍總指揮

賀龍

廿九軍總指揮

徐向前

十八集團軍

總 司令——朱 德

後方留守兵司令

蕭勁光

副總司令——彭德懷

冀察晉軍區司令

聶榮臻

參謀長——葉劍英

陝甘寧軍區司令

蕭勁光

政治委員——毛澤東

晉西北軍區司令

計有兵力卅萬

冀熱軍區司令

賀 龍

魯蘇軍區司令

呂正樑

晉冀豫軍區司令

徐向前

東北人民抗日軍總司令——楊靖宇

(計有兵力十五萬)

教

育 長——羅炳輝

政

委——毛澤東

抗日軍政大學——校長林 彪

政治部主任——秦邦憲

共系新四軍成立於民國廿七年冬，其初軍部設於江西南昌，當時關於該軍之建立，所

以能取得渝方之承認者，其原因有四：（一）因國共安協之初，渝方爲表現合作之意見起見，在相當範圍以內，允許中共擴充軍額。（二）該軍成立之初，亦以抗日爲號名，與渝方在同一戰線上，當時全國正在擴軍之際，渝方認爲該軍成立，可以增加抗戰一部份力量。（三）該軍主管人員之支配，事先已取得渝方同意，而將軍長一職，派由與渝方甚接近之葉挺擔任，而以中共之幹員項英副之，（四）其軍素以組織民衆及游擊戰術見長，一般亦均認爲其軍負當游擊工作甚爲適宜。當時渝方以東南各省渝陷區情形混亂，軍政各務，難以策進，故容認中共展開活動。該軍成立以後，所有中下級幹部，即全由共系軍事幹員擔任，指揮實權亦不得不因情勢關係，而移轉於副軍長項英之手。

迄廿七年未，該軍成立未久，即將軍部由南昌轉移皖南，並以該地區爲主要根據地，開始積極活動，其時中共東南政治分局，於該軍之掩護下，即在涇縣組織成立，蘇、浙、皖，贛，閩各有共黨機構，亦經該局之策動次第恢復。此後兩年期間，新四軍亦藉各省共黨及政治力量之輔助，更得展開活動，而使所部實力益得加強，控制地區，更形擴大，當時該軍除皖南之主要根據地外，蘇南之溧水，溧陽，宜興，丹陽，句容等縣，亦爲該軍活動之重要地區，而蘇南之沿京滬線一帶，甚至上海附近各縣，以及蘇、皖南北沿長江之地帶，亦均在該軍勢力所能達到之範圍以內是爲新四軍極盛之時期。

然渝共之攜手，原是表面之妥協，實際上自事變以還，中共始終未曾放棄或改變其原有之主張或手段，新四軍既爲中共操縱之部隊，其立場如何，其行動方針如何，自可不言

而喻，故該軍自盤踞江南，在活動區內表面雖以抗日爲名，實則處處避免與日軍衝突，以謀保全本身實力，暗中進行其別具之企圖，如到處宣傳共產主義，麻醉鄉民，吸收農工份子，組織共黨團體，並藉武力爲手段，苛索民間捐稅，搜括地方物資，以謀充實其經濟基礎，兼併地方部隊以擴充所部實力。

新四軍在其盤據之地區內，積極破壞原有地方組織，重組赤系機構，以建立實施赤化工作之主體，其種種手段，無非欲藉抗戰之名，行赤化之實，而達到中共所希望全國赤化之一貫陰謀，但因此引起渝方之直接磨擦，實爲不可避免之後果，蓋新四軍對於所在地區渝方之一切組織機構及施政工作，無不欲一加以排斥以祛除其工作推進上之障礙，又爲達到上項目的，共軍自不能不對渝作種種反動宣傳，惡意之詆譖破壞，以爲吸收農工份子及煽動民衆附和之手段，反之，在渝方爲謀恢復各地方政權，則不能不盡量保持各地政治機構之存在，及各項施政之展開，因之針鋒相對，雙方下層之傾軋，暗中之衝突，乃屬必不可免，且民國二十八、二十九年間，江南太湖地區，及京滬線東段沿線各淪陷區，大部係渝忠救軍活動範圍，新四軍自問力量脆弱爲保全實力起見，既不敢與日軍正面衝突，乃反因日軍之進擊，而移轉地區，不得不向渝忠救軍或其他渝軍防區侵入，引起渝，共軍事上直接衝突，又蘇北方面大部係蘇省政府所屬各地方部隊之駐防地區，亦因新四軍之侵入，掀起該方面渝共軍事上之鬥爭，尤爲劇烈，是以當時渝共在蘇皖之磨擦，已由祕密而公開，由局部而全部。

事態之嚴重，終至引起渝軍事當局之注意。因此乃在二十九年，將華北渝陷區，劃定一部份，為新四軍活動範圍，明令該軍限期北調，此項措置，在渝方表面上之目的，為避免蘇皖等省雙方軍事衝突之擴大，解決渝共間之爭執，實則乃欲將長江流域中共唯一之武力部隊，全部北逐，以謀進一步將東南省所有以新四軍為掩護之中共組織全部加以消滅，此種謀略，終不能勝過狡猾如狐之中共，是以該軍自奉令以後，初則按兵不動，繼則陽奉陰違，假端拖延，而暗中仍不斷進行其赤化政策，繼續鞏固佔據地區之赤系政權，以謀抵禦渝方將來更大壓力之準備，因此雙方下層之衝突，更不斷發生，益趨尖銳，渝府乃採取進一步之手段，責成三戰區司令官顧祝同調遣有力部隊，對新四軍主力取監視及包圍形勢，以便用高壓方法，強迫該軍北調，當時新四軍主力大部仍在皖南，見於上項情勢，實無法再行延緩，始於卅年春將所部繼續移至沿江之繁昌銅陵一帶，以便伺機渡江北竄，但當該軍移至沿江之時，適日軍兵艦多艘，在該處來往巡邏甚密，該軍逗留多日，無法偷渡，不得不作退回原有防區之想，然原有防地，自該軍調離以後，已全部由渝軍接防，該軍雖經一再交涉，要求後退，終無結果，至此雙方猜忌積怨，已達極點，而新四軍當時進退兩難，背腹受敵，實再無法容忍，乃即發動對渝軍攻擊，於是雙方大規模衝突爆發，所謂國共皖南事件之序幕，按此次渝共衝突，原係雙方在東南省數年磨擦之首次總結算，亦為渝共軍事公開衝突之再開始。戰爭經過，頗為猛烈，結果渝方因兵力雄厚，及事先整備周密，損失較輕，而新四軍以實力較差，後援不繼，致所受損失甚鉅，軍長葉挺被捕。

，副軍長項英亦爲渝方所殺，渝軍事當局並以該軍之起釁，爲蓄意反抗命令，破壞軍紀，乃下令取消該軍番號，責成三戰區實施清剿，以謀肅清中共在東南各省之勢力，於是在金華鐵嶺之新四軍後方辦事處，本爲共黨公開活動之主要機關，即被宣告封閉，原設於皖南涇縣之中共東南政治分局，亦祕密遷赴蘇北，從此以後，活動於東南各省之中共份子，除已被捕者外，餘均銷聲匿跡，重復潛匿下層從事於祕密活動，至新四軍殘部旣所存無幾，自再無法立足於皖南，因之相率竄赴蘇北合併原匿該區之部屬，調整人事，整飭組織，繼續從事活動，以謀重整旗鼓，此後該軍名雖取銷，實際因藉中共中樞之撐持在新軍長陳毅之策劃下逐漸恢復實力，並在蘇北一再與韓德勤所部渝軍發生衝突，乘機攫取地方物資，侵入渝軍防地，兩年以來，皖北亦已成爲該軍主要根據地區，此外西至武漢周圍，東南至浙東甯屬三北一帶，均爲該軍涉足範圍以內，可知其勢力膨脹，較之皖南事件以前，更有過之而無不及。茲根據三十一年的調查，中共新四軍，已擁有七個正規師，暨龐大複雜之地方武力，總兵力在卅萬人以上。

#### 中共新四軍之組織可分軍事與行政兩個系統：

軍事組織系統，亦即新四軍所屬各部隊之組織系統，全部可分爲直系，外圍及地方等三種，以直系部隊爲主，外圍及地方部隊爲輔，直系部隊該軍計轄有九個師，每師約轄有三旅及一特務團，每旅各轄三團，軍師各部除部隊長及參謀長外，政治部主任及政治委員在各部隊中亦佔重要地位，其任務在代表黨方，掌握各部隊活動之實權，至外圍部隊大都

由各師旅自行建立，作爲本部隊活動掩護之武力，實際上該軍有不少直系部隊係由外圍部隊逐漸改編或補充而成，故外圍武力之建立，亦含有預備隊之作用在內，又此種部隊之本質，大概係各地方游雜或土匪，經該軍之吸收，加以改編而成，故其範圍無一定限制，而番號及組織亦常變動不定，難以捉摸，至地方部隊包括赤共區內各縣之特務營，特務連，或警衛營，警衛連及自衛軍等，其任務不外拱衛各地方行政機關及協助赤化工作之推進，茲將該軍組織系統列表於次：

中共新四軍組織系統

軍長	陳毅	副軍長	張雲逸	參謀長	賴傅珠	政委	劉少奇
第一師長	粟裕	副師長	葉飛	參謀長	吳凱	政治部主任	鄧子恢
第二師長	羅炳輝	副師長	周毛	參謀長	周俊陽	政治部主任	鍾期光
第三師長	黃克誠	副師長	李開甲	參謀長	洪學智	政治部主任	張勁夫
第四師長	彭雪楓	副師長	鄧子恢	參謀長	張震	政治部主任	唐昭
第五師長	李光念	副師長	羅厚德	參謀長	劉少卿	政治部主任	蕭望東
						副主任	吳芝圃
						主任	任賢斌
						副主任	王幹

第六師長 譚震林

參謀長 朱昌魯

政治部 主任

任張英

副主任 駱知行

第七師長 張鼎丞 副師長 傅秋濤 參謀長 孫仲德

政治部主 任胡道周  
給養部主 任林立

第八師長 何靜 副師長 朱人傑

地方兵團軍區司令

蘇中軍區司令 粟裕 淮海軍區司令 黃克誠

淮南軍區司令 紹炳輝

皖鄂軍區司令 李光念 皖豫軍區司令 彭雪楓

江南軍區司令 譚振林

皖浙軍區司令 張鼎丞 聯杭司令 黃逸峯

江杭司令 梅稼生

中共新四軍爲推進赤化工作，在各活動地區，均設有行政機構主持其事，根據三十一年的調查，其主要行政組織，計有八個單位。各單位之組織，略有不同，所轄範圍亦大小不一，惟大體係模仿過去地方行政制度，下層組織，亦以縣爲單位，惟各縣所轄範圍，與原有情形多有不同，而彼此間大小亦頗不一致，有將原有兩縣合併爲一者，有將一縣劃分爲數縣者，大概視管轄上之便利，並無一定標準，所取縣名亦多不同，每縣之行政機關爲縣政府或辦事處，縣府之組織在縣長或副縣長以下，設有祕書及民政、財政、軍事、糧政等科，亦有用總務、行政、文教、司法、特工、保安等科名目者，辦事處除設正、副主任外，其餘內部組織，大概與縣政府同，縣以內分有若干區，區之行政工作概由區長主持其事。

，縣以上之行政單位，爲行政區，以督察專員公署爲其行政機構，各種民衆團體亦有直接歸專署管轄者，此外尚有銀行及報社等組織分別負責區內赤共經濟及宣傳等事宜，而蘇省江南江北地區其，行政組織更爲龐大，在專署以上并設有行政公署及行政委員會之組織，指揮所屬各區專署推進赤化工作，茲爲簡明起見，將中共新四軍主要行政機構依地區之不同，分別編列組織系統表於后：（根據三十一年調查）

### 一、蘇省方面：

#### (一) 江南行政委員會組織系統

江南行政委員會主任委員何克希

委員 鍾國楚 羅維道 章永義 溫玉成

民政處處長 李劍 文教處處長 ×××

江南財經處處長 李建模

蘇南行政區專員公署專員樊玉琳

蘇南第四行政專員公署專員管寒濤

武宜太行政委員會主任委員張之宜

句容縣縣長 凌康 丹陽縣縣長 馬雨亭 芜東縣縣長 徐公魯 縣委蔣鐵如

鎮丹縣縣長 包建華 鎮句辦事處主任 巫孔璽 副主任 樊儉

溧水縣縣長 曹明果 副縣長 戴國光 周志遠

金壇縣縣長 葛寶山 副 縣 長 薛 斌 江寧縣縣長 王一凡  
鄱陽縣縣長 陳練昇 副 縣 長 錢震宇 武南縣縣長 陳立平 副縣長陳成  
太湖縣縣長 顧復興 鎮句縣 縣 長 洪添壽 山南縣縣長 黃 鵬  
山北縣縣長 趙文豹 副縣長 鄭文波 之洲縣縣長 戎 藩 武進縣縣長 顧君衡  
揚中縣縣長 施光前 縣 委 陳鼎洪 澄西縣縣長 楊迺章 江陰縣縣長 張志強

(二)蘇中行政公署組織系統

蘇中行政公署主任管文蔚 蘇中第一行政專員公署主任惠浴宇  
第二行政專員公署專員陳國生 政委向明 第三行政專員公署專員朱克靖  
第四行政專員公署專員季 方 政委吉 洛

江都泰行政公署主任萬年生 淮寶鹽三縣邊境辦事處主任彭沖爲  
江都縣長王秉華 高郵縣長丁皓東 寶應縣長劉烈人  
清江縣長祝維翰 泰興縣長××× 東台縣長董希白  
江鎮揚辦事處主任戎振華 治儀辦事處主任陳雨田 副主任郭 石  
泰東縣長董希白 縣委陳揚 如西縣長李愷之 揚中縣長施光前  
江浦縣長葉品之

通海聯防辦事處主任顧爾鑰 副主任沈維岳 季藹若  
如東縣長葉胥朝 南通縣長梁靈光 海門縣長季藹若

啓東縣長沈維岳

(三) 鹽阜行政專員公署組織系統

鹽阜行政專員公署專員宋乃德 民政處長湯鑄 鹽阜銀行財經處長駱耕漠

文教處長白桃 食糧處長李平 鹽東縣長魏一心 阜東縣長唐克

二、皖省方面：

(一) 路西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組織系統

路西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專員鄭抱貞 副主任魏文伯 童漢章

定鳳懷縣長劉叔行 定合縣長陳京 定遠縣長羅平

滁縣縣長蔡家璋

(二) 皖中行政公署組織系統

皖中行政公署主任呂惠生 副主任張愷帆 湖東辦事處主任徐奕齋

和含辦事處主任馬獻龍 銅繁辦事處主任×××巢廬辦事處主任×××

無爲縣長張昌萬 臨江辦事處主任江漢臣 副主任陳一新 合肥縣長陳京適

桐城縣長×××

除上述蘇皖兩省屬於新四軍之行政組織外，在上並有一直屬中共之行政組織，為蘇皖邊區行政公署，主任方毅，副主任汪道涵，其下設有祕書長以及民政、財政、司法、教育、審計、經建、保安、農工等處。惟其組織機構，並不一律。例如閩浙邊區行政公署之

組織如下：

主席何士根，副主席何來，黨代表江華文。其下則設祕書長，民政、財政、建設、教育四廳，以及糧食管理局、村治保甲指導處等。

延安共軍現有的兵力據前年度的計算，在華北方面約有十八萬，華中方面約有四萬五千，合計有二十二萬五千，現在其人數則日漸擴大了。去年七月七日，中日事變七周年的日子，據延安廣播稱，朱德統率的八路軍（第十八集團軍），陳毅的新四軍，合共的兵力有四十七萬餘人。我們也不必信賴這個數字，但重慶對這種宣傳是有很大顧慮的，延安的廣播也繼續着說在過去七年間，八路軍的交戰次數為七萬四千餘次，新四軍的交戰次數為一萬八千餘次，計九萬二千次以上，兩軍死傷共十九萬九千五百餘名，包括參謀長以下軍官幹部五百五十五名。

更根據延安的情報，有一百餘萬的民兵已組織完成了，去年間，其軍的新動向為強化民兵的組織，這一點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延安傾其心血全力的民兵工作，其勢力的强大有擊敗農村，黨支部，及政治機關的趨勢，同時，延安的民衆武裝組織，也一併成功了，但其工作，已發生了別種的傾向，即正規軍隊也是如此，他們完全脫離了農民心理，而成為一種特殊的階級，軍民離間，日甚一日。

民兵不單是一種軍隊，同時對生產運動也負着重大的責任，不單訓練軍事，同時訓練政治，算是共軍的一部分。以下是民兵一般的現況實態，還是根據現地的調查資料的。

所謂民兵，已脫離生產而成為一種民衆武裝的形態，通常赤色根據地的民兵稱爲青年抗日先鋒隊及基幹隊。青抗隊爲十八歲至二十五歲的青年，基幹隊爲二十六歲至三十五歲的壯年，青抗隊，基幹隊在鄉村分爲警備自衛隊，婦女自衛隊，爲民衆的武裝組織，由人民武裝抗日自衛委員會領導。

武委會（晉察冀邊區人民武裝部改稱）受政府直接的指揮，積極的擁護其立場，確立武委會軍區制，以使作有系統的指揮，每一軍區有一軍區司令，下設團，營，連長，由地區的武委會指揮，人民武裝組織全在軍的握掌下，辦理軍區制的設立與軍民的有機的結合，使民衆的力量與軍事目的打成一片。村內的民兵組織系統，例如在太行軍區每一村的武裝委員會的設立，由五十戶至二百戶的村，選出武委會委員三名，分擔主任，副主任，政治指導員的工作，二百戶以上的村，則選出委員三名至五名，分擔主任，副主任，政治委員，青抗隊，基幹分隊長的工作。隊的編成，以一村爲單位，成立一中隊，一中隊包括青抗隊基幹隊，警備自衛隊，婦女自衛隊以及各分隊，各分隊之下爲小隊，每小隊的人員由五名至十名。武委會主任由中隊長兼任，副主任由副中隊長與警備自衛隊分隊長兼任。村武委會隣接的村未有武委會設立的，設立民兵分隊長及小隊長，以便招收該村的村民，同時統一指導該村的青抗隊與基幹隊。武委會領導村的民兵，委派民兵分隊長，其青抗隊，基幹分隊長，則由隣村民兵分隊長兼任。

延安的民兵工作，其目的爲完遂抗日作戰，在完遂抗日過程中，使民衆成爲武裝組織

化，遂行革命所決定的力量，并培養確保起來，民兵工作，是民衆運動的一種，進行密接的結合，中共的機關雜誌這樣說過：我們的民兵工作，其任務一方面擴大民衆運動中的民兵，一方面利用民兵作為民衆保衛的力量，民兵與民衆的利益打成一片，使廣大的民衆在遊擊戰爭中獲得民衆運動的展開，民兵組織工作有如次的條件：

(一) 民衆工作的結合民衆工作的進展，為對敵鬥爭的發展中的民兵組織。民兵工作與民衆運動打成一片，這是極容易展開的。

(二) 民兵的組織，要有嚴密的編制，以強制命令的方法來組織，民衆自動的參加民兵組織工作，俾得擴大民衆知識運動，最重要的為與黨支部掌握與領導下，民兵教育採用正規軍的教育內容與方式，在軍事方面，民衆遊擊戰爭為必要的實際教育，政治方面，以民主民生具體的問題為出發點，以明白武裝民兵自身的理由而實施其自覺的教育。

延安對民兵工作根本的目的，在於使「民衆武裝組織化」，現下的抗戰階級，是有直接應用的必要。

一、正規軍兵力的維持困難。共軍只有靠後方為補給，以公糧來維持龐大的兵力和其他軍需品的消耗。民衆有了負擔，民衆應得回利益，延安立足點的喪失，完全在於正規軍兵力的縮減，補充與擴充地方兵力，縮減兵力歸農，俾生產力得以增大。

二、生產力增強的受阻，民兵在自己鄉裏從事生產，若有了武裝，生產力必受影響。  
三、土地聯絡的受阻民衆與民兵都持着利用土地的心理，對鄉土保衛的念頭甚強。

四、根絕逃亡者兵軍最煩惱的事情就是逃亡的日衆，民兵捨不得父祖傳下來的土地。

五、優秀幹部的活用對於精兵與優秀幹部，充分的活用，強化地方武裝。  
六、大量損害的迴避，遇日軍掃蕩時，應避免大量的損害，要知道民兵的剿滅甚難，終有反掃蕩的勝利。

七、戰鬥時的祕匿，遇日軍襲擊時，應配合民兵，并集結其兵力，在日落後一致行動，途中的民兵設備，在一個目標地點中，一夜中最少集結數十人兵力使用，在退却的時候，民兵逐次散歸各村。

八、治安地區的反封鎖，治安地區切勿侵入的應監視敵人的逃脫，嚴戒漢奸與特務分子。

延安因為對於民兵工作有「黨的民兵工作掌握得不完全」，「黨員的民兵工作對於積極性的稀薄」，「農村富農中農的存在」，「羣衆工作的展開不良，民衆協力不充分」，「民衆的政治意識低調」等等原因，致使工作的進行受到莫大的阻礙。但其前途的發展，實在是頗堪注目的。

# 新民主主義・三三制・三風肅正運動

民國三十年五月一日，中共陝甘甯邊區中央局得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批准，公布了「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此即所謂「五一施政綱領」，以「團結邊區內各階級，各抗日黨派，發揮一切人力、物力、智力、以保衛邊區、西北、全中國」（見同綱領第一條）為目的，並希望「各黨各派及一切人民團體參加選舉。被選舉人名簿中，共產黨確定限制為三分之一，以使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的人士，均有參加管理邊區民意機關及邊區行政的機會，若共產黨黨員當選為行政機關的主管人員時，該機關的職員中，保證以三分之二的黨外人充任，共產黨員對此等黨外人士實行民主的合作，不得有專制的獨斷的行為。」（綱領第十五條）。此即所謂「三三制」的基礎。並容許地主土地私有，資本家經營企業（第十條及第十一條）。此一施政綱領，不單施行於陝甘寧邊區為限，並得準用於其他抗日民主根據地。構成此三三制之份子，毛澤東曾於三十年十一月第二次陝甘甯邊區參議會席上，演說稱：

(一) 中共的目的，在與各黨各派合作，實現三民主義的各原則。

(二) 中國尚未存在實現共產主義的前提條件，

(三) 中國社會多數為中間階級，無產階級與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為數甚少，故若漠視

中間階級的意向，即不能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

(四)共產黨員之中頗多陷入獨善主義，與黨外人士意志欠缺疏通，或甚少認識與黨外人士民主合作的意義。共產黨員絕對無剝奪他人發言自由的權限。對於此種中國社會構成的主張，實與中共從來的見解完全相反，此不僅為一純理論的問題，而實為中共實際政策上一種極大的轉變。

什麼是新民主主義？彭德懷說：「確定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民主政權，即整個抗日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是對漢奸親日派以及其他反革命份子專政。」「這民主政權的戰鬥的理論是新民主主義，而其組織的形式則為三三制。」

中共的「新民主主義」之前身是「工農民主專政」，「工農民主專政」這口號最早出現，是在一九〇五年的俄國革命。當時列寧把工農民主專政看作由沙皇式的資本主義統治到無產階級獨裁的中間階段。他的理由是，沙皇式的資本主義的發育是不健全的，所以需要一個過渡纔能走到無產階級專政。他在兩個策略裏說明，「工農民主專政乃是資本主義的革命。」但也因此，「過渡」的意義便不顯明，它變得不是資本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間的一個階段，倒是屬於資本主義革命的階段的。於是來了矛盾，因為，以無產階級來領導繼續完成資本主義革命，事實上是不可能，無產階級可以繼續完成資本主義所未能完成的生產力發展，但這樣就不是資本主義革命，而是社會主義革命了。所以，工農民主專政既不能是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中間階段，也不是屬於資本主義革命的階段。事實上

它是不存在的。當時托洛斯基就反對列寧的這口號，而提出「不斷革命論」，認為不但不應停留於工農民主專政，光是承認有工農民主專政這個階段存在就是革命的停留，就是中斷。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的事實糾正了列寧的這一口號。克倫斯基政權就是工農民主專政，它不同於沙皇政治，也不是無產階級專政，可是有蘇維埃。克倫斯基政權只存在了八個月。說它在這期間已完成了俄國資本主義所未完成的任務，那是不可置信的。而在這八個月中，克倫斯基政權事實上可以說是沒有一天是工農民主專政。列寧的四月政綱提出「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在此以前，是雖有蘇維埃而並不能把握政權。經過幾個月的鬥爭，政權歸於蘇維埃了，但就在這同時，克倫斯基政權就讓位給無產階級專政。克倫斯基政權甚至連召集憲法會議的時機都不得歷史的許可。在這鬥爭的緊接展開之際，列寧被那些信奉他過去提出的工農民主專政的口號的老布爾什維克們所激怒了，他說：「政權歸蘇維埃」與「召開憲法會議」這兩個口號昨天是準確的，今天就成為過去了；今天的口號應當是「無產階級專政」，只有無產階級專政纔是政權歸蘇維埃與召開憲法會議的準確的說明。

這事實上未曾存在過，也不可能存在的工農民主專政，後來却被史太林當作寶貝，以命令應用於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中國革命。他把國民黨看做四個階級的聯盟，等於蘇維埃，認為應將政權歸於國民黨，猶之乎政權歸於蘇維埃，並且以為這是繼續完成中國資本主義革命，也就是工農民主專政，這樣子可以相安無事，直到中國資本主義革命最後完成那一天的。不料來了蔣介石的苦迭撻，中共焦頭爛額地躲進江西，還是把這從上頭頒發下來的

工農民主專政帶在身邊，以長長的歲月來試驗。結果怎樣呢？弄成羅伯斯庇式的恐怖政治。

中共在江西是倣照俄國的軍事共產時期，並參照新經濟政策時期的辦法，即是：沒收土地，沒收大工商業，而容許小的私有經營。但土地國有的保證是要有鞏固的集體農場，工廠國有的保證是在社會主義的實際提高生產力。在做到這一步以前，蘇俄的農業不能不訴之武裝徵發，與武裝制止怠工，工廠方面也要用強力的政治纔能維持繼續生產。這種靠軍事與政治的強力來維持經濟，而不是以經濟力自身來維持經濟的場合，列寧他們當時之倖免於失敗，是有着一個前提的，即此種軍事與政治的強力是操在無產階級（是工人，不是農民）的手中，所以不致走上羅伯斯庇的恐怖政治的覆轍。可是中共的政權却是建築在農民身上的，農民自身是要怠工的，農民自身也不能戰勝富農與地主，（蘇俄的農民是與工人結合，並且依靠工人專政的力量打倒了富農與地主），這樣，中共就需要比俄國軍事共產時期還更強大的權力纔能維持這局面。而這本來是建築在農民身上的權力，現在却變成以農民為行使的對象，這和蘇俄之以無產階級（工人）的強力來對於農民行使，有一個顯然的區別。結果是，這權力終於離開了農民，而凝成爲一官僚集團，這官僚集團便是政治的原動力行使鎮壓與統制，墮落到恐怖政治了。蘇俄是以沒收全國銀行資本與工廠，以發展重工業作爲發達輕工業與建設集體農場的槓桿，而中共的山上馬克斯主義則無論如何努力，用農業來推動農業，結果還是枉然，這就不能不長期地訴之武裝徵發與壓制怠工，

而愈長期，恐怖政治的性格也愈深刻，成爲這恐怖政治的主體的官僚集團也愈脫離農民，成爲無根之花，隨風飄落，終於非逃出江西不可了。工農民主專政呢？根本就沒有過，也不可能有。

這失敗的教訓使中共不能不重新尋求與農民妥協的方法，而在這樣的場合與農民妥協，其實乃是與地主富農妥協，同時也就是與資產階級妥協。於是中共斷然放棄了土地國有的政策，而採取減租減稅政策，並且規定了三三制的「民主政治」。

所謂三三制者，根據中共的指示：「即是各級政府的民意機關與執行機關，均應以代表無產階級及僱農的共產黨員佔三分之一，代表小資產階級的進步份子佔三分之一，代表中等階級的開明士紳、名流、學者、佔三分之一。」原來行使三三制的乃是參議會，不是蘇維埃。蘇維埃是從一九三七年被取消了，代替的就是參議會。這兩者的主要不同點是：（一）蘇維埃是會議的機關，同時也是執行機關。因爲是會議的機關，所以中共的政治路線，例如要不要土地國有之類都在蘇維埃決定的。因爲同時是執行機關，所以不但行政，連民衆運動與軍隊都操在蘇維埃手中。但參議會則只是「立法和行政機關」，這裏所謂「立法」是狹義的，即參議會只能決定政治方案而無權決定政治路線，所謂「行政」也是狹義的，即參議會只能執行政治行爲的一部份，例如軍隊就與它無關。

取消蘇維埃之後，決定政治路線的最高權力機關乃是中共的黨代表大會。並且，軍隊是把握在中共的手中的，中共對參議會的距離，大於對蘇維埃的距離。因爲這個緣故，黨

爲更超然的，可以拿黨的力量來保持三三制的平衡。但也因爲要保持三三制的平衡，黨農民之間新出現了某種隔離，而使黨陷於孤立。這樣，黨的性格就變成了官僚集團的性，而以軍隊與特工爲其權力的最後支點。

所以中共說不是一黨專政，其實還是一黨專政，不過不是無產階級或農民專政，而是資本階級專政。但它所代表的資產階級是庶出的，是傍支，這是中共政權和蔣介石政權僅有的不同點。

同年（民國三十年）夏，中共突然發起了「三風肅正運動」。所謂「三風」，即「黨風、文風、學風」，對黨的作風上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教條主義三種偏向，加以糾正。毛澤東於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八日在中共中央宣傳幹部會議席上，曾以「反對黨八股」爲題，發表演說，指摘所謂黨八股形式主義的八大罪狀：

- (一) 羅列空言，缺少內容。
- (二) 以虛勢威嚇他人，自己則抱持獨善主義。
- (三) 無的放矢，空標口號。

(四) 議論枯燥無味，千篇一律，對於民衆自身使用的言語，全然不知，盡爲黃色的書生議論。

(五) 黨八股的論文或報告，舉出A、B、C、D、甲、乙、丙、丁、子、丑、寅、卯等項目條例，實際對問題的提出與分析，全與事象無分毫關聯。

(六) 輕率爲文，毫無責任。

(七) 黨八股流毒全黨，爲革命成就的障礙。

(八) 黨八股的惡風傳播，實足禍國殃民。

毛氏指摘以上黨八股的八大罪狀，主張實行澈底的肅清工作與清掃工作。

肅清工作開始於五一施政綱領公布不久，於同年（三十年）七月一日中共立黨二十週年紀念日發表了中共中央的「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即強化黨的「布爾塞維克」性，八月一日中共中央更發表一「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其中指出對中國的歷史及自身一切環境與條件若不理解，則革命的成功必不可不可能，因此主張蒐集縣志，府志，省志，家志，地圖等，而加以充份的研究。

自三十年夏開始，中共內部的肅清運動，逐步強化。至三十一年四月三日中共中央宣傳幹部會議關於三風肅正問題，指定二十二種文獻爲黨員，學生的必讀文書，並予黨員以三個月，學生二個月的學習期間，以了解三風肅正的本義，與如何把握新作風的精神。

自九一八事變，第一次上海事變後，中共利用了中國民衆反日意識的昂揚，因有蘇維埃中央一九三二年四·二六對日宣戰通電，黨中央一九三二年九·一八對日宣戰通電，翌年一九三三年一月十四日的停止內戰宣言，以此爲端緒，而後有一九三五年八月所謂「抗日救國宣言」（或稱「八·一宣言」），以至西安事變及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實現。中共謀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結成，作爲媒介，企圖將以智識份子爲中樞的中間階級及勞動者、

農民加以廣汎的再組織。事變以後，經過數年抗戰的過程，中共自己號稱已擁有五十萬大軍，八十萬黨員，一萬萬人民的擁護，此次三風肅正運動的發足，實為彼等對「勢力擴大」之實質，加以反省的胚胎。

因中共勢力增大的速度過急，黨員的素質，不免低下，以前中共黨員之構成，以都市小資產者，知識份子與農村小生產者出身占有壓倒的比率，但自黨，軍急速膨脹以後，中下級幹部的大量生產，其結果「異份子，投機份子，落伍份子相繼混入黨內，幹部的訓練與經驗，俱感不足，多數黨員的政治，文化水準，極為低下」（中共華中局一九四二年第一次擴大會議決議）。毛澤東所指摘的八大罪狀中的弊病，隨處可見。例如華中方面，「在一千五百萬人口中，受組織於民衆團體內者，僅不過百萬人」（華中局前述決議）。

中共的三風肅正運動，主觀的意圖，乃在謀黨性的增強，而客觀現實的條件，對於中共勢力發展的前途，是否樂觀，尙難斷言。

# 一對左傾的美國夫婦筆下的西北特區

一九三八年美國左派名記者斯諾夫人韋爾絲女士由西北特區出來後，在美國「亞細亞」雜誌上發表了一篇「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轉變前後」一文，對於中共西北特區的動態，記述頗詳，不過斯諾夫人是一位同情共產黨的女作家，因此在她的筆下，西北特區的情形，不免多被描寫成光明、有生氣的樣子，而過分誇大之處，更所不免。現在把斯諾夫人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轉變前後」一文以及斯諾氏發表在美國 Pacific Affairs 雜誌第十卷三號上的「中國西北新社會」一文，一併節譯在下面。

##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轉變前後 Nym Wales

延安是那流動的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的所在地。這一個位置在陝北的古城，它的歷史陳蹟本來就很具趣味，但當然是從來沒有像目前所遭遇的一切那麼地奇怪的。因為在延安，在平凡的歷史過程中，正演進着一件很平凡的事。

我現在是在延安的一間小房間裏寫這篇文章。目前，延安縣正在舉行着中國空前未有的第一次的民主選舉。這一個選舉自七月十五日開始，要到十月底才結束。當所有西北各蘇區的選舉結束以後，中國的蘇維埃即將撤銷，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也將改稱為「陝甘寧」。

## 三省邊區」了。

我偶然從那紙的窗格的破孔中望到天井裏，看見那位從祕密警察局派來的護衛，正在很小心地用手指撫摸着他新備的舊的布質的「紅星」，那是從江西長征以來他一直備帶着的。當這顆紅星破碎得不能辨認的時候，他總是自己把它補好。但是，這裏已再不能看見紅星了。即使是朱德，也戴着國民革命軍的帽子。史沫特萊也一樣。整個中國紅軍現都穿着由南京發下的國民革命軍制服。紅軍的名稱也不再存在，他們已成爲中央政府統治下的一支軍隊、中國國民革命軍的第八路軍了。

從表面看來，現在是無法把中國紅軍和過去的國民黨的敵軍分別出來的。他們在過去，曾在中國的一半省份中喊過蔣介石崩潰和死亡的口號，但現在却很愉快地接受了蔣的抗日命令。這是一種很有趣的政治現象。這一支十萬人左右的革命軍隊，爲謀在中國建立蘇維埃，曾作過血的奮鬥，而奮鬥的年份已恰當蘇聯歷史的一半。十年以來，它的基本隊伍幾乎每一天都在和由國民黨制服所代表的一切東西相戰鬥，而這一種制服正是他們現在穿在身上的。這支軍隊是完全建築在軍事共產主義的基礎上；現在，這一支十萬人的軍隊，正很馴服地接受着共產黨所頒發的這一個命令，一點也不表示反抗。這種情勢怎麼會可能的呢？自七月七日中日戰爭爆發以來，我們就不難了解這種情勢；但整個問題却在兩年前早已決定了。當我在五月裏抵達延安時，這種變動就已迫在眉睫了。這種原因是：共產黨

統治人民大眾的權力是很為鉅大的；但這一種紀律的養成，是因為從一九三五年八月以來，共產黨會為了使人民大眾理解中國革命的性質，從事了極普遍的教育工作。

這是不是放棄蘇維埃的勝利呢？這是不是中國共產黨員們的失敗或者是他們的一種戰略呢？延安的人們，並不抱着上述的見解；他們是以很理智的、根據事實的眼光來觀察這一個問題的。他們接受這一種變革，是因為他們認它為一種歷史的必然，是尚未完成的中國革命的發展的一個新的階段。他們認為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是從土地革命進至反侵略革命的階段。

對於這一個問題，我可以引述被當做中國的列寧的毛澤東的意見。譬如，他在五月裏向共產黨大會的演說中稱：「我們擁護革命變質的理論。民主革命將變成社會主義。在這民主革命的過程中，包括着好幾個階段，但這些階段都是在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之下，而並不是在蘇維埃共和國的口號之下的。……我們不是托洛斯基者，不是半托洛斯基者，也不是李立三主義者。我們主張『革命的變質』，而並不像托洛斯基者的所謂『不斷的革命』。我們是為了通過民主共和國各必要階段以達到社會主義的目的而奮鬥着。」

有許多人認為這一種變革是「退一步進二步」的辦法。

托洛斯基派認中國的革命是在無產階級的階段而不是資產階級的階段。他們很強烈地指摘共產黨的國民黨結成聯合陣線的政策謂：「這是小資產階級農民軍隊在欺騙中國的無

產階級，在替蘇聯在中亞細亞的前線擔任着防衛工作」。

而其它托洛斯基派人士的意見却正和這相反，他們的批評是：「他們（指共產黨幹部派）早就不應該在一九二七年時企圖建立蘇維埃；至少，他們在一九三二年時就應該放棄這一種企圖了。他們不該欺騙無產階級至這許多年。」

這時，我就走進天井中去，預備去探詢一些問題。在這小小的石砌的山谷中，發着來復鎗射擊的回聲，戰鬥員們正在試射着他們的槍械準備到前線去服務。在牆的那邊，可聽到正在開着什麼會，或是唱着保衛瑪德里的聲音。在我們這庭園中，組織部正在掘挖着防空窟，以防備日機的襲擊。幾天前，曾有二架日機來偵察，隨後又來了五架，有三位孩子兵，他們是被稱做「小鬼」的正坐在高泥堆上，像喜鵲一般喋喋不休地談着他們從四川和甘肅的家鄉出發長征時，路上碰到空襲的種種冒險經過。

有一位正在掘防空窟的、過去是紅軍的戰鬥員——紅軍從來不用「兵士」這名稱的，——身上穿的是一條畫着米老鼠的短褲。

在這圍着大的圍牆的庭園中的一個房間門前，坐着許多從北平各大學來的避難學生，他們就都穿着日本貨的網球鞋，跑着好許多哩的路才到這裏。他們正在讀着新中華報紙上的關於上海和華北的戰事消息，這一張報在不久以前的名稱是紅色中華。自六個月以前這裏宣佈了新的政策以後，有好幾百位資產階級的非黨員青年男女都到這裏來加入曾被稱為「紅軍大學」的「人民抗日軍政大學」來受訓練。我曾聽得說，在情勢改變以後，白區裏

的黨員數目已激增了十倍。

我跑到了這位祕密警察局派來的護衛的面前去，中斷了他對於「紅星」的沉思，我問他對於蘇維埃的變革有什麼感想。自然，他是曉得一切的答案的。他在祕密警察局裏會受過特殊的政治訓練。但我必須說明，這裏現在已不再有祕密警察局了，他們都已改編成保安隊，正和中國其它各地保安隊的名稱一樣。所有赤衛軍和游擊部隊，也都被編入保安隊中去了。

當我和臨時中央蘇維埃政府的主席董必武氏談話時，曾問起他關於蘇區中民衆的態度。他很坦白地回答說：「所有民衆都更喜歡原來的蘇維埃，這對於他們是簡單而舒適。地主們或將喜歡新的民主政治，但是留在這裏的地主人數很少。當我們想允許給地主們以投票權利時，發覺了相當的困難。民衆們不明白為什麼有給地主們以投票權利的必要。農民們更擔心他們的土地會因此重行歸還給地主。在陝北甘露縣，就有二個區域的民衆不願給地主以投票權利，這問題至今尚未解決。但是，大體上說來，民衆們都很爽快地放棄了蘇維埃。他們信任共產黨的領導，認它所做的都是在替民衆們着想。可是，他們不能明瞭：這種雜複的變革究竟有什麼必要。也有少數人不能明瞭這種變革對他們究竟有怎樣的好處。」

我也會把這個問題問冀豫贛蘇維埃（那裏約莫仍舊有一萬多民衆）副主席鄧鳳（譯音），他的回答也差不多：「民衆們不能很清楚地了解這一種變革的必要，但他們信任共產黨的

領導，並決意服從蘇維埃政府的任何決定。」

他補充着說：「我們這區裏若干地主們已經寫信給蘇維埃政府，要求重返故居的特許

在新的選舉中，除了少數因不滿十六歲、精神缺陷或犯罪者按法律不得參加外，都有普遍的選舉權。在過去蘇維埃制度內，地主和資本家們不得參加選舉，但現在却有著同樣充分的權利。各黨各派都有權公開提出他們自己的候選人，並為他們的政策從事宣傳，以和共產黨相競爭。但迄現在為止，沒有一個其它的黨能使它自己享受這一種機會。大多數被選出的代表都是共產黨員。比如說，在延安縣的北區，被選出的一百〇九個人中，就有八十個是共產黨員，其中十五個是女的，在若干場合中，地主們為他們自己的利益組織了一個運動，但據董必武說，到目前為止，因為人民大眾們的反對，這些企圖都失敗了。選舉的方法有用舉手表示的，原來計劃採取祕密書面投票制，但因許多人的不識字，所以無法實行。

共產黨在他們的區域裏所採取的民主政治的方式是很特殊的。據董必武對我說：「這稍為有些像法國的代表制度，但它並不模倣任何別的國家，而祇是由於地方上的特殊需要而自然發展起來的」。事實上，這是一種新的試驗。各村落的代表選舉，自七月十五日開始，在八月裏完成。隨即由各村落選出的代表舉行區代表選舉，由區代表選舉縣代表，然後，由縣代表中選出可以參加「陝甘寧邊區」全區大會的代表。選舉的比例是：鄉、每二

十個選舉者舉出一個代表；區、每五十舉一；縣、每二百舉一；然後每一千五百的縣代表中選出一人參加全區大會。據董必武稱：該「陝甘寧邊區」大會至少將有五百人參加。大會將選出邊區的行政長官一人，然後由南京政府任命之。該大會有完全的立法權，為三省邊區的統治機關。

當作者寫本文時，選舉尚在進行中，預料當可於十月底結束。因為連日大雨，交通阻斷，故尚無一般數字可資統計；但據董必武的估計，在有選舉權的民衆中總有百分之六十至八十的人參加投票。祇有年老的婦女們才對新政府不大感到興趣。

在十年以前開始的中華蘇維埃的這一章史詩，就這樣結束了。「蘇維埃」的口號是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南京事變以後所舉行的「第一次共產黨代表大會」中決定的。第一個蘇維埃是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七日成立於廣東海陸豐，在一九二八年二月廿九日結束。同年十二月十一日，廣州公社成立，但三日內即被毀。從那時起一直到一九三〇年為止，他們專門從事於暴動和游擊戰。從一九三〇年六月至是年底為止，李立三的盲動政策真是到了登峯造極的地步。在那時期中，紅軍企圖奪獲大的城市，但沒有成功。自李立三路線被清算以後，地方蘇維埃即有迅速的發展。一九三一年成為了劃時期的一年：游擊部隊改做紅軍的正規部隊，游擊區域改做蘇維埃。自十二月十一日中央蘇維埃選舉至一九三四年二月一日舉行第二次蘇維埃大會這一時期中，蘇維埃權力有長足的增加。在這時候，所有蘇區裏的民衆達九百萬，單單江西一省就有二百五十萬人。

蔣介石在最初四次的大圍剿失敗以後，在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圍剿時獲得了成功，強使共產黨不得不放棄他們的蘇維埃，使紅軍不得不實行向北方長征，費了一年功夫才告一段落。放棄「蘇維埃」的決定是在八月一日宣言中發表的，但國民黨拒絕共產黨提出的談判條件。因此，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以前，聯合陣線的運動很少發展。共產黨謀和國民黨及蔣介石合作；這次西安事變的得以和平解決，幾乎全靠共產黨斡旋的力量。在此以後，談判即在暗中進行，但最後的協定是直到抗日戰爭發動以後才成立的。八月初，紅軍接奉命令，同正規的國家軍隊一樣，開發赴前線。

爲代替過去的蘇維埃政綱起見，共產黨提出了十大政綱，希望和共產黨共同合作以謀實現。

- (一) 發動全國力量決心抗日。
- (二) 停止一切對日外交談判，反對南京政府的妥協及動搖態度；
- (三) 勸員全國軍隊開赴前線抗戰；
- (四) 勸員全體民衆參加對日抗戰，予人民以愛國活動及武裝的自由；
- (五) 組織一容納各黨各派的國防政府。
- (六) 建立抗日外交政策，與蘇聯締結軍事協定，並與英美法締結太平洋反日協定；
- (七) 採取抗日財政政策，該政策的原則爲：凡有錢者都應捐助國家，同時實行抵制日貨。提倡國貨的經濟政策。

(八)增進並改善人民的生活，取消不合理的附加稅，減低賦稅及地租；

(九)發展抗日國防教育；

(十)以國共兩黨為基礎組織一全國聯國聯合陣線，以與日本抗戰。

(美·Asia二月號)

## 中國西北新社會

Edgar Snow

且不說共產主義在中國南部所曾表顯的成績如何，單就我在西北所看到的情形而論，確實可算是實行了農村社會的平等。這種情形在經濟方面表顯得最為顯著。但是，在社會、政治、和文化生活等部門，馬克斯主義的指導還不夠充份，而物質條件的種種限制更是隨處可見。在這區域裏，機器工業簡直是談不到；較之中國東部所受工業化的影響，真不可同日而語。雖然種種經濟方面的腐蝕情形，足以反映若干半工業化城市的經濟變革。但在西北，主要的生產方式還是耕種和畜牧。數世紀來，它的文化都在停滯狀態中。但紅軍本身則確實是在中國工業化過程中所形成的特殊產物。隨着紅軍而導入的種種新思想的刺激，對於陳舊的西北文化當然是一種革命。

由於現實環境的限制，使紅軍對初期社會主義的經濟組織，除了着手於政治體制的建立外，不能有所建設。真正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得等他們將來能握得大城市的政權以後。因為在大城市裏，已經有着各帝國主義國家的工業基礎，因此可以把它們隨手取過來

，作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礎。所以在目前，紅軍在西北農業區域裏面的主要活動，祇能集中努力為當前亟切的農民問題——土地和租稅——謀得解決。這政策似乎帶着反動的色彩。其實不然。中國共產黨為認土地分配政策祇是建立民衆基礎的一種步驟，目的在鼓勵民衆積極努力，以奪取政權和獲得澈底的社會主義變革的最終實現——在這過程中，集體化將成必然的趨勢。在馬丁勞倫斯(Martin Lewrence)所著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根本法(Fundamental Laws of the Chinese Soviet Republic)(一九三四年倫敦出版)一書中，曾

有這樣的記載：一九三一年舉行的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對於中國共產黨最大限度的工作綱領有詳細的規定，在那綱領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目的，是在建設真正澈底的馬列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但在同時，我們必須曉得所有蘇區裏的社會、政治、經濟等的組織，自始就都是臨時性質的。就是他們在江西的時候也是如此，因為他們最要緊的是先得努力奮鬥以爭取本身的生存。所以他們的主要工作，倒不是想謀共產主義得在中國實驗，而是在努力於建立一種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基礎，使得革命事業能夠得到廣泛和深入的發展。有些人以為紅軍正在那麼一個小小的被封鎖的區域裏實驗共產主義，這種想法實在是非常的幼稚。

很顯然地，在蘇區裏面，紅軍的所以得到擁護，並不是因為他們抱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主張，或是抱着孫中山先生所說「耕者有其田」的主張。紅軍所實現的最值得稱道的而為農民謀福利的是下列四項：(一)土地的重新分配；(二)高利貸制度的取消；

### 三）苛捐雜稅的取消；和（四）特權的階級的廢除。

在理論上，蘇維埃的政府是應該包括工人和農民的。但事實上，差不多全部選民都是農民，因此政治體制當然也和這種特質相適應着。當局想把農民間勢力的高下，設法使之平衡，因此把農村裏的民衆區分做下列幾種階級：（一）大地主，（二）中小地主，（三）富農，（四）中農，（五）貧農（六）佃農（七）雇農（八）手工業勞動者，（九）流氓無產階級，以及（十）那些被視為農村知識分子的像教師、醫生、技術人員之類的自由職業者。這種區分，一方面是政治的一方面，當然也是經濟的。他們使得在實行蘇維埃選舉時，佃農，雇農和手工業勞動者之類的勤苦大眾，比較那些富有者可推舉更多的代表。這種目的顯然是在造成某種性質的農村無產階級的民主專政。但是，在那種被劃分的階級裏面，我們却很難看出他們在根性上有什麼重要區別，因為他們都是直接和農村經濟發生關係的。

在那些政治體制穩固的區域裏面，蘇維埃的工作很有成績。代議政府的機構是以鄉蘇維埃為最小單位，在這上面，有着區、縣、省、以至於中央蘇維埃。每一鄉都得選舉它們的代表出席較高的蘇維埃，這樣一直到全蘇大會。十六歲以上的民衆有普遍的選舉權，但這種選舉權是不平等的，理由已在前面說過了。

當紅軍佔領一地之後，就立刻舉行熱烈的選舉運動，隨即召開民衆大會，產生一個被稱為革命委員會的全權委員會。這委員會和共產黨保持着密切的聯絡，並且負責辦理初選、複選工作。在每一蘇區之下，由它任命的：有教育、合作、軍訓、政訓、土地、公衆衛

生、游擊訓練、革命防衛、擴大紅軍、農村互助、紅軍耕種等等委員會。這類委員會，在各級地方蘇維埃以至中央蘇維埃都有。但政策的調節以及國家大計的決定，則都由中央蘇維埃主持。

共產黨的民衆組織工作並不僅限於政府本身，在各鎮各鄉的農民和勞動者中，就有着廣泛的黨員。此外，並且把大多數的青年羣衆組織起來，編成「少年先鋒隊」和「兒童團」。共產黨並且把婦女大眾，也分別編制在共產青年團、抗日會、看護學校、紡織學校和婦女耕種隊等組織裏面。成年的農民則被分別編制在貧民會和各種反日團體裏面。甚至那些從來是盜匪組織的「哥老會」之類，也把他們蘇維埃化，而給以公開和合法工作的機會。此外，像農民隊和游擊隊，都在農村政治社會組織裏面佔着重要的地位。

上述許多組織和各種委員會的工作，都同時受着中央蘇維埃政府、共產黨和紅軍的指導。雖然那些團體的發起組織、徵求會員、策劃工作等，似乎都由農民本身用民主方式加以決定，但實際上都受着黨員們的直接指導，而使各團體相互之間保持着密切而有機的聯繫。這種蘇維埃組織的目的，顯然是要使每一個成年男女和兒童都成相當的組織中的一員，而從事於被指派的固定工作。

蘇區裏面對於增加生產和利用荒地所取的方法和種種努力，頗見成效。我曾搜集得許多由土地委員會分發到各支部去、指導它們怎樣宣傳和組織民衆、以從事於墾植工作的命令這種命令的內容，看來廣泛得使人驚奇，却都是些合乎常識而有實踐性的東西。我在某

土地委員會的支部裏，曾看到一條關於「春耕」的命令，內容是督促那些工作人員，不取任何強迫的方式，用廣大的宣傳誘導農民們自動地來參加春耕。在早一年的冬天，當局就決定了在這春耕時期如何達到必要任務的四種詳細規劃：（一）更廣泛地利用荒地和擴大紅軍的耕田；（二）增進農作物生產；（三）使農作物時常換種耕植，特別注重於菜蔬和瓜類的換種耕植；（四）推廣棉花耕田。

在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土地委員會所頒布的命令中，對於如何增加勞動力量，尤其是如何使婦女們直接參加農業生產（特別是那些因參加紅軍而男子人數驟形減少的區域裏面）的辦法曾有詳細的規定。其中有一段規定得頗為卓越而有趣，由此可見對於紅軍每一種有利的條件，都在儘量地利用着。這一段的規定是：

「動員所有的婦女和老幼，一起參加春耕運動。按照各人的能力，使他們在生產過程中分別擔任繁重或輕便的工作。譬如說：天足的和年輕的女子，應該把他們組織成各種生產教導隊，並且分別擔任清除耕田以至於農業生產的主要工作。至於纏腳的女子，以及老者和孩童，則應該使他們幫同播種、拾糞以及其他種種輕便的輔助工作。」

但是，農民們本身對於這種種設施有着怎樣的感覺呢？一般人總以為：中國的農民是反對組織、紀律以及家庭以外的種種社會活動的。可是，假如你真要抱着這樣的念頭，紅軍們對你祇有發笑。紅軍們深信：假如農民們是在為他們自己而不是為民團、地主或稅吏們在工作着，那麼誰都不會反對組織的。同時，我必得承認，凡和我交談過的農民，多

是半擁護蘇維埃和紅軍的。當然，也有許多農民對於蘇維埃和紅軍很自由地作着種種的批評和指摘，但是假如問他們：「你現在過的日子是否比以前的好呢？」那麼，他們的回答幾乎都肯定的「是的！」我並且很注意到：大多數的農民，當他們提到「蘇維埃」時，總它稱做「我們的政府」。在中國的農村裏居然有這種現象，無疑地是很使我感到驚奇的。

紅軍在民衆中有着根深的基礎。在那些建立較久的蘇區裏，地方上的警衛和治安的維持，幾乎全交給農民們的組織去負責。蘇區內部很少真正的紅軍，全部紅軍的戰鬥力量都在前線。地方上的防衛工作由鄉村革命防衛團、農民赤衛團和游擊隊員分擔着。這種事實，足以說明紅軍的所以被農民大眾所擁護：因為他們並不像其他軍隊一樣把農民們當做剝削和生利的工具，他們却常是在前線和敵人奮鬥，以博取食糧。同時農民們也都有嚴密的組織，鞏固後方，而使紅軍得充份活動，無後顧之憂。

但是，我們必須深切了解，共產黨員活動的所以得到農民擁護，是有着經濟上的基礎的。西北農民過去所肩負着的像賦稅、地稅、徭役等等，現在都一概取消。紅軍到達一地，無疑地給予那些佃農、貧農、中農、以及所有那些赤貧的人的環境一種急劇的變革！因為：（一）在紅軍第一年佔據的區域裏面，各種賦稅全部取消，使得農民們可以透過氣來，蘇息一下。在建立較久的蘇區裏面，則對於土地徵收一種累進稅，對於商業徵收一種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的單一稅；（二）其次，對於那些無地可耕的人分給他們田地，同時把那些廣大的沒有地主或地主已經逃走的「荒地」加以開墾；（三）最後，他們把那些富有的田

地和傢俱加以沒收，而分配給那些貧窮的人。

土地再分配原來是共黨的根本政策。後來，爲着政治上的策略關係，對於蘇維埃土地政策就作了極大的讓步。但當我在西北旅行時，那時實行着的土地法（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西北蘇維埃政府所頒佈）。中規定着：凡地主和富農的田地，假如他們自己不耕種，都一律沒收，他們所能佔有的祇是他們能用自己的勞力耕種的田地。但在事實上，西北很多地方並不感到田地的缺少；所以在那些地方，假如地主和富農不離開他們的田地，那麼那些田地就不會被沒收，祇有那些無主的田地才被加以分配。但有時，對於那些質地良好的田地要重行劃分，使貧農們可以得到較好的田地，而地主們却祇能分配得同樣數量的劣質田地。

怎樣才算是一個地主呢？根據共產黨員們的定義，簡單地說：凡是不靠自己的勞力而靠租田給別人以獲得收入的農民都是地主。根據這個定義，那些土豪和高利貸者就算得是做地主，而應該受到同樣的待遇。根據國聯會史丹裸博士（Dr. Stampar）的調查，在過去，中國西北一帶的利金率竟至高到百分之六十，在發生災禍的時候，當然更高。在甘肅、陝西、寧夏等省的地價，大多數是非常便宜，但是一個赤手空拳的農村勞動者或是佃農，要想積蓄起錢來買進一塊足夠他家用的田地，那簡直是夢想。我在蘇區裏碰到一個農民，他過去就從來沒有能力去買進一塊田地，雖然那時有好多地方的田地只值二三塊錢一畝。

除了上面所述的那些富有階級的田地要被充公外，大多數的農民當然立刻享到這種土

地分配的利益。那些貧農、佃農和雇農們，都有着足夠的田地，可以維持生計。蘇區裏面似乎並沒有意思想使每個人佔有同樣數量的土地。據王寇蘭（譯音）（二十九歲，俄國留學生，任西北三省蘇區土地委員。）向我說明，蘇維埃土地法的主要目的是在使得每一個人都有足夠的土地去養活他和他的家屬。而這正是農民大眾們所最亟切的要求。

在西北，土地問題——沒收和再分配——可以說是非常的簡單。因為在過去，那些大的田產都被官僚、稅吏和離開本地的地主們所佔有，現在祇要把那些地產充公，就能滿足貧農們的亟切要求了。因此，對於那些留在本地的小地主和富農們，就可不必怎樣的苛求了。所以，紅軍經濟基礎的造成，不但是由於貧窮和無地可耕的農民們因為分得了田地而擁護他們，而且在若干場合中，因為消滅了賦稅的剝削，很使富農們感激他們。更有因為上述同樣的原因或是由於反日運動的號召，甚至獲得了若干小地主的擁護。在陝西，有幾位共黨要人。他們就出身於地主的家庭。

對於貧農更給以特別的幫助，放給他們利息很低甚至不取利息的借款。高利貸制度完全取消，但私人間的借貸關係，假如年利不超過一分，是被准許的。蘇維埃政府規定的借款利息普通是五厘。當局並以兵工廠裏製造出來的好幾千農具，以及鉅量的穀種，供給於這些無地可耕的農民，幫助他們去開墾荒地。

蘇區裏已建立了一所初級農業學校。並且據說，祇要能從上海方面請到一位專家，就預備開辦一所畜牧農政學校。

蘇區裏對於合作運動的推進，非常積極。除了生產和分配的合作外，並且有着許多在中國尚屬罕見的合作方式，譬如像畜類和農具的集體應用——特別是公共農場，和紅軍農場內——及勞作互助會等組織；後者更促成許多面積廣大的田地，都能很迅速的耕種和收穫；而農民在個別勞作時的那種時間上的浪費，自然是消滅了。在農作忙碌的時期中，就採用「星期六突擊隊」的制度，這時不但是全部的兒童組織、甚至所有的蘇維埃官吏、共產黨員、赤衛軍、婦女組織以及駐在鄰近的紅軍部隊，都一致動員起來，每星期至少要有一天耕作。就連毛澤東也參加這一種工作。

紅軍就利用這種機會，宣傳那種「集體努力」的革命思想，同時給農民們以假定「集體化」能一旦實現所需的教育工作。同時，由於一般農民們性情的孤僻，所以就設法逐漸輸灌給他們以一種在廣泛的社會中生活的觀念。在農民中間所建立的組織，紅軍稱它們做三位一體，因為它們同時具有着經濟上、政治上、和文化實效的三種性質。

紅軍對於提高民衆文化程度的工作，用西洋的標準來衡量，自不足觀。但是，在中國其餘部份流行着的種種非常罪惡行爲，在歷史較長的西北蘇區裏面，確實是完全消滅了。在新的蘇區裏面，大規模的宣傳運動正在民衆中間展開着，以期達到同樣的初步改革。在陝北，鴉片已完全禁斷，這尤其可以算得是極大的成就。在我走進蘇區以後，確實沒有看見過有一處種植罂粟花的。官吏的貪污事件簡直從來沒有聽得過。求乞和失業的現象，正如紅軍所宣稱的已完全消滅。我在蘇區旅行時，從沒有看見過一個乞丐。纏足和殺嬰，都

被視為犯罪行爲。童奴和娼妓制度不復再見。一妻多夫制和一夫多妻制也完全禁止。

那種「公妻」或「婦女國有」的荒謬不經的傳說，真是毫無根據。但婚姻制度則確有改革。離婚和承繼權的規定，當然和中國任何其他部分的那些半封建法律和實際情形是極端不同的。在一九三六年再版發行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婚姻法（The Marriage Law of The Chinse Soviet Republic）裏面，有若干條文是非常有趣的。譬如說，姑婆虐待媳婦，賣買婦女作妻妾，以及父母包辦婚姻等制度，都一概禁止。婚姻必須由雙方本人同意。法定結婚年齡：男子必需達二十歲，女子必須達十八歲。嫁奩制度，完全禁止。男女雙方假使同意，祇須向縣、市或鄉蘇維埃登記，就可不費分文，取得結婚證書。男女雙方祇須事實上已同居，不管他們有否登記過，都算做合法，他們所生的子女當然也是合法的，所謂私生子是根本沒有的。

至於離婚，祇須任何一方對婚約不滿意而提出要求，就可不費分文取得蘇維埃登記處的許可，但是紅軍的妻子要提出離婚，那必須先得對方的同意，才能獲得許可。至於財產，則由離婚雙方互相均分。對於子女，在法律上雙方都有贍養的義務，但假如債務，則規定必須男子一方負擔（！）同時，男子必須負責供給子女生活費用的三分之二。

教育，在理論上說來，除了子女的衣食由父母供給外，當然是免費和普及的。但實際上，免費和普及的教育，却還不能達到怎樣的成就。據教育委員徐特立向我說：當紅軍初抵西北時，百分之九十九的民衆是文盲；但現在却已事實證明，祇要有機會給農民，他們

是非常願意學習的。他們並不愚蠢，他們學習起來非常快。祇須用好的理由給他們解說，他們那種不健全的迷信的習俗，立刻就會改變。而教育本身，就當擔起這任務來。當成年的農民們，像他們的子女一樣，學完了五六百字的第一冊書以後，是不願意就此停止學習的。

(美·Pacific Affairs·十卷三號)

# 渝共摩擦的演變

渝共的合作本來不是出於真誠，不過是互相利用而已。這種由互相利用爲出發點的合作，當然平時就同床異夢，一旦遇到利害關鍵，立刻變成仇敵，互相火併，乃是必然結果，無足驚異。

我們現在先檢討一下民國二十五年西安事變後，渝共合作的出發點是什麼，分析起來可歸納如下：

## 渝蔣方面：

一、蔣在內戰時期，對於全國人民之威信下墜，危機叢出。擬採容共政策打破危機，挽回人民之信仰，藉資鞏固政權之基礎。

二、十餘年內戰所得之結果，不過是蔣共互相殘殺。故蔣擬由容共而終結互相不利之內戰，以圖民生之更新。

三、利用容共之虛名，要挾英美，使彼等增強援蔣力量，以便防衛蘇聯對中國政治之進出。

四、利用容共之虛名，要挾日本，使其恐懼國共之團結，冀於外交上，獲得讓步。

五、擬避免與共產黨抗爭，挽回自己政權的危機。

中共方面：

一、蔣共合作而停止十餘年之內戰，使其軍得到休養之機會，以備轉頗其陣容。  
二、由於合作，得到向人民作合法宣傳其革命理論之機會，圖將中共之政策，向全國人民及各機構浸透之。

三、由於合作，而實現民國二十三年放棄瑞金以來所唱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動並推進全面的「抗日戰爭」，將中國由「民族革命戰爭」推進到「社會革命」之戰爭。

四、主張「中國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即係蘇聯所倡導的全世界殖民地民族解放戰爭之一部分。換言之，即國際共產黨革命之一部分，而「中國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之主要條件即為蔣共合作之實現。

五、主張蔣共合作之背面即中蘇合作，亦即為實現世界革命之初步聯合戰線，於世界策略中占有重要地位者。

由上列各點觀之，蔣共合作在先天上是不足的，所賴以維繫合作形式的，乃互相利用耳。現在我們再檢討一下蔣共合作的後天情形如何：

政治方面：

一、渝蔣深恐與異黨競爭失敗，故一面與中共及各黨各派合作，一面將其政權獨裁化，以強化以蔣個人為中心之國民黨政權。

二、中共利用「抗戰」，積極在政治、軍事、及民衆運動上擴張勢力；另一面設法使蔣之政治地位陷入孤立。因之，渝蔣由畏忌而轉壓迫，遂致攻擊中共。

### 三、中共陝甘甯邊區政府之存在。

#### 軍事方面：

一、蔣對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之待遇不平等，並於民國二十八年秋停止配給軍需。

二、共產黨系軍隊與蔣系軍隊之防區未劃定，常發生地盤上之衝突。

#### 外交方面：

一、七七變後，渝蔣曾表示於適當時期成立和議，中共則堅持「抗戰到底」。

二、渝蔣冀望蘇聯對日作戰，中共則恰全然相反。

三、中共排斥渝蔣所屬英美派，英美派則俱為反共支持者。雙方作理論之鬥爭，以致引起全面衝突。

以上所舉各節，即可證實蔣共之衝突與分裂為不可避免者，且因遠東英美勢力之敗退，蘇聯抗戰之頹勢。使渝方更將加緊反共的傾向，而中共亦決不肯束手受戮，故渝共相剋乃不可動搖的趨勢。所謂渝共合作，並不能解決渝共問題，適足以掀動渝共紛爭，至為顯明。

## 幾件歷史性的血案

## 黃橋事變

前因盤據於皖南一帶之共軍，藉事變後之軍事動亂，即大事擴充，至二十八年春，其所有兵力，已不下卅餘團，但對外之番號，仍係渝中央所指定的新編第四軍（新四軍）故全部人數已超過額定三倍。而渝中央所發給之軍需餉項，仍照已往之額定數目，且該軍之駐地及活動範圍，亦經當局之指定為皖南各縣，因此皖南之共軍，因感軍需餉項之不足，及活動地區太小，即不遵渝軍事當局之命令，而私自圖謀發展，至二十九年春，即逐漸蔓延至蘇屬京南各縣，並就各地徵捐納稅，收繳民槍，以補軍需餉項之不足，渝當局因見其如此之不法，即授意渝「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予以阻止，奈三申五令，均未見效，致雙發方生軍事行動，第三戰區動員兵力四師之衆，將皖南與蘇南之共軍連絡線切斷，準備實施各個擊破，故蘇南一帶之共軍首領——陳毅見勢不佳，即會同管文蔚等，橫渡大江率部北竄，於同年四月間，兵抵蘇北之黃橋，該地守軍，為蘇省保安四旅何克謙部，未及準備，即為進犯之共軍所擊潰，共軍遂於四月廿三日拂曉占領黃橋，「渝蘇省主席兼魯蘇戰區副總司令」韓德勤聞訊之下，即召集省方各軍政要人，舉行會議，並飭令與共軍相接之地區，加強防務，嚴加防範，後經會議決定並經奉三戰區之命，即調集所有駐蘇渝軍，及保安隊地方團隊，共二十餘團，進兵黃橋痛剿共匪，如此，即造下黃橋河畔之流血慘事。

共軍於佔領黃橋後，即派出大批之政工人員，從事宣傳工作並誘惑民衆，協助共軍，挖掘戰壕，如此經四月之久，黃橋四圍壕溝縱橫，堪稱固若金湯，戰雲迷漫了整個黃橋地

區。

九月二十日，江蘇省府轄下之部隊，完全集中於東台一帶，至二十五日，即按照全部計劃，各就作戰位置，但蘇省當局，對此孤注一擲，實寄以莫大之關懷，復於二十六日晚蘇省府所提各節，竟絲毫不加理會，幸仇某見機行事，方得逃出匪窟，安然歸部謁韓備述陳毅之不禮，蘇省主席，暨八十九軍軍長李守維，觀此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即於十月一日晨揮動戰旗，進兵黃橋，二十餘團之兵力，構成百餘里之戰鬥橫線，浩蕩之勢，確難盡喻。

第一二三日（十、一、）進兵之勢，恰如破竹，十月三日晚，即占領黃橋外圍之據點多處，且左側之三十三師，一鼓作氣進佔黃橋之東圩，詎料黃橋守軍，爲數寥寥，更得悉共軍以十七團之兵力，完全配備於外圍，蘇省軍事指揮者，情知有異，遂力謀安全之方針，於下令通知各部時，共軍已蜂擁而上，予渝軍以各個包圍，而施行各個擊破，此時方屆午夜，且濃霧滄茫，雙方格殺之殘狀，已不辨敵我，共軍復於各地遍燃民房，火勢熊熊，極盡淒厲，是夜雙方死傷之衆，已不克勝計，八十九軍軍長李守維暨獨立旅旅長翁達，均於是夜殞命，於是渝軍之退却益臻紊亂，且沿途橋樑均爲共軍所破壞，經一路截擊，渝軍死於槍彈者，千餘人，溺斃水中者二千餘人，所剩殘餘部隊，即於第五日（十、五、）退返原防一。

新四軍趁此良機，實施反擊，此時由魯南竄之共方八路軍，已抵鹽阜一帶，渝蘇省部隊，兩面受攻，且士氣不振，在此雙重壓迫下，即退守興化淮東一帶。

### 山子頭事件

蘇北的『抗戰』部隊，在全盛時期，號稱數十萬衆，論起來力量是相當的雄厚，可是在名義上他們雖然在統一的『抗戰』旗幟下去抗戰，實際上還是各自爲政，以自私作前題，由於『權』與『利』的攫取，摩擦，爭執；內鬨是不可避免的事，而共產黨的投機，是『無孔不入』的，在已有裂痕的蘇北『抗戰』陣營中去活動，分化，離間，當然舉手可得，坐享漁利的。

『黃橋一投』蘇北僅存的一點『抗戰』實力在赤禍的侵蝕下，逐漸的縮小，僅存方圓不足百里的淮東地區。

王光夏（殿華），是渝方蘇省七區專員，兼保安第三縱隊指揮官，（原爲保安第七旅），在蘇北『抗戰』陣營中，是一位勇敢善戰的將領，他是共匪赤化蘇北，政治上，軍事上，很大的障礙，當渝方『抗戰』基地縮小成方圓不及百里的淮東地區時，他仍在泗陽陳道口，在赤色共匪的層層包圍中，苦守，擋持，共產黨爲了消除障礙，曾調動兩萬餘兵力，（羅炳輝部，黃克誠部），圍攻陳道口，苦戰七日夜，王始以彈盡援絕而突圍，結果，其匪傷亡了數千。得不償失，所以將他恨得牙痒痒的。

『山子頭事件』暴發，渝共合而復離了，可是這位在共產黨認爲是眼中釘的王光夏命

告終了，總算是達到了它的私慾。

當日軍部隊掃蕩淮東地區時，爲取包剿的陣線，首由蔣營向共匪盤據地區湖壘、建陽，東溝，益林等地進伐，它們是一槍不發的逃竄了，但是它在文告中說：『曾以四師以上的兵力，援助友軍，並予敵夾擊。』

共產黨的策略，一向是投機取巧的，它對於收穫，是不願意犧牲相當代價的。當渝軍全線崩潰時，它又使以慣技，高舉歡迎旗幟，甚至於高唱『擁護韓主席』口號，來誘引渝軍殘餘部隊入它的圈套，以便達到它乘機搜繳的目的。

渝軍踏入匪區的第一聲，八十九軍軍長顧錫九，即變爲階下囚了，可是它看時機未至，仍以誤會解釋而釋放。

他們相互間的條約，『在軍事行動時期，共同抵抗，將來各回原防，』這種約言，只好騙騙頑童，恐怕也不易，渝軍有返回原防的可能嗎？

至於談到『共同抵抗』，它則將渝軍配備在第一線，做外圍，自己的部隊在內線，做核心，它却『打呀！』『戰呀！』『拚呀！』『抗呀！』喊得挺響，與其說：『共同抵抗』，不如說，『以敵滅敵』，（它認爲雙方俱係敵人）

還有一套頑意，當渝軍大部隊過境，它拼命的表示歡迎，攜手，慰問，但逢到少數部隊，則有唯一的藉口，你不打，我們打。械彈我們暫時借用吧！同志們，辛苦了，休息休息，槍給我們拚去，全部的繳了械。

在其匪區域內的渝軍，給養不得向民衆直據徵購，應由其匪供給，按照實有人數點名發給，這種辦法，表面上實在不錯，並且高唱不擾民的調子，——其匪的這批給養出自何處？那姑且不論！多堂皇多官冕；使渝方部隊不得不表同情，可是實際上，幾日的點名，渝軍的現有實力，已被它很清晰的了解，好準備它應付的兵力，這個戲法，又變得很新鮮。

渝軍在其匪區域裏的部隊，計有八十九軍（顧錫九部）約四團不足之兵力，一百十二師（霍守義部）約三團兵力，獨六旅（李仲寰部）約一團之兵力，保三縱隊，（王光夏部）約二團之兵力，總計不足十團，他們為取得由皖援蘇的王仲廉部的聯絡，遂向西挺進，共匪眼看要到口的肥肉，要脫手而飛了，遂假籍護送的名義來實行它的毒計。

渝軍向西挺進的配備，以顧軍與霍師作先頭部隊，分路出動，而以王李兩部作後衛，共匪派了一個團——實數是兩團——名義上是護送霍師與顧軍，實際上是截斷渝軍顧霍與王李兩部的聯絡，大的吞不下，當然吃小的，於是乘昏夜，突向王李兩部猛犯，在匪區裏的生活，一時也不敢大意，王部也有相當的戒備而迎擊，結果霍師聞信趕回，來一個迂迴，包圍夾擊，共匪受到很大損傷，計劃未成，但它矢口不認，只以叛軍藉口，向韓主席道歉了事，又以「誤會」兩個字來掩飾掉。

局部的摩擦，本算了不什麼，道歉，解釋誤會，就可以了事，可是「紙終包不住火的」，因為霍師接受其他任務離開，「山子頭」成為渝共再度火併的場所。其匪一向是偷雞摸狗的戰術，「山子頭」的火併，據說是這樣的：

「坪」兩地駛來，這些餽贈，是慰勞「抗戰」將士的禮品，王光夏的確是一位精明幹練的人物，或者是經驗告訴他，「無功不受祿」而使他另有感觸而生疑，很迅速下了一個命令，「戒備」，並且派了一個堅強的連，來歡迎這些送慰勞品的「民衆」，詳細檢查的結果，多出來的禮物，是藏在豬肉裏的手榴彈，和掩在酒挑下的駁壳槍，由於這些禮品貴重，不得不將來使款留，並且加以保護了，俄而，槍聲大作，互相酬應，火併的序幕揭開了。

結果；久經戰陣，剽匪素著的王專員光夏終於被戕害了。

### 歷年的渝共衝突紀要

#### 陝甘甯邊區之衝突：

(一) 柏邑事件，二十七年十二月八日渝共兩軍於土橋發生衝突，結果共軍被迫退至清水。念八年一月發生第二次衝突，延至五月下浣事態更形惡化，渝軍強迫共軍將駐守數年之柏邑城讓出，乘雙方代表談判時猛烈予以攻擊，結果渝軍奏勝終將共軍逐出縣境。

(二) 鄖縣事件——念八年一月七日渝共兩軍於鄖縣發生衝突，雖有談商和好之舉，結果終未獲圓滿解決。

(三) 綏德事件——念七年冬。陝北二區專員胡紹南與共軍蕭勁光部隊發生衝突。

(四) 包圍邊區事件——因上述種種事件發生後，渝軍即以無合理解決方法為理由，遂

行包圍陝甘甯邊區全區，即念八年冬渝軍於邊區開始構築陣地，到念九年冬工程已告完成，據念九年十一月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等之通電稱該處之渝軍已逾二十餘萬。

#### 華北方面諸衝突事件：

(一)山西新舊軍之衝突——民國廿八年十一月山西第七區專員張文昂與政治主任韓鈞（中共脫黨份子）於汾西叛變，反對舊軍制度，結果其殘餘部隊二千餘人受郭宗份部隊之攻擊，陣亡其半遁入北方之山岳地帶，是時另有嵐縣新軍續範亨（國民黨員）部隊及八路軍之賀龍部隊響應新軍而造成新舊兩軍對峙之形勢。渝軍則支持舊軍，對於新軍及共軍開始武力行動，但延至念九年底為止，尙未解決。

#### (二)河北渝共軍之衝突：

(1)渝方軍委會校閱委員黎惠孚，徐竹齋及鹿鍾麟部隊，張桐崗，高羣英部隊等於民念九年春，與共軍劉伯承部隊發生衝突，經數次之戰鬥，勝利終歸共軍所獲。

(2)河北民軍張蔭梧部隊一萬六千餘名，自民念七年十二月十五日起至念八年八月二十九日之間，於博野，冀縣等處屢與共軍趙承金，賀龍部隊發生衝突。激鬥結果張之部隊遭受慘敗。

(3)念九年一月趙部隊與八路軍衝突，結果趙部隊被殲滅。渝軍胡宗南部隊對此指摘為共軍賀龍部隊所為，而朱德及彭德懷則堅不承認。

(4)念九年一月起石友三部隊與共軍於冀中南及西部各地連續發生衝突，結果石友三

部隊慘敗。

(5) 滬方放賑人員被害事件——民念七年滬方放賑人員分四組由河北出發時，一部份被殺，一部份則被共軍拘押而受其傷害。

(三) 隴東武裝衝突事件——自民念八年二月，於寧縣，合水，鎮原等縣滬共兩軍發生衝突，結果共軍被迫後退。

(四) 河南確山竹溝事件——民念八年一月十二日，確山縣縣長受命於滬軍，統領信陽，江陽兩縣常備壯丁隊二千八百餘名，由進攻而包圍新四軍之確山竹溝留守處及後方病院，計斃傷病兵等百餘名。

(五) 山東事件——據滬軍天水行營報告稱：自民念八年九月迄念九年一月之間，山東省保安部隊因受第十八集團軍包圍而被殲滅。

(六) 新四軍事件——民念九年之滬共磨擦事件，益形激烈。由局部之衝突已轉為大規模之內戰。西北方面滬軍以二十餘萬之兵力，完成包圍邊區之陣勢；於東南則實行殲滅新四軍。是年冬季，滬方令新四軍於十二月以前退出江南地區。移往江北，其江北原有隊伍須移往河北。繼於三十年一月四日由滬軍顧祝同部隊將新四軍之江南殘留部隊，予以包圍攻擊，結果將軍長葉挺俘去，同時項英亦告失蹤。

## 第三國際解散與中共之掙扎

第三國際於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在莫斯科宣佈解散，這一國際性的組織，本來是蘇聯共產黨所御用的赤化世界的工具；這次解散，表面上似乎有放棄此種陰謀的意義，實際上我們知道共產黨人是最會玩手段的，所以這不過是蘇聯應付當前環境，以討好英美的換湯不換藥的手法而已。

第三國際解散的真相既如此，甘心爲蘇聯共黨屈膝的中共，對這解放的舉措當然在「子必肖其父」的定律下，作同樣的運用，以達其消滅祖國效忠蘇聯的目的。

所以，我們在當時一方面可以看到中共口口聲聲申言中共與第三國際解散無關係無影響，同時却又對渝作讓步的暗示，企圖重演民國念六年所玩的那套手法。我們知道中共念六年手法，奠定了中共今日到處橫行的根基，挽救了中共及其軍隊當日奄奄一息垂死的生命。現在又想趁機以同樣手法，淆亂國民視聽以遂其赤化中國的目的。

第三國際的解散，其真相既如上文所說，不過是蘇聯的「手法」；中共對這一舉措的看法和運用又如上述；這里預備把當時中共對第三國際解散的反響，無論在論調上，或在行動上，作一簡單的敘述。

當莫斯科解散第三國際組織的提議書於五月十六日傳抵中共中央政治局後，即於念七日發出對該提議書的決定電文，這決定雖不能認爲就是中共全體的決定，然而，它可以代表中共的多數意見，或現在中共首腦的意見，所以，我們可以說；這個決定電文是代表着目下中共的一般意向的，這裏，我們且把其中的要點提錄在下面：

(一) 完全同意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

(二) 申言共產國際過去對中國革命的幫助，和解散共產國際是順合時代的舉措。

(三) 申言中共的產生與共產國際無關，中共的一切完全係獨立創造而來。共產國際不過在共產黨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以前，曾予中共以不少幫助而已。

(四) 申言中共爲中華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優秀傳統的繼承者，并將繼續加以發揚光大。」

中共的決定第四項中有這樣一句話：「中國共產黨人，是馬克斯列寧主義者；因爲馬克斯列寧主義是科學，而科學是沒有國界的」。

中共中央當局在同項中更聲言：「中國共產黨人，是我們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優秀傳統的繼承者，把一切優秀的傳統，看成和自己血肉相連的東西，而且將繼續加以發揚光大。」

其次，我們更就(一)中共首腦毛澤東於同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延安幹部大會，對共產國際的解散所作演辭(原文略)與(二)中共機關報解放日報所載論共產國際的解散一文(原文略)來論，前者可視作今日中共首腦的意見，而後者則可視作中共的理論者的意見。這里，分別加以檢討一下：

(一) 毛澤東這個報告是反響共產國際解散第三國際而發的，一方面有代表中國共產黨的意味，另一方面實有平抑中國共產黨內部喧嘩的意味，如果說中共對解散第三國際應

當有一極有力的反應，毛澤東的報告就是應發的反應。然而，事實上，毛澤東在這報告中並沒有提示出任何一個有價值的論據，同時，毛澤東避開了一切與事實相關的問題，僅就一般情況曖昧而輕描淡寫的說過去了。毛澤東反復的說解散第三國際是「劃時代的大事」，與第三國際對我國革命中「做了很大的幫忙」，這不僅因事實上缺乏根據而決定其為錯誤，同時更暴露了毛澤東思想的混亂不清。

雖然毛氏盡可能的諱避了現實，可是毛氏却充分的表現出中共的野心，與中共理論的牽強——

在毛氏的報告中，有一句「革命是不能輸入，也不能輸出的」話，這在毛氏是強調了中國共產黨是一種自發的，不受任何國家或思想所左右的政黨。然而，在解釋解散第三國際是正確的一點上，毛氏又說，「現在共產國際這個革命的組織形式已經不適合鬥爭需要。如果還繼續保存這個組織形式，便反而會妨礙了各國革命鬥爭的發展。現在需要的，是加強各國民族共產黨，而無須這個國際的領導中心的必要了。」

在同文中，毛氏又說：「共產國際解散，不是為了減弱各國共產黨，而是為了加強各國共產黨……」這句話更露出了共產黨的野心，和解散第三國際不過是玩了一次捉迷藏的把戲罷了。

(二)解放日報在論共產黨國際解散一文中，首先要求世人對馬克斯學說再加檢視，即以馬克斯學說為引證明今日解散第三國際，乃是極其合乎理想，極其「英明的措置

」。

在解放日報的社論中，原著者說；「第三國際的解散將使共黨領導幹部及全體黨員，在提高了責任感的基礎上，能夠更進一步的依據本國的條件，來應用和發展馬克斯主義的普遍原理，而提高他們的創造能力。」

共產國際解散後，渝方認為中共已成為失去保姆的孤兒，正是向中共施用壓力的時候。基於這種理念，渝方即向中共提出以下要求：

(一) 陝甘寧及其他各省區之中共政治組織，一律解散而交還渝方。

(二) 撤消中共「革命軍事委員會」，其「第十八集團軍」及其所屬之各部隊，由渝「國防最高委員會」指揮，并令其移駐其他地區，而由渝直系軍移駐「陝甘寧邊區」。

中共最高首腦對渝方要求協議結果，除不予接受外，並向渝提出反要求，其內容如下：

- (一) 允許共黨公開活動，各地得設立黨部。
- (二) 十八集團軍與共產黨之關係仍然存在。
- (三) 重慶政治機構上，自國防最高會議至各省政府，允許中共安插幹部。
- (四) 渝共組織軍事委員會及政治委員會，討論雙方之妥協與合作關係。
- (五) 共軍歸渝共軍事委員會統領，但決不改編。
- (六) 渝方即行供給共黨缺乏之物資。

同時，毛澤東并聯合朱德、周恩來等發表共同聲明，說明中共內部始終團結，過去因受渝方之奸計挑撥離間，乃造成分散局面，今日既受渝壓迫重行合作，則今後對渝方之任何壓迫，必施以報復云云。

渝方鑒於和平談判未有效果，於是企圖改用軍事的威脅，迫使中共就範；一時弄得風聲鶴唳十分熱鬧，這便是所謂包圍陝甘寧邊區。現在，將其經過情形記述如次：

民國三十二年六月十二日渝方調查統計局所屬勞動營訓導處長兼復興社特務隊張滌非於西安召集文化團體舉行會議，發表解散中共及解散陝甘寧邊區政府之決議，並將該項決議發電通知中共首腦毛澤東，要求答覆。

七月六日，由張滌非策動之西安文化團體議案，正式由渝中央社發表，向全國作反共廣播宣傳。繼之在渝方控制下各地，紛紛有以記者公會、臨時參議會等名義發表電文，要求解散中共及其邊區政府。

隨着渝方的發動反共運動，中共一面大事著論攻擊渝方，同時脅迫控制下民衆作反渝論調；一面更在渝方治下的西北各地，接三連四的進行暴動事件，形勢十分嚴重。六月念四日甘肅樂都，永登，靖遠等三縣先後爲暴徒佔領，其中背景非常複雜，除中共外，尚有盛世才之第九，十，十二，十四等五師，兵力達七十萬。佔據三縣後，即完成對蘭州的包圍陣線，企圖佔據渝方在西北之重要軍事根據地蘭州。

渝蔣於六月念四晚急飛蘭州，念五日下午召開軍事會議，商討剿共政策，於十日內完

成對共軍包圍形勢，並組織新聞網，擴大反共宣傳。事態日臻尖銳化，渝軍紛紛作包圍邊區之行動。

胡宗南部除原有對共軍封鎖部隊第六一師，一六五師，一九一師，九七師，暫編騎兵第二師外，又增調「河防軍」第一師，八師，二八師，五一師，五三師，七八師，一六七師等精銳及直屬砲兵旅，第十六軍重砲兵營，對陝甘寧邊區進行嚴密的包圍網之完成。

中共對此除消極的煽動民衆發出通電乞求渝方停止軍事行動外，另一方面急調十八集團軍，百二十師賀龍部及其晉西北軍區部隊紛向陝北集中，八路軍全部三分之二兵力亦自前方撤回延安，渝何應欽曾迭電制止，而中共軍仍不顧一切，向北調動，致駐邊區之渝第一軍即開炮，向關中連發數十砲示威，第五十三師某部，數度向鄜縣附近裕口村共軍陣地進擊。而華中新四軍第五師李先念及第六師彭雪楓所部亦與湯恩伯部接觸。渝九十二軍李仙洲部則由隴海路北向魯南挺進，在山東單縣之黃集孟集一帶與中共接觸，激戰結果，共軍共死傷達二千七百餘人。而九十六軍王仲廉部，亦由皖北沿隴海路南開蘇北，於蘇皖邊界泗縣附近擊潰新四軍之彭雪楓所部後復由泗宿南下，而新四軍第三師黃克誠部及其淮海軍區各部已決心攔阻、第一師粟裕部及蘇中軍區之精銳亦北上迎擊，而江南方面，聞渝方任命戴笠兼第三戰區剿共總指揮前赴皖南之廣德，指揮挺進軍，忠救軍及渝五十二師一百九十二師不斷進擊新四軍江南部隊，並嚴捕共黨活動份子，重金懸賞緝拿共軍幹部。

原來渝方之調兵遣將，意欲威嚇中共，使之就範；自中共以敵對姿態出現後，渝方自

知此事重大不可冒失，因此，重慶政府採取沉默態度，此外更有馮玉祥，郭沫若輩願任調解之責，更有蘇聯駐渝大使提出建議三項斡旋渝共糾紛，一時萬分緊急的情勢，才在無形中和緩了下來。

### 微妙中的渝共關係

渝共關係演變至包圍陝甘寧邊區，可謂已達白熱化，大衝突已至一觸即發之勢。但終因渝共雙方的謹慎處事，以及馮玉祥，閻錫山等的提出妥協口號，更經蘇駐渝大使潘友新從中斡旋，緊張之渝共關係逐步趨和緩。

潘友新當時向渝共雙方提出之建議計有三項：

- 一、雙方立即停止一切軍事敵對行動。
- 二、雙方組織渝共合作委員會，商討今後合作事宜。
- 三、立即召開妥協會議。

對此三項建議，渝蔣僅表示考慮，但未能全部接受，中共毛澤東表示願意考慮接受，惟對過去渝共間所召開之妥協會議，每次議而不決，決而不行，故強力主張此次渝共會談，雙方宜以懇切態度商討，及付諸實施云。

這裏還得一提的，是被禁已達六年的張學良氏，自民國三十二年五月間恢復自由後，對於渝共關係向極重視，曾隻身前往重慶，與蔣氏作祕密談話，張氏個人曾向蔣表示，願

以私人力量促使渝共妥協，因此西北一帶渝共兩軍的互相對峙，據一般觀察均認為渝共事  
件基於雙方的畏首畏尾，暫時不致擴大。

三十二年八月一日周恩來氏在延安歡迎會上發表演說，內稱：「我們是堅持國內團結，我們仍然與國民黨繼續進行妥協，共同消滅內戰的危機，解決已往存在的問題，但這種協定必須是真誠的，平等的，互讓的，而不應一面談判，一面摩擦，一面講團結一面又要「取消」「解散」。若國民黨有人將國共合作看作國共合一，而處處出以威逼利誘，那實是內戰的動機，決非團結的道理」，這一番話，很可看出中共方面的意旨。這一樁事件，一直糾結到三十二年年末的後數月，外表暫告沉寂，三十二年八月以後，渝方已密令所部不得輕啓戰端，駐守於濟川，龍門山一帶的渝軍，奉命撤退十五里，胡宗南已奉令對共軍採取監視行動，不得採取軍事行動，八月中，延安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緊急會議，對渝共妥協方案會議有下列七項：

- (一) 雙方立即停止一切敵對行動。
- (二) 嚴懲張滌非。
- (三) 雙方組織合作委員會。
- (四) 合作委員會下設軍事合作委員會。
- (五) 取銷參政會，務使共黨有實際參政之機會。
- (六) 對西北之開發，渝方可以合作推進。

## (七) 雙方實行物物交換，運輸合作。

這項建議雖未被渝方全部接受，但渝共間的衝突暫時告了一個段落。民國三十三年，中共又以要求建立聯合政府為條件，數度派遣周恩來作代表前往重慶與蔣氏會談，終以雙方意見相左，未有結果。

當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周恩來與蔣介石兩氏談判決裂後不久，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毛澤東氏，即發表了一九四五年共黨的施政綱領。在該綱領中，毛氏指稱謂：「重慶與延安間的諒解問題，已非形式的談判足能解決，殆為一明顯之事」。言外之意，已露示今後共黨捨棄由談判途徑獲得雙方合作之決心。

顯然，此次渝共雙方談判的決裂，實包含着極度嚴重的意味在內，該項決裂情勢的擴展，不但足以影響及中國國內的政治團結，由於雙方背景的不同，抑且將演為國際性質的對立狀態。在毛氏所發表的綱領中，中國共黨，已重申決意，今後在集中全力強化對日抗戰的陣線上，決不依從重慶意旨，作方策的再度變換。

這裏，且引毛澤東氏的談片如下：

「由於國內反動勢力的存在，中國人民所從事着的對日抗戰的軍事力量，業已分化為數個意見互殊的派別，以是，在前線作戰上，遂遭致相繼的敗退，而今尤使吾等遺憾不勝者，即國民黨領袖，猶不昧大勢歸趨，堅執着一黨專政的方策，以致朝野對政府不滿之聲，充塞於耳。蓋今日重慶人民，對於由民治方法團結中國一致對外的信念，早已發生動搖

，即對於各種民治方案的提供，亦已率直表示拒絕」。

在上述毛氏談話中，我們可以窺知共黨領袖對重慶不滿的實情，並據毛氏預測，由於此次重慶延安談判的決裂，今後國內抗日陣線，仍將無法團結。

今日重慶與延安兩方，既已面臨空前的嚴重局面，然則何以再演此分裂的現象呢？此問題之答案，實甚簡單。蓋目今重慶與延安政府，皆認為儲備自己的實力，較之未來中國命運的考慮，更為重要，所以，此兩政權站立於私利的立場上從事談判，結果終告無法圓滿。

至於，此次延安方面向重慶政府所提要求的主要內容是：「鑑於現階段國勢的嚴重，中國政府亟須召集國民黨、共產黨及其他政黨代表，舉行一聯合會議，共組聯合政府。如是，方可動員全體國民，一致對日抗戰，而中國獲取自由之期，亦可早日實現。」

同時延安方面，除提出上述對重慶要求外，並對重慶民衆發布宣言謂：「當前中國人民最大的任務，莫如一致團結起來，要求國民黨領袖，亟速改變現行政策，建立代表民意的聯合政府。」

不過，現在一般重慶人民，大多認為，縱若聯合政府一旦組成，對日作戰勝利，恐仍無法獲得保證。而在重慶政權方面，則以為聯合政府組成後，內部分化現象，仍將不免發生。同時，且深恐一旦共黨勢力獲得伸長，今後國民黨的根本，必將因此動搖。但國民黨在最近二十年來，在國內一向單獨秉持政權，從不受黨外意見的干涉。

此外，重慶政府並亦認為，今日國內，決不容許同時有兩個政權的存在，即在軍事方面，亦不容同時有兩個軍事領袖共同指揮，是以重慶之意圖，擬即刻解散延安政府，將共黨軍隊置於重慶直接指揮之下，同時，此項工作的完成，重慶方面，可即樹立一完全的民主政權。

蔣介石氏於今年元旦日所廣播的「告全國軍民書」中，並沒有提到國際關係，而祇呼籲人民，要求傾注全力重建抗戰實力。一月四日，延安方面即有了廣播批評。

#### 延安的廣播內容如下：

「蔣介石雖承認去年的嚴重危機，為國氏黨失敗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政策所招致的危機，但蔣氏僅歸罪之於一般社會，蔣氏認為社會對此應負責任，並指責因人民不能盡責，故使軍隊的戰鬥精神大受影響。至於政府對於其本身的批評，則僅承認其戰時行政尙未澈底。其實即此一點，足使人民輕視蔣介石之寡頭政治。」

蔣氏在其元旦廣播中，曾要求人民償付更大的犧牲以爭取今年的勝利。並要求富家和地主，自動供獻金錢糧食。蔣氏在其文告中又謂：「在軍事形勢一旦安定，反攻基礎確立之後，政府即將實施憲政還政於民。」但中共對此，認為完全欺騙，謂蔣氏並無實行之意。中共在其廣播中批評說：「蔣介石的言論，似乎認為中國人健忘過去，可是實際上他們決不忘記過去的教訓，國民黨會允許於一九三四年雙十節實施憲政，我們也沒有忘記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的諾言，以及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

會議，公佈憲政的諾言。」

「但結果我們又聽到了將於戰爭結果後一年實施憲政的言論。國民黨的多數諾言，均發於戰前。當時軍事情勢，猶未惡化至不能召開國民大會。然則爲何當時不能召開國民大會？」

對於蔣氏「在軍事形勢安定，反攻基礎確立之後，政府即將將施憲政，還政於民」的論調，中共繼續加以批評謂：「在此軍事形勢最最險惡之時，蔣氏發此言論，究竟有何意義，軍事形勢幾時能安定，反攻基礎何日能確立，憲政實施，何日可待？」

「蔣介石曾一再宣稱重慶必能完成最後勝利。但在一九四五年的元旦，忽言最後勝利尚不可期，此種態度突變，究竟含有甚麼意義？」

「在過去，蔣氏對於召開國民大會，尚與以日期，但今天他的諾言，已不再附以確定的日期了。這是見蔣氏對於所謂安定軍事形勢與確立反攻基礎，根本並無堅強自信。」

延安除對蔣氏言論嚴詞批評之外，更提出質問謂：未來的國民大會是否包含戰前代表，抑將重行選舉新代表？如果選舉新代表，則在目前的軍事情勢下，又將如何進行？又謂：大會如果召開，何人負責其事，將由何人任其主席？」

今日存在於中國內部的不安狀態，如與歐洲各流亡政權比較，情形正相一致。共黨領袖毛澤東氏最近亦述稱：「法國共黨與法國民眾，最近要求政府容納各黨合組政府，實為暗示吾等前途的一個明顯例證」。

但現在發生於法國，比利時及希臘等國內的共黨騷亂狀態的嚴重性，我們實不能漠加忽視，蓋此種變亂的發生，皆有其國際衝突的背景存在，而重慶與延安間的對立，正亦同此性質。今後此種對立之態勢的繼續發展，必將釀成兩政權間的武裝衝突，殆為一明顯之事。最近毛澤東氏所宣稱延安與重慶因今後將無法由談判途徑獲取兩黨合作可能的表示，已無異向重慶宣佈，準備發動一嚴重的國際性的戰爭了。

# 渝共談判破裂經過

自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開羅會議以後，美國爲圖把握中國，積極謀使國共妥協，乃先後有外交部長宋子文與周恩來的會談，以及蔣經國的毛澤東訪問等。當十二月中旬蔣經國攜有其父蔣介石的親筆信，飛往延安與毛澤東進行懇談時，據傳曾成立左列四項諒解：

一、嚴守維持延安與重慶現狀關係的原則。

二、停止相互誹謗攻擊的中傷宣傳。

三、爲解決國共間的懸案，設立國共混合委員會。

四、將新四軍編入第十八集團軍，一併直轄於重慶軍事委員會之下，追加任命毛澤東爲軍委會副委員長，並任命延安方面數名新委員。

但上述四項，其後並未見之事實。民國三十三年五月二日至十五日間，延安代表林祖涵與國民黨代表王世杰，張治中又在西安進行會談。林祖涵並曾一度前往重慶與蔣介石氏會見。至九月十五日，在重慶舉行國民參政會大會席上，重慶側代表張治中與延安側代表林祖涵，分別報告交涉經過種種。參政會方面乃推薦新聞人與教育者參政員王雲五、胡霖、冷遹、陶孟和、傅斯年等五人組織延安視察團，前往延安政權地區視察，返渝後，曾向政府提出意見，但對渝共關係並未引起若何效果。

三十三年「七七事變」紀念日，延安方面曾有二十四項口號的發表。自第一至等三項，為對延安軍及反軸心軍的奮戰表示敬意，自第四項以迄第十二項，均為延安對重慶政權提出的要求，第十三項以下至第二十四項，為關於延安軍訓練的強化，遊擊隊的發展，延安政權下生產工業的發展，減租減息的實施，莫斯科、開羅、德黑蘭會談的擁護，對在華外國軍隊的援助協力等等。

第四項 軍隊的待遇及教育的改善，軍事組織的改革，軍規的向上。

第五項 新民主主義運動（毛澤東所倡導）的擁護與發展。

第六項 趕速發給延安軍武器彈藥，且同軍裝備的改善，容許延安軍參加河南、湖南

戰線。

第七項 重慶軍停止對延安軍的進攻作戰，並釋放葉挺軍長以下延安軍一切的俘虜將兵。

第八項 重慶政權的內政改革，民主主義的即時實行。

第九項 急速回復言論、集會、出版、結社的自由。

第十項 黨禁的取消，承認各黨各派的合法立場，即速調整國共關係。

第十一項 廢止重慶政權治下的統制經濟，並取締投機囤積，保護助長農業生產與民

營商工業。

第十二項 重慶軍對日軍的進攻作戰，加以正面阻止。

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十五日渝參政會第三次大會中，渝共雙方提出之報告及文件，足以充分暴露渝共間衝突之激烈及妥協之不可能性。茲附錄全文於下：

## 渝方代表張治中在參政會報告詞

關於中共問題商談的經過，國民參政會諸位先生，要求提出報告，治中奉命代表政府，只把這一次商談經過，簡明扼要，報告如下：

### 一

在本年一月間，據軍事委員會派在十八集團軍之聯絡參謀郭仲容給軍令部之篠電說：「本月十六日，毛澤東先生約談，表示目前中共擬於周恩來，林祖涵，朱德總司令中，擇一或三人同行到渝，晉謁委座請示，并囑報告請示可否」。二月二日，軍令部復郭連絡參謀一電：「朱，周，林各位來渝，甚表歡迎，來時請先電告」。嗣後郭連絡參謀二月十八日電：「毛澤東先生談，中共決先派林祖涵先生赴渝」。至四月間，又接郭連絡參謀來電，謂據朱德，周恩來，林祖涵先生說，林定四月二十八日起程，中央據報後，於五月一日派治中和王世杰先生到西安先與林祖涵先生作初步會談，我們與林先生同於二日先後到達西安，計自五月四日至十一日，在西安共會談五次，會談中關於林先生表示的意見，都紀



錄下來，作成一個紀錄，送給林先生觀過以後，經林先生增減修改，當面交給我們，並簽字在紀錄上面，當時林先生詢問我們可否亦在上面簽字，我們以爲這是林先生所提出或同意我們一部份的意見，自只應由林先生簽字，至於中央的意見，我們當於返渝請示之後，正式提出，現在將林先生簽過字的紀錄原文錄下：

自五月四日至同月八日的會談中所表示的各項。

甲 關於軍事者

- 一、第十八集團軍及原屬「新四軍」之部隊，服從軍事委員會之命令；
  - 二、前項部隊之編制，最低限度照去年林彪所提出四軍十二師之數；
  - 三、前項部隊經編定後，仍守原地抗戰，但須受其所地區司令長官之指揮，一俟抗戰結束後，應遵照中央命令移動，以守指定集中之防地；
  - 四、前項軍隊改編後，其人事准由其長官依照中央人事法規呈報請委；
  - 五、前項軍隊改編後，其軍需照中央所屬其他軍隊同樣辦法，同等待遇；
- 乙 關於陝甘寧邊區者
- 一、名稱可改稱爲陝北行政區。
  - 二、該行政區直隸行政院，不屬陝西省政府管轄。
  - 三、區域以原有地區爲範圍（附地圖）并由中央派員會同勘定；
  - 四、該行政區當實行三民主義，實行抗戰建國綱領，實行中央法令，其因地方特殊情

形而需要之法令，可呈報中央核定施行；

五、該行政區預算，當逐年編呈中央核定；

六、該行政區及第十八集團軍等部隊，經中央編定，發給經費後不得發行鈔票，其已發之鈔票，由財政部妥定辦法處理；

七、該行政區內，國民黨可以去辦黨辦報，并在延安設電台，全時國民黨也承認中共在全國的合法地位，并允許在重慶設電台，以利兩黨中央能經常交換意見；

八、陝甘寧邊區現行組織，暫不予以變更。

丙 關於黨的問題者

依照抗戰建國綱領之規定，予中共以合法地位，停捕人，停扣書報；開放言論，推進民治，立即釋放因新四軍事件而被捕之人員，及一切在獄之共產黨員，如廖承志，張文彬等，并通令保護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之軍人家屬。

丁 其他

一、中共表示繼續忠實實行四項諾言，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戰，並領導建國；國民黨表示願由政治途經公平合理的解決兩黨關係問題；

二、撤除陝甘寧邊區之軍事封鎖，現在對於商業交通，即先予以便利；

三、游擊區的軍事政治經濟問題，服從國民政府及軍事委員會的領導，一切按有利抗戰的原則去解決。林祖涵五月十一日

## 附去春林彪師長所提四條

(一)黨的問題在抗戰建國綱領下，取得合法地位，並實行三民主義，中央亦可在中共地區辦黨辦報；(二)軍隊問題，希望編四軍十二師，請按中央軍隊待遇；(三)陝北邊區照原地區改為行政區，其他各地區，另行改組，實行中央法令；(四)作戰區，原則上接受中央開往黃河以北之規定，但現在只能作準備佈置，戰事完畢，保證立即實施，如戰時情況可能——如總反攻時——亦可商承移動。

## 二

因林祖涵先生已有具體表示，我們遂於五月十七日全林祖涵先生回重慶，當時中央正要開十二中全會及全國行政會議，雖在百忙之中，仍然將在西安談話經過及林祖涵先生所表示意見，報告中央，由中央考慮解決此項問題之具體方案，於六月五日約林祖涵先生晤面，即將「中央對中共問題政治解決提示案」文件一種，面交林祖涵，其原文如左：

三十三年六月五日中央對中共問題政治解決提示案

茲以林祖涵在西安所表示之意見為基礎，作以下之提示案：

### 甲 關於軍事問題

一、第十八集團軍及其在各地之一切部隊，合共編為四個軍十個師，其番號以命令定之；

二、該集團軍應服從軍事委員會命令；

三、該集團軍之員額，按照國軍通行編制（由軍政部頒發），不得在編制外另設縱隊支

隊或其他名目，以前所有者應依照中央核定之期限取消；

四、該集團軍之人事，准予按照人事法規呈保請委；

五、該集團軍之軍費，由中央按照國軍一般給與規定發給，并須按照經理法規辦理，  
實行軍需獨立；

六、該集團軍之教育，應照中央頒行之教育綱領教育訓令實施，并由中央隨時派員校  
閱；

七、該集團軍之各部隊，應限期集中使用，其未集中以前，凡其在各戰區內之部隊，  
應歸其所在地戰區司令長官整訓指揮。

乙 關於陝甘寧邊區問題

一、該邊區之名稱，定爲陝北行政區，其行政機構稱爲陝北行政公署；

二、該行政區區域，以其現有地區爲範圍，但須經中央派員會全勘定；

三、該行政區公署直隸行政院；

四、該行政區，須實行中央法令，其因地方特殊情形而需要之法令，應呈報中央核定  
施行；

五、該行政區之主席，由中央任免，其所轄專員縣長等，得由該主席提請中央委派；

六、該行政區之組織與規程，應呈請中央核准；

七、該行政區之預算，逐年編呈中央核定；

八、該行政區及十八集團軍所屬部隊駐在地區，概不得發行鈔票，其已發之鈔票應與財政部妥商辦法處理；

九、其他各地區，所有中共自行設立之行政機構，應一律由各該省政府派員接管處理。

### 丙 關於黨的問題

一、在抗戰期內依照抗戰建國綱領之規定辦理；在戰爭結束後，依照中央決議，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施憲政，中國共產黨當與其他政黨遵守國家法律，享受同等待遇；

二、中國共產黨，應再表示忠實實行四項諾言。

在中央提示案，面交林祖涵先生之後，並經聲明中共如將以上辦法實行後，則中央對於撤退防護地區之守備部隊，可予考慮，并可恢復該地區與其隣地之商業交通，及中共人員違法被捕者亦可從寬酌予保釋，林先生隨從口袋內取出一函，附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關於解決目前若干急切問題的意見」文件一份，交與我們閱看，其原文如左：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關於解決

## 目前若干急切問題的意見

國共兩黨合作抗戰已歷七年，中共謀國之忠誠，作戰之英勇，執行三民主義，實踐四項諾言，擁護國民政府及蔣介石先生抗戰建國，始終如一，均為有目所共見；惟目前抗戰形勢，極為嚴重，日軍繼續進攻，而國內政治情況與國共關係，尚未走上適合抗戰需要之軌道，為克服目前困難，抵抗日軍進攻，并認真準備反攻起見，中共方面認為惟有實行民主與增強團結一途，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決以下緊急萬分的問題，這些問題，有關於全國政治方面者，有關於兩黨懸案方面者，茲率直臚陳如下：

### 甲 關於全國政治者

- 一、請政府實行民主政治，保證言論、集會、出版、結社、及人身之自由；
- 二、請政府開放黨禁，承認中共及各抗戰黨派的合法地位釋放愛國政治犯；
- 三、請政府允許實行名副其實的人民地方自治。

### 乙 關於兩黨懸案者

- 一、根據抗戰需要，抗戰成績，及現有軍隊實數，應請政府對中共軍隊，編十六個軍四十七個師每師一萬人，為委曲求全計，目前至少給予五個軍十六個師的番號；
- 二、請政府承認陝甘寧邊區，及華北根據地民選政府為合法的地方政府，并承認其為抗戰所需要的各項設施；
- 三、中共軍隊防地，抗戰期間維持現狀，抗戰結束後，另行商定；

- 四、請政府在物質上，充份接濟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自一九四〇年以來，政府即無一顆彈片藥分錢粒米之接濟，此種情況，應速改變；
- 五、同盟國援助中國之武器、彈藥、藥品、應請政府公平分配於中國各軍，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應獲得其應得之一份；
- 六、請政府飭令軍政機關，取消對於陝甘寧邊區及各根據地的軍事封鎖與經濟封鎖；
- 七、請政府飭令軍事機關，停止對於華中新四軍，及廣東游擊隊之軍事攻擊；
- 八、請政府飭令黨政機關，釋放各地被捕人員，例如皖南事變時，被俘虜的新四軍官兵葉挺等，廣東的廖承志張文彬等，新疆的徐杰，徐夢秋，毛澤民，楊之華，潘却等，四川的羅世文，車耀先，李椿、張少明等、湖北的何彬等，浙江的劉英，西安宣俠父，石作祥，李玉海，陳元英，趙祥等，此等人員均係愛國志士，請予恢復自由；
- 九、請政府允許中共在全國各地辦黨辦報，中共亦允許國民黨在陝甘寧邊區辦黨辦報。

以上各條僅舉其主要者，中共方面誠懇希望我國民政府，予以合理與儘可能迅速之解決，若我國共兩黨不但繼續合作，而且能對國內政治予以刷新，黨派關係予以改進，則不特於目前時局大有裨益，且於明年配合同盟國舉行大規模之反攻，放出堅固之曙光，願我政府實利圖之。

中共中央代表林祖涵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四日

此時我們曾對林祖涵先生說：上次於五月二十二日先生提出之二十項，因內容與在西安所表示的意見出入甚大，未便接受，當經先生收回，此次所提出之十二項目雖較前減少，但內容並未變更，本不能接受，惟不欲過拂先生的意思，僅允留下，但不能轉呈，當時林先生亦說留在你們兩位處參考亦好。

三

到了六月六日，我們接到林祖涵先生的來信，對於中共提示案，提出兩點聲明；第一，認為提示案與中共六月四日正式提出的意見，相距甚遠，除將提示案報告中共中央請示外，並請將中共提出的十二條，轉請中央作合理解決。第二，對於提示案開頭所說的：「以林代表祖涵在西安表示之意見為基礎」一語，認為與經過事實不符，他認為西安的記錄，是「最後共同作成的初步意見」，他同意「約定各自向其中央請示，再作最後決定」，因此他還是希望中央考慮中共最近正式提出的意見，我們當即在六月八日回林先生一封信。對他所聲明的兩點，提出答覆：第一，林先生六月五日交來的函件，因為前後出入太大，曾經聲明未便轉呈，林先生最後說：「就留在你們兩位處參考也好」，所以當時僅允留下，但仍聲明不能轉呈；第二，在西安談話中紀錄下來經過林先生增減修改，另自繕清再行簽字的意見，我們回來以後，已經轉呈中央，所以，中央提示案，就以林先生的意見

為基礎，並且儘量容納了林先生的意見，希望林先生能夠完全接受。

#### 四

六月十一日。又接到林先生來信，他對我們六月八日的回信，認為「有兩點甚難理解」：第一，說我們已承認他是中共代表，就不應該不把中共正式提出的意見轉報中央，而只片面要求他個人接受中央提示案，他個人如何能夠做主？第二，他承認六月五日面交的中共所提的十二條，誠與西安商談意見，「略有」出入，但中央提示案和西安商談的意見亦有出入，他以為這種談判過程中的出入雙方都有，不足為異，他現在已經將中央提示案電告中共中央，我們就不應該拒絕將中共正式提出的意見，轉呈中央請示。

其實林先生說不能理解的兩點，事實是很顯明的，正因為林先生是中共的代表，所以他所表示的意見，當然可以作算的，至於中共隨後所提的十二條內容與林先生的意見大有出入，而且中共對於服從軍令政令的根本觀念，並無表示，只是提出片面的要求，所以我們當時鄭重聲明不能轉呈，是不難理解的，但我們因為希望問題早日得到解決，尤不願大家因此發生誤解，所以仍將林先生交來的十二條轉呈中央政府，隨奉中央指示，以「中央六月五日已以提示案交林代表轉達中共，凡中共意見，中央政府所能容納者，該提示案已儘量容納，希望中共方面接受」。

六月十五日我們就將中央的指示，函達林先生，并申述此次商談之基本精神，須本統

一國家軍令政令之原則，爲改善現狀增強團結之前提，而中共所提十二條的內容，對於如何實行中央政府的軍令政令，和改善措施整編部隊各點，均未提及，至於整編部隊的數字，在西安時我們說整編部隊可能的數字是三軍八師，現在中央提示案決定爲四軍十師，比較我們所說的數字還增加了兩師，可見中央儘量遷就的意思。

## 五

六月十五日我們回覆了林先生的信以後，經過十幾天，中共方面，對於中央提示案仍無答復，至七月三日，林先生約我們會談，口頭提出，對中央提示案有兩點商量：第一，關於政治問題，希望中央將「民主」尺度放寬；第二，關於軍隊問題，希望按五軍十六師擴編，同時又說延安有電報，歡迎你們兩位到延安商談，當時我們就說明：關於民主問題，政府已在採取各種措施，促進民主政治的實施，例如廢止圖書事先強制審查辦法，嚴令後方各省完成縣參議會之設置，及中央即將公佈保障人民身體自由之法令，和其他正在擬議中的很多關於民主的措施，不必列舉，至於軍隊擴編數目的問題，中央正在勵行精兵政策，儘量的緊縮單位，對於中共的要求，已經儘最大限度來容納，如果拿抗戰初期國軍數額和現在增加數量來作一比對，就可以了解中央委曲求全的苦衷，最後我們認爲像這樣談下去，有點像故意拖延，似乎應該將中央提示案作一全面確切的答復，來作具體商討的基礎，不宜再在口頭上空言往返，討價還價，徒增支節，並表示如在重慶能得到答復之後



，我們可以考慮去訪問延安的問題。

## 六

至七月十三日，林先生又來會面，當時他又請中央對他們所提的十二項有所「指示」，而對於中央交給他們的提示案如何答覆問題，他並未提及，當時我們以林先生所提各項問題過去多已經加以說明，殊不必再加辯駁，僅答林先生來意已明，我們再另訂期商談而散。

## 七

到了七月廿三日，林先生又來一信，內容仍係問及我們對他所提十二項的意見，是否已請示答覆，並請我們到延安去。

七月廿五日，我們再與林先生見面，對於他所提十二項內列各項問題，在口頭上曾有較詳細之解釋，並告以中央所提出之提示案，即係中央具體意見，乃中共延久未予答覆，並且我們會說中共如此態度，很像有意延拖，不願意來解決這個問題的。

## 八

我們在這個期間，曾繼續研究這個問題，並且考慮在上一次口頭答覆之後，應該再有

一個書面答復，才比較具體，又於八月五日全林祖涵先生見面一次，曾說明我們預備將上一次口頭答復的意見，做成一個書面答復，同時并等你們對中央提示案有確實答覆之後，那時我們再考慮進一步商談，和是否去延安的問題，在此次談話之後於八月十日根據前意寫成一信，送給林先生，其要旨如左：

「從五月三日在西安晤面起，已逾三月，自六月五日面交中央提示案之後，亦兩月餘，迄未得中共切實答覆，殊出初料之外，此次政府提示案之內容，不但對去歲林彪師長所請求各款，幾已全部容納，即對先生在西安表示之意見，亦已大部容納，中共既表示擁護團結與統一，請即促其接受。」

關於中共之十二條意見，第一至第三條，政府提示案中，已剴切申示：在抗戰期內勵行中共及一切黨派所接受之抗戰建國綱領；在抗戰結束後一年內實行憲政，予各黨派以同等地位，意義明豁而具體，若於申示以外，標舉若干毫無邊際之抽象文句，徒爲異日增加糾紛，現在中央政府已定之政策，在依抗戰發展勝利接近與夫社會安定，逐漸擴大人民自由範圍，促進地方自治；一方面政府希望中共接受提示案後，隨時提出關於勵行抗戰建國綱領之意見，並積極參加參政後及憲政實施協進會之工作，期彼此觀點漸趨一致，國家真正統一團結，可以實現，此爲政治解決之根本意義。

十二條中關於軍隊編制，數額，軍隊駐地，軍餉，軍械者四條：十八集團軍原來編爲三師，現在允許擴編爲四軍十師，在政府勵行精兵政策裁減單位之時期中，自屬委曲求全

之至，關於軍隊駐地，提示案一面指示集中使用之原則，一面規定在集中前整訓指揮系統，實已面面兼到，至於軍餉，則已規定國軍享受一律待遇；軍械則政府當隨時依需要與所負之任務為合理之分配。

十二條中要求政府承認「陝甘寧邊區」及「華北根據地民選政府」之一條，在陝北邊區問題，政府提示案中已提出十分寬大之辦法，至其他任何地區之行政機構，自當依照提示案，由各該管省政府接管，以免紛歧。

其他尚有若干要求，或則與事實不符，或則與事理不合，均已向先生口頭說明，茲不贅述。」

## 九

以後接到林祖涵先生八月三十日來函，以奉中共之命答復我們八月十日的去信，大意是：

「一、認為我們八月十日的信上，含有責備中共無理拖延的意思，係完全不合事實與錯誤的見解，因為政府提示案與中共所提之書面十二條與口頭八條，原則上相距太遠，并舉出（一）提示案對於實行民主政治，承認各黨合法，釋放政治犯等一字未提；（二）編軍的數目和編制外軍隊的取消及軍隊集中使用；（三）祇要求邊区政府實行中央法令，而不提實行三民主義，不承認現行各項設施與法令；（四）取消抗戰根據地的人民選出之民主政府等

，認為距離太遠的事實。二、認為根本解決問題的障礙，由於中央政府與中共及「全國廣大人民」的觀點，有着很大的距離，因為政府始終不願意立即實行三民主義和民主制度，三、希望中央政府在解決全國政治問題與國共關係問題，應把整個國家的利益放在第一，應從有利全國團結抗戰，有利促進民主的觀點出發，後面又重複提到上面已經列舉過的「政治問題」，「軍隊問題」，和「邊區」及「華中、華南、華北各根據地」等問題，重申第一項各點所持之態度，同時張大了許多範圍。四、申述中共始終忠實執行四項諾言，忠實實行三民主義，堅持民主團結與政治解決的方針，證明中共不願使談判破裂」。

我們看了林先生八月三十日來信之後，使我們感覺詫異，其中所舉各項情形的真實性，究竟到如何程度？想各位都會有一個很確當的判斷，用不着多加說明，我們是奉命商談具體問題，從去西安到現在，已經把問題愈談愈遠了，所以遠的原因，諸位從以上的文件裏，可以看得出，我們不能不引為惋惜，但是我們並不絕望，為了使中共方面，能夠確實的明瞭我們的意思，所以隨後就復了一信，大意是：

「申述中央政府命我們與先生商談，在求全國之真正統一，亦即求中共切實履行其四項諾言，（見附註）切實擁護全國政權之統一，如先生所說中共始終執行四項諾言，則中共對各地國軍何致有許多侵犯的事實？中央何致今日尙須命我們與先生商談服從軍令政令等問題？」

中央命我們與先生商談統一，原為未來之憲政與整個三民主義的實施，樹立強固之基

確，關於民主政治及黨派問題，中央提示案已有剴切條文，我們八月十日函內復有詳細的申說，何以說是，一字不提？來函所說的中共在邊區及各抗戰根據地澈底實行了三民主義，又說在中共的一切區域內，一切人民和團體，均享有一切自由和權利，但有許多事實，迫着我們否認，即如民主與自由，國父遺教，欲以五權分立為民主的正軌與人民自由的保障，中共區域內可有司法權監察權獨立的事實？中共區域內的人民乃至共產黨員，可有言論自由，身體自由的保障？我們前函希望對於民主自由等問題，勿提出毫無邊際的抽象要求，並請中共隨時與中央政府，國民參政會以及憲政實施協進會等切實商討各項問題的解決辦法，不惟至當，且屬必要。

說明來函所提種種問題，早已一一奉告，其中一點，即中央提示案對於去歲林彪師長和最近先生在西安所提意見，已經「大部容納」，確係絕對真實，但先生依然強調「距離太遠」，可是距離遠的原因，不外是因中共的要求與時俱增，先生在西安所提的較去年林師長所提的多，中共所提的十二條又較先生在西安所提的多，此次來函又於十二條以外，加上所謂「口頭八條」，要求既與時俱增，距離乃不能不遠。例如陝北邊區和所謂「其他根據地」問題，林師長所提為「陝北邊區照原地區改為行政區，其他各地區，另行改組，實行中央法令」；先生在西安簽字的文件，並未列入「其他根據地」；中共所提十二條中，則要求承認「陝甘寧邊區及華北根據地民選政府」；先生來函則更以「陝甘寧邊區政府及華北華中華南各根據地民選政府」的承認為言，此種逐漸變化，逐漸擴大要求的情形下

，倘商談不能接近，其責任究在誰方！

說明中央政府與國民黨決不將一黨一派的利益，置於國家民族利益之上，切望中共能夠同守此旨。

最後說到只要於事實有益，我們赴延安一節，亦所樂從，茲間中共能否派負責代表來重慶解決本問題，并派何人代表偕返重慶。

附註二十六年九月中共申述之四項諾言

- (一)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之必需，本黨願為其澈底的實現而奮鬥。
- (二)取消一切推翻中國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 (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
- (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

## 十

這一次商談的經過和來往有關文件的重要內容，一一報告如上，今日中共問題，為了國家統一團結及爭取抗戰勝利，建國成功，全國的人民，都熱切希望早日得到合理的解決，我們受中央政府之命，負責商談的任務，當然更抱着最大的熱忱和希望，中央政府所要求的，祇為軍令與政令的統一，必須如此，乃能有確實的團結，乃能舉國軍民一致，更必

須如此，乃能有利於抗戰建國，在這一個大前提之下，中央政府無不根據事實，委曲求全，儘是容納中共的意見，這在中央擬案上，都可以明白看出來，至於民主自由問題，中央政府一向重在實事求是，實在去做，不欲徒托空言，在抗戰建國綱領原則之下，如開放言論，保障人民自由，擴大民意機關職權都在着着進行，今後自仍本此方針，繼續致力，使戰爭結束之後，能夠順利推行憲政，那時候黨的問題，自然可以解決，現在中共方面，雖然還沒有接受中央提示案和實行遵守國家軍令政令的表示，但是我們希望中共當能本諸團結抗戰的真義，以事實和行動來踐履諾言，實現國家真正的統一，中央政府決不變更政治解決的方針，而且竭誠期待中共修正其所持的觀點，早日解決這一個問題，以慰全國同胞的期望，因知諸位先生對這一問題之關切，特來報告關於本問題商談經過，並鄭重說明中央政府的態度和願望，還請諸位先生賜教。

### 渝共談判文件

#### 一、林彪在渝所提四項：三十二年

在中共地區辦黨辦報

二、軍隊問題，希望編四軍十二師，請按中央軍隊待遇。

三、陝北邊區，照原地區改為行政區，其他各邊區行政區，實行中央法規。

四、作戰區域，原則上接受中央開往黃河以北之規定，但現在只能作準備佈置，

戰爭完畢，保證立即實施。如戰時情況可能（如總反政時），亦可商承移動。

二、林祖涵在西安簽字之件：三十三年五月十一日

自五月四日至全月八日的會談中所表示的各項：

甲 關於軍事者：

- 一、第十八集團軍及原屬「新四軍」之部隊，服從軍事委員會之命令。
- 二、前項部隊之編制，最低限度，照去年林彪所提出四軍十二師之數。
- 三、前項部隊經編定後，仍守原地抗戰，但須受其所在地區司令長官之指揮，一俟抗戰結束後，應遵照中央命令移動，以守指定集中之防地。
- 四、前項軍隊經故編後，其人事准由其長官依照中央人事法規，呈報請委。
- 五、前項軍隊改編後，其軍需照中央所屬其他軍隊同樣辦法，同等待遇。

乙 關於陝甘寧邊區者：

- 一、名稱可改爲陝北行政區。
- 二、該行政區直隸行政院，不屬陝西省政府管轄。
- 三、區域以原有地區爲範圍，（附地圖）并由中央派員會同期審定。
- 四、該行政區當實行三民主義，實行抗戰建國綱領實行中央法令，其因地方特殊情形而需要之法令，可呈報中央核定施行。
- 五、該行政區預算，當逐年編呈中央核定。



六、該行政區及第十八集團軍等部隊，經中央編定發給經費後，不得發行鈔票，其已發行之鈔票，當由財政部妥定辦法處置。

七、該行政區內國民黨可以去辦黨辦報，並在延安設電台，同時國民黨也承認中共在全國的合法地位，並允許在重慶設電台，以利兩黨中央能經常交換意見，

八、陝甘寧邊區現行組織暫不予以變更。

丙、關於黨的問題者：

依照抗戰建國綱領之規定，予中共以合法地位，停捕人，停扣書報，開放言論，推進民治，立即釋放因新四軍而被捕之人員，及一切在獄之共產黨員，如廖承志，張文彬等，并通知保護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之軍人家屬。

丁、其他

一、中共表示繼續忠實實行四項諾言，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戰并領導建國，國民黨表示願由政治途徑公平合理的解決兩黨關係問題。

二、撤除陝甘寧邊區之軍事封鎖，現在對於商業交通，即先予以便利。

三、游擊區的軍事政治經濟問題，服從國民政府及軍事委員會的領導，一切按有利抗戰的原則去解決。

林祖涵五月十一日

三十三年六月五日中央對中共問題政治解決提示案：

三十三年六月五日中央對中共問題政治解決提示案：

茲以林代表祖涵在西安所表示之意見爲基礎，作以下之提示案：

甲、關於軍事問題：

一、第十八集團軍及其在各地之一切部隊，合編共爲四個軍十個師，其番號以命令定之。

二、該集團軍應服從軍事委員會命令。

三、該集團軍之員額，按照國軍通行編制，（由軍政部頒發）不得在編制外另設縱隊支隊或其他名目。以前所有者，應依照中央核定之限期取消。

四、該集團軍之人事，准予按照人事法規呈保請委。

五、該集團軍之軍費，由中央按照國軍一般給與規定發給，并須按照經理法規辦理，實行軍需獨立。

六、該集團軍之教育，應照中央頒佈之教育綱領，教育訓令實施，并由中央隨時派員校閱。

七、該集團軍之各部隊應限期集中使用，其未集中以前及其在各戰區之部隊，應歸其所在地戰區司令長官整訓指揮。

乙、關於陝甘寧邊區問題：

一、該邊區之名稱定爲陝北行政區，其行政機構稱爲陝北行政公署。

二、該行政區域以其現有地區爲範圍，但須經中央派員會同勘定。

### 三、該行政區公署直隸行政院。

四、該行政區須實行中央法令，其因地方特殊情形而需要之法令，應呈報中央核定施行。

五、該行政區之主席，由中央任命，其所轄專員縣長等級由該主席提請中央委派。

六、該行政區之組織，應呈請中央核准。

七、該行政區預算，應逐年編呈中央核定。

八、該行政區及第十八集團軍所屬部隊駐在地區，概不得發行鈔票，其已發之鈔票，與財政部妥商辦法處理。

九、其他各地所有中共自行設立之行政機構，應一律由各該省政府派員接管處理。

### 丙、關於黨的問題：

一、在抗戰期內，依照抗戰建國綱領之規定辦理，在戰爭結束後，依照中央決議，召開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實施憲政，中國共產黨當與其他政黨遵守國家法律，享受同等待遇。

二、中國共產黨應再表示忠實實行其四項諾言，附擬口頭酌定事件如下：

中共如將以上辦法實行後，則（一）中央對於撤去防護地區之守備部隊，可予考慮，並可恢復該地區與其他隣地區之商業交通。（二）中共人員違法被捕者，政府亦可從寬酌予保釋。

四、中共所提出十二條

三十三年六月四日

文白雪艇先生勸鑒：敬啓者，敵黨中央關於解決目前急切問題之意見廿條，自上月廿二日面交兩先生未被接受後，弟即向延安方面報告，茲奉敵黨中央覆電，爲了尊重兩先生意見以利談判，以示我方希望解決問題之誠意，將二十條改爲十二條，而把那些小的問題，改爲備忘錄，茲特抄上一份，請轉呈貴黨總裁，及貴黨中央商覆爲荷，專此，敬頤勳祺！

弟林祖涵啓卅三年六月四日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關於解決目前若干急切問題的意見：

國共兩黨合作抗戰，已歷七年，中共謀國之忠誠，作戰之英勇，執行三民主義，實踐四項諾言，擁護國民政府及蔣介石先生抗戰建國，始終如一，均爲有目所共見。惟目前抗戰形勢，極爲嚴重，日軍繼續進攻，而國內政治情況，與國共關係，尙未走上適合抗戰需要之軌道，爲克服目前困難，並認真準備反攻起見，中共方面認爲惟有實行民主與增強團結一途。爲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決以下緊急萬分的問題，這些問題有關於全國政治方面者，有關於兩黨懸案方面者，茲率直臚陳如下：

甲、關於全國政治者

- 一、請政府實行民主政治，保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人身之自由。
- 二、請政府開放黨禁，承認中共及各抗戰黨派的合法地位，釋放愛國政治犯。

三、請政府實行允許名副其實的人民地方自治。

乙、關於兩黨懸案者

一、根據抗戰需要，抗戰成績，及現有軍隊實數，應請政府對中共軍隊編十六個軍四

十七個師，每師一萬人，為委曲求全計，目前至少給予五個軍十六個師的番號。  
二、請政府承認陝甘寧邊區及華北根據地民選抗戰政府為合法的地方政府，并承認其  
為抗戰所需要的各項設施。

三、中共軍隊防地，抗戰期間維持現狀，抗戰結束後另行商定。

四、請政府在物質上充分接濟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自一九四〇年以來，政府無顆彈  
片藥分錢粒米之救濟，此種情況，請速改變。

五、同盟國援助中國之武器，彈藥，藥品，應請政府公平分配於中國各軍，十八集團  
軍及新四軍應獲得其應得之一份。

六、請政府飭令軍政機關取消對於陝甘寧邊區及各根據地的軍事封鎖，經濟封鎖。

七、請政府飭令軍令機關停止對於華中新四軍及廣東游擊隊的軍事攻擊。

八、請政府飭令黨政機關釋放各地被捕人員，例如：皖南事變時被俘的新四軍官兵葉  
挺等，廣東的廖承志，張文彬等，新疆的徐杰，徐夢秋，毛澤民，楊之華，潘却  
等，四川的羅世文，車耀先，李椿，張少明等，湖北的何彬等，浙江的劉英，西  
安的宣俠父，石作祥，李玉海，陳元英，趙祥等此等人員均係愛國志士，請予恢

復自由。

九、請政府允許中共在全國辦黨辦報，中共亦允許國民黨在陝甘寧邊區及各民主邊區辦黨辦報。

以上各條，僅舉其主要者，中共方面誠懇希望我國民政府予以合理與儘可能迅速之解決，誠以日軍正大舉進攻威脅抗戰陣線，若我國共兩黨不但繼續合作，而且能對國內政治予以刷新，黨派關係予以改進，則不特於目前時局大有裨益，且於明年配合同盟國舉行大規模之反攻，放出堅固之曙光，願我政府實利圖之，中共中央代表林祖涵。

民國卅三年六月四日

五、王世杰張治中對中共十二條之復函三十三年八月十日

伯渠先生勸鑒：自五月三日弟等與先生晤面於西安，往復商談，迄今已逾三月，自六月五日弟等以中央政府提示案面交先生，為時已兩月有餘，迄今尚未接到中共方面之切實答復，此等情形，殊出弟等初料之外，政府在提出提示案以前，特命弟等先赴西安，與先生晤談至兩週之久，藉以充分聆悉中共方面之意見，用意已極慎重，政府提示案之內容不但對於去歲中共代表林彪師長所請求諸款，幾已全部容納，即對先生最近在西安所表示意見，亦已大部容納，凡斯事實，只須將有關文件，略一比照分析，即可瞭然。竊意政治解決，既為中共所表示贊同，團結與統一，亦為中共所宣言擁護，弟等今茲實不能不敦請先生向中共主持諸公剴切敷陳促其接受政府提示案，并迅予見覆，至六月五日先生交來之中

至共十二條意見，弟等於六月十五日業將政府指示及弟能觀感以書面送達左右，茲因先生二  
月再欵促，弟等爲更詳盡之答復，國將政府意旨再爲先生詳言之：

一、十二條意見中之第一，第二，第三三條，涉及實行民主政治，保證自由，承認中共合法地位與地方自治諸事，對於此類問題，政府提示案中業已劉切申示兩點，即在抗戰期內勵行中共及一切黨派所已接受之抗戰建國綱領，在抗戰結束後一年以內，實行憲政，予各黨派以同等地位，此種申示，意義較爲明瞭，亦較爲具體，倘中共欲於此種申示以外，更標舉若干毫無邊際之抽象文句如「實行民主政治」，「保證自由」等等，於事實究有何裨益，徒爲異日增加糾紛而已，蓋「民主政治」云云，其他云云，中共過去或今日之所信，固未必與國民黨黨員乃至一般民主主義者之所信爲一事也，茲願與先生告者，計有兩事：（一）中央政府之既定政策，在依抗戰之進展，勝利之接近，與夫社會之安定，而逐漸擴大人民自由之範圍，促進地方之自治。（二）政府希望中共於接受提示案後，隨時提出關於勵行抗戰建國綱領之意見，並積極參加參政會及憲政實施協進會工作，誠能如是，彼此之觀點，當不難漸趨一致，國家之真正統一與團結，庶幾可以實現，政治解決云者，其根本意義，亦即在此。

二、十二條意見中，涉及軍隊編制數項，軍隊駐地，軍餉，軍械者四條，十八集團軍過去核定編制原爲四萬五千人，政府提示案允許編爲四軍十師，確實從寬核定，

蓋帶兵官自行擴編軍隊，其事原不可爲訓，且政府正勵行精兵政策，一般軍隊均在裁撤單位，於此時期，獨允十八集團軍擴編爲四軍十師，自屬委曲求全之至，關於軍隊駐地，政府亦已考慮至再，提示案一面指示集中使用之原則，一面規定在未集中前受所在地戰區司令官之整訓指揮，原則與事實實已兼顾。倘如中共所提意見，抗戰全期間內，軍隊防地，概維現狀，試問中央何以計劃反攻？或指揮作戰？至於軍餉，提示案中業已允許第十八集團軍享受與一般國軍相同之待遇，軍械之供給，政府當隨時視反攻之需要，與各軍所負之任務，爲公允與合理之分配。

三、十二條意見中，列有一條要求政府承認「陝甘寧邊區」，以及「華北根據地之民選政府」，陝北邊區問題，政府願予考慮，並已於提示案中提出十分寬大之辦法，藉以容納中共之意見，至其他任何地區之行政機構，自當依照提示之提示，由各該管省政府接管，以免分歧，而杜流弊。

四、十二條意見中尚有若干要求或則與事實不符，（如要求停止攻擊中共某某軍隊）或則與事理不合，（如對中央在陝北辦報等事，設定某某條件）弟等已向先生口頭說明，茲不贅述。至於十二條意見中，所舉解除陝邊之「軍事封鎖」，及釋放若干人犯兩項要求，弟等已向先生口頭聲明，俟此次商談獲有切實結果，當予考慮並諭之，政府對於中共方面之意見，實已儘可能範圍予以容納，至於政府之根本

意願，則在軍令政令之貫澈與統一，中共提出十二條意見書時，既未將服從中央軍令與政令一層列入條款之內，即該書面之引言，亦未將中共對於此一根本問題之今後態度爲剴切說明之表示，弟等所不敢轉陳者，大半以此，嗣因先生口頭聲明，謂中共方面對於服從軍令政令決無問題，弟等乃敢以先生之口頭聲明與十二條書面一併轉陳政府，此又弟等所願附帶聲明者也，專此佈達，諸希專察，并頤時祺。弟王世杰 張治中敬啓三十三年八月十日

六、林祖涵覆函三十三年八月卅日

雪艇文白先生勦鑒：八月十日來函，對敵黨十二條意見所作之答復，於收到之後，即轉電延安，以返往電碼多有訛誤，校正費去一些時間，茲將敵黨中央命弟奉覆的意見，轉告如後，敬請再轉達蔣主席及貴黨中央。

(一)來函說：「政府提示案已交給中共兩月餘，尙未得中共方面之切實答覆」，殊出先生等「意料之外」，并說這個提示案，已能「大部容納」中共之意見，似含有責備我方無理拖延之意，應該聲明，這是完全不合事實，與錯誤的見解，因爲弟已在屢次會談中，表示政府提示案，與我黨提出的書面十二條，及口頭八條，在原則上相距太遠，無法接受，譬如在政府提示案中：(一)關於我方所迫切要求解決的實行民主政治，承認各黨合法，釋放愛國政治犯，釋放葉挺被捕人員等項，一字未提。(二)編軍數目，只承認四個軍十個師，且不顧在需要及敵後游擊區戰爭環境，要將十個師以外數十萬正在抗戰的軍隊「限期取

消」并要將十個師「集中使用」。(三)對邊區政府只要求實行國民黨中央政府之法令，不提實行三民主義，不承認爲抗戰所需要，并且已經實行大見成效的現行各項民主設施與民主法令。(四)對所有各根據地人民選舉的各民主政府，要求取消。由於兩黨意見距離如此之遠，但敵黨中央，仍不願談判停頓與破裂，曾命弟邀請兩先生去延安商談，并要弟回延安報告談判經過，以求獲得繼續商談之途徑，使問題終能在有利抗戰團結，有利促進民主的原則下，得到合理解決，兩先生對延安之行，已稱在請示中，弟固望能早日實現也。

(二)國共兩黨關於全國政治問題，及兩黨關係問題之談判，並非自這次弟與兩先生談判開始，遠自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以來，八年之間，敵黨曾不斷向國民黨建議，只有立即實行民主，實行孫中山先生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提出的革命的三民主義，才能增強團結抗戰的力量，只有循民主途徑，才能公平合理的解決國共關係，解決國內其他一切政治問題，我們擁護統一，是擁護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統一，我們擁護蔣委員長及國民政府，是要求他堅決抗戰與實行三民主義，這不僅是共產黨一黨的要求，而且是全國百分之九十九的廣大人民的要求，爲了求得國民黨中央政府能夠接受敵黨的建議，接受全國廣大人民的要求，敵黨於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的宣言，曾提出了保證實行四項諾言，八年來這四項諾言，我們早已完全實踐了，而且至今信守未渝，這是有充分事實可以證明的。今年三月十二日我黨周恩來同志在延安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九週年紀念大會的演說中，已

經詳細的說到了這點，可以參考。八年來敵黨中央，又不斷派弟與周恩來，董必武、林彪、  
諸同志，耐心的向國民黨中央政府請求解決全國政治問題，與國共關係問題。周董兩同志  
駐渝已有數年，始終並未得到結果，究竟根本解決的問題的障礙在那裏呢？不能不指出是  
由於國民黨中央政府諸公的觀點，和我們及全國廣大人民的觀點，有着很大的距離，政府  
負責諸公，始終不願意立即實行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及足以團結全國各黨派各階層作  
戰力量的民主制度，這就是現時雙方談判所以相距甚遠的真正原因。

(三)我們希望國民黨中央政府，在解決全國政治問題與國共關係問題上，應把整個國  
家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而不把一黨一派一己的私利，放在第一，應從有利全國團結抗戰  
有利促進民主的觀點出發，而不從維護一黨統治的方針出發，才能使雙方的談判易於接近  
，才能使一切問題可以得到公平合理的解決，但是政府提示案及兩先生八月十日來信，  
可惜均不能符合這個期望，比如(一)關於全國政治制度問題，我們所提出的三項要求1.  
請政府實行民主政治與保障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人身之自由。2.承認中共及  
各愛國黨派的合法地位，釋放愛國政治犯。3.實行名符其實的地方自治，正是反映今天全  
國人民最迫切的要求，正是今天為着團結全國力量譲真準備反攻必須立即實行的措施，如  
能這樣做，不僅對整個國家民族有利，而且對國民黨亦有利的。然而兩先生的來信仍堅持  
「中央政府之既定政策」。定要在抗戰以後「才實行憲政・實行民主・批評我們所提民主  
要求為「毫無邊際之抽象文句」，認為事實無裨益，「徒為異日增加糾紛」，但照我們

的經驗，在我們這樣的艱難困苦的環境中，人民尚能進行普選，討論國事，選舉民主政府，實行地方自治，那有大後方反不能實行民主政治的道理？因此一切問題，都看國民黨有沒有實行民主政治的決心和誠意，如果有，就應該在抗戰期中立即實行憲政，而不是推在抗戰之後。（二）關於中共所領導的四十七萬七千正規軍之編制，防地，與餉械問題，如果從這個軍隊過去作戰的成績，與今天準備反攻的需要來說，他在八年來異常艱苦的戰鬥環境中堅持與發展了三大戰場，（華北、華中，華南）建立起許多強固的作戰根據地，解放了八千八百餘萬的人民，組織了二百三十餘萬的民兵，並成為將來總反攻的先鋒部隊，為了準備反攻的需要，政府應當獎勵他、裝備他、增強他，首先就應當全部承認他，才更為合理，我們在建議書中，請求政府「編為十六個軍，四十七個師」，目前至少給予五個軍，十六個師的番號」。是為着談判更容易接近，關於防地，在作戰期間，維持現狀，及置國援華物資，請求公平合理分配等，都是適合作戰需要，與無可非難的，而政府提示案的「限期取消」，與「限期集中使用」的辦法，是未能顧計作戰需要，與游擊戰爭環境，兩先生八月十日來信中，強調反對帶兵官「自行擴編軍隊」，與反對軍隊防地維持現狀，責備我們不守軍令的統一，但兩先生恰恰忽視了一件平常人都懂得的真理，這就是今天我們中國是在抗戰中，如果我們反對在發展人民作戰武裝，或企圖削弱消滅這個作戰武裝，以及想使人民作戰武裝從該地離開，這一切都會在實現上成為有利於敵人的。（三）今天陝甘寧邊区政府，及華北華中華南各根據地民選政府，其所實行的一切完完全全是革命的三

民主主義，堅持抗戰，就是實行民族主義，抗戰政權完全是民權主義性質的，我們各抗選根據地，……一切人民和抗日團體，均享有一切自由權利，並行使直接民權，組織三三制的地方政府，我們又實行勞動互助生產，節約，救災，開荒，減租，減息，精兵簡政，普及教育，擁政愛民，擁軍優抗，減輕人民負擔，改善工農生活等政策，更無一不合乎民生主義的原則，由於我們在邊區及作戰根據地澈底實行三民主義，所以能團結全體人民，克服一切困難，長期堅持抗戰，并可以有力量反攻，像這樣的民主政府，就應當承認他們為合法的地方政府，就應當給他們以地方自治的權利，像這種的政府，已經實行大見成效的各項民主設施，與民主法令，就應該加以獎勵提倡，推行於全國，這才是真正奉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的國民黨中央政府所應採取的態度，但政府及示案及兩先生八月十日來信，對邊區政府只求實行國民黨中央政府之法令，對各根據地人民選舉的各民主政府，與各種有利作戰的民主設施，則要求取消，也是不利於今天作戰的需要的。

(四)總之，依照目前形勢，要最後勝利，國共兩黨必須團結，國共之間所存在的問題，必須從速解決，而這種解決，只有國民黨當軸諸公立即實行民主政治，並從民主途徑中公平合理的解決國共關係，才能增強全國團結作戰力量，才能使一切走上軌道，才能停止目前敵人進攻，配合將來的全面反攻，也才能建立戰後的國內和平合作，與國際和平合作的關係，我們共產黨人，是以十分熱烈的心情來希望國民黨當軸在民主與團結的基礎上，迅速改變其舊有政策，才能打開目前政治上的僵局，與完成同盟國共同期望的神聖事

業，我們這裏絕沒有乘國民黨形勢不利而提出什麼過高的要求，更沒有利用國民黨處境困難而拖延不願解決。（有些無知的人正在如此散佈謠言）凡所主張，都是爲了爭取全民族抗戰勝利，必須實現的東西，我們是在愛護幫助國民黨進步。而不是在冷眼坐視國民黨的困難，耿耿忠言，定爲國民黨賢達所鑒察，希望兩先生將上述意見，再向蔣主席及貴黨中央轉陳，時乎不待，望早決策，我們共產黨人始終忠實執行四項諾言，忠實實行三民主義，堅持民主團結與政治解決的方針，以期待國民黨中央政府的回答，敵黨中央所提邀請兩位先生赴延安繼續談判一事，不僅表示敵黨不願使談判破裂之誠心，而且想使國民黨中央政府的重要負責人員，親到邊區看看我們是怎樣的忠實地實行四項諾言與澈底實行三民主義，我們在邊區及各根據地的各種建設是很可以爲全國實行民主參考的，想因此使雙方談判更易得到解決，未識兩位先生對此已商得政府及貴黨中央同意否？盼能早覆。敬頌  
勳祺。

七、張治中王世杰之再答復三十三年九月十日

伯渠先生動鑒接展八月卅日來示藉悉一一，弟等前函在本心靜氣之旨，說明中央政府對於中共要求，何者可以容納，何者可以相當容納，何者可留待將來考慮，何者無從容納，弟等之意在切切實實的商討，以求問題的解決，來示則故爲誇張抹煞之詞，與弟等之期待，完全相反，弟等循誦來示之餘，雖不欲一一辯正，僅略答一二，尙祈惠察。

(一) 中央命弟等與先生商談，在求全國之真正統一，換言之，即在求中共切實履行其

四項諾言，切實擁護「全國政權統一」切實服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指揮，先生來函謂，「八年來這四項諾言我們早已完全實踐了」，又謂「我們共產黨人始終執行四項諾言」，假使中共在過去曾經切實履行各項諾言，何至中共在各地對國軍有如許侵犯之事實？假使中共現在尚履行各項諾言，中央何至今日當須命弟等與先生商談服從軍令政令等等問題？

(二) 中央命弟等與先生商討統一，原欲為未來之憲政與夫整個三民主義的實施，樹立強國的基礎。關於如何實現民主政治問題，以及黨派問題等等，中央提示案中既有剴切條文，弟等八月十日函中復有詳細的申說。來示則謂中央對於中共所提此類要求，「一字未提」，弟等真不知先生何故為此不實之言。尤使弟等惶惑者，來示謂「我們在邊區及各根據地澈底實行三民主義」，並謂在中共的一切地區內，「一切人民和團體，均享有一切自由和權利」。假使事實果如來示所言，弟等惟有感佩。然而許多事實均追着弟等否認。即如就民主與自由而言，國父遺教顯然欲以五權分立為民主的正軌與人民自由的保障。國民政府不敢自謂，對於此點已經完成一切準備，因此不敢以業經「澈底實行了三民主義」自居，中共區域內果有司法權獨立，監察權獨立等等事實乎？中共區域內之人民乃至共產黨員，果有言論自由身體自由等等保障乎？如其不然，則為切實實行三民主義計，弟等何能照來示所言，轉請中央政府，將中共的「各項民主設施民主法令」予以「提倡，推行於全國」？弟等前函曾促請中共諸公，對於民主自由等問題，勿提出毫無邊際的抽象要求，以增

加異日之糾紛，而應隨時與中央政府國民參政會以及憲政實施協進會等切切實實的商討各項問題的正當解決辦法。接誦來示後，弟等愈覺弟等前函所言，匪惟至當，且屬必要，對於以上兩點，弟等深望中共諸公能怯除一切客氣，充份理解，庶幾會後商談不致徒託空言。至於來示中其他抹煞事實之語，弟等早已一一奉答，關於軍隊編制，軍隊調動等問題，弟等前函及口頭業已有所說明，亦覺無再說之必要。惟尚有一點，弟等不能不鄭重聲明，弟等前函謂中央提示案對於去歲林彪師長最近先生在西安所提意見，已「大部容納」云云，係絕對真實之言，無絲毫誇張之意。竊意任何第三者，如將林彪師長所提四條，暨先生在西安簽字之件，持與本年六月五日中央提示案逐條比照，應以弟等「大部容納」之言為真實。顧先生來示依然強調「距離太遠」之言。倘中央提示案確與中共要求「距離太遠」，其中原因究竟何在？一言以蔽之曰，則因中共方面之要求與時俱增也。先生在西安所表示之意見，較去歲林彪師長所提之要求為多，六月四日中共所提之十二條，又較先生在西安時所提之要求為多，此次先生來函，又復於十二條之外，加上所謂「口頭八條」。要求既與時俱增，距離乃不能不遠。譬如陝北邊區，暨所謂「其他根據地」問題，在林彪師長所提之四條中，定為「陝北邊區照原地區改為行政區，其他各地區，另行改組，實行中央法令」。先生在西安簽字文件中，並未列人「其他根據地」問題，在六月四日中共所提十二條件中，則要求承認「陝甘寧邊區及華北根據地民選政府」。在先生此次來示中，則更以「陝甘寧邊區政府華北，華中，華南各根據地民選政府」的承認為言。在此種逐漸擴大要求的

情形之下倘商談未能接近，試問其責任究在何方？抗戰建國之工作，急待完成。時至今日，我國家民族，仍未能具備抗建成功之最低條件，（即全國的統一），中央政府與國民黨同人，誠不能不深自痛疚。尊示謂解決國共關係，應把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而不把一黨一派的利益放在第一，旨哉斯言，弟等深信中央政府與國民黨決不將一黨一派的利益，置於國家民族的利益之上，因此切望中共諸公同守此旨，庶幾商談能獲進展，一切問題，可以得到合理的解決。至於先生邀約弟等赴延安一行一節，只要於事有益，弟等亦所樂從，但中共能否派負責代表來重慶解決本問題，並派何人任代表，偕返重慶，當希見示為荷。專復並頌時祺弟張治中王世杰敬啓九月十日

中共代表林祖涵在渝參政會報告詞

各位先生，國民參政會主席團要我報告國政府派張文白王雪艇兩先生與中共中央派本人雙方談判的經過，本人對此感到十分興奮。

國共關係應該合理的調整，在現政治情況下為十分緊要事情，不僅參政會同人注意這一問題，全國人民也十分關切。我今天要報告的，就是我們與張王兩先生四個月來談判的過程。在這過程中大致有七個重要文件，主席團已印發，各位可請參考。

非難渝方缺乏誠意

談判四個月毫無結果

這此談判，本人從延安出來，抱着滿腔熱誠，希望能夠解決問題，並很高興在西安，

與張王兩先生不期而晤。我們的談判是在很友好的情形下進行的，迄今爲止，我們雙方的談判原則上存在着很大的距離，雖然我們的談判尚未最後決定，但四個月來，還無結果可以報告。我們所要求於國民黨中央的，第一個是全國實行民主政治的問題，在今天日軍正深入國土，抗戰當在艱巨時期，必須全國軍民團結一致，必須全國人民都動員起來，日本是一個工業發達的國家，它是有力量的，它正在我國境內作戰，我們必須重視這一嚴重形勢。中國有四萬萬五千萬人民，不過沒有團結起來，沒有充份的發動起來，今天非常迫切需要將這全部力量團結起來，發動起來。用什麼方法來團結全國力量，來發動全國力量呢？我們認爲應該在戰爭中實行民主政治，只有民治政治才能團結全國一切力量，動員全國一切力量，以拯救我們民族國家的災難。我們主張實行三民主義，抗戰建國綱領，和中共所提出十大綱領，如這三大綱領真正實行就能團結全國力量，蔣委員長在戰爭初期曾說過「地無分南北，民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我黨中央在戰爭初期就主張實行新民主，動員人民，實現全面全民的抗戰，不應該是政府與軍隊片面戰爭。我們對立即實施民主以增強全國團結作戰力量的意見，戰爭以來是一貫如此主張，這次談判也是這樣提出來的。

### 中共要求共計三端

#### 擴編共軍承認黨政

其次，我們從國共兩黨關係上說，希望解決一些懸案，這些懸案主要有關軍隊、政權

、與黨三方面問題，我們在前線作戰八年，軍事政治形勢有很多變化。在戰爭初期，當時有八萬紅軍，政府只承認編了三個師，奉命出動，渡河入晉作戰，並得到最高統帥部的命令，要我們組織一些游擊挺進隊，挺進至前方作戰，我們自己看來，幾年來在前方艱困作戰，做得還好。十八集團軍，新四軍在晉、冀、察、熱、綏、遼、魯、豫、蘇、皖、浙、鄂、粵等省作戰建立了許多民選政權，我們經過七年多的作戰，正規軍已增加到四十七萬七千五百人，並組織了民兵二百廿萬人，我們要求政府先給我們五個軍十六個師的番號。同時，在前方已建立了十五個根據地，人民選舉了自己政府，管轄了八千八百萬人口，我們希望政府承認這些前方民主政權，管理和指導這些政權，在黨的方面，我們要求政府給中共以公開合法的地位，對其他黨派也是如此，我們希望政府撤銷對陝甘甯邊區政府的軍事封鎖與經濟封鎖，使邊區的人員商旅能夠有行動交通往返上的自由。我們黨向政府與國民黨中央提出了這樣的意見，國民政府會有一個提示案給我們，張王兩先生要我們照中央提示案來辦理，但這兩者中間的差別距離很大，以致談判至今毫無結果。本人現在僅略舉幾個較大的分歧之點來加以說明，首先從軍事問題來說中共所領導作戰的正規部隊四十七萬七千五百人，八年來在非常艱苦環境中，堅持與發展了華北、華中、華南三大戰場，並成為將來總反攻的先鋒部隊，為了準備反攻的需要，政府應當獎勵它，增強它，首先應該全部編成四十七個師才是合理。西安談判時我提出請求政府轉編六軍十八個師，張王兩先生表示困難接受，我黨中央六月四日提案請先給五個軍十六個師的番號，而政府仍不願答

應，只答應編四軍十個師。特別政府提示案中的編餘部隊「限期取銷」及已編者「限期集中」二點辦法，未能顧到戰時需要與游擊隊戰爭的環境。限期取銷，就等於不要人民抗戰，把攻復地區再給交敵人，這自然是不應該的。再從對民選地方政府的分歧之點來看。前方的各民選政府，全是民權主義性質的。我們要求政府承認這些區域的民選政府為其所管轄的地方政府，中央提示案則要取銷，這是從抗戰利益上不可理解的。再次關於黨派的公開合法地位，與人民言論集會結社身體自由的保障等問題，依目前情形而論，並未見有何改善。我們略舉幾例來談談言論自由問題，政府已表示言論尺度放寬，而實際上我們在前方近幾個月來打了不少仗。這戰報每月呈送軍令部，始終未能發表，送新華日報也是被扣，再如人民身體自由，政府自八月一日宣佈實行保障的規定，但實際上，我們一再要求釋放葉挺將軍，他既非共產黨員，去新四軍更為政府所勸請，不應該拘禁他。我們要求釋放自香港淪陷後返粵被捕的廖仲愷先生公子廖承志。此外還有很多政治犯身囚監中，我們也要求釋放，俱都未能做到。

### 共方自謂實踐諾言

#### 雙方意見相距仍遠

還有，張王兩先生給本人的信中也會責備我黨不實行四項諾言，這一點也要加以說明。我們去年十二月曾在延安開會認真檢討，檢討結果，更證明我們四項諾言確實完全做到了，信守不渝，譬如第一條「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澈底

實現而奮鬥。」來說，我們對民族主義的實現，表現在努力作戰，以及對邊區境內各民族平等地位的尊重上面，我們對民權主義的實行，表現在邊區及前方各根據地民選政府，實行三三制，保障人民言論集會結社身體等一切自由上面，我們實行民生主義，正表現在陝甘寧邊區，努力生產運動，減輕人民的負擔，由前年二十萬担公糧減到今年只徵十六萬擔，我們不把公家負擔，全部壓到老百姓頭上。第二條「取銷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七年來我們堅守不渝，在農民與地主的關係中，我們是一方面保證交租交息，一方面實行減租減息，我們幫助私人工業的發展，並發展合作社，做到公私兼顧，公私兩利。我們也早已實踐了諾言，從無也從未曾想到要推翻國民黨政權的事情。第三條「取銷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求全國政權之統一」這在各前方根據地已經切實在實行民權政治，我們並不會另立中央政府，我們只要求政府承認陝甘寧邊區與前方各民選政府，為它所管轄的地方政府，我們是贊成統一的，中國也必須統一，但統一必須是民主的統一。第四條「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待命出動，擔任作戰前線之責。」我們對此也是實行已久，我們軍隊在前方艱苦作戰的成績就是證明。我們部隊幾年來從未得粒彈一餉之接濟，而仍堅持前方戰爭，擁護國民政府蔣委員長。凡此事實都足以說明我們已經實踐了諾言。張王兩先生曾指責我們立法監察的不獨立，但是我們在司法方面已做到切實保障各階層人民的人權財權和地權等等，我們完全依靠人民來執行彈劾政府，所以我們那邊絕少

貪污瀆職事件發生，雖然，雙方的距離還如此遠，可是本人可以再度聲明，中國共產黨是一貫堅持團結抗戰方針，耐心以期待政府觀點之改變。

敏述談判擱淺經過

指摘渝方歪曲事實

現在，本人再來說明一下，自西安到重慶與張王兩先生談判的經過，自從國民黨十一中全會決議對國共關係採取政治解決方針以後，我們在延安聽到很高興，非常贊成。因為自民國二十九年新四軍事件以後，兩黨關係很僵，我是參政員，也因封鎖而不能出來，我們請軍委會駐延聯絡參謀打電報出來，表明我們願來重慶繼續談判，經政府覆電同意後，本人因負邊區政務，尚需佈置春耕關係，直到四月底才能動身。在西安與張王兩先生一共會談五次，本人初見張王兩先生，主要先請示政府的政治解決，究竟是如何解決？以及向他們報告邊區情形。張王兩先生一再要我提出具體問題來談，我當時提出三月十二日，國父忌辰周恩來同志的演說作談判基礎，張王兩先生不贊成，他們提議先談軍事，及邊區問題，我認為也可以，因先報告了中共領導下軍隊的數目，並問中央可以答應給我們編多少？張先生要我講，我說請先給六個軍十八個師，張王兩先生認為太多，只同意四個軍十二個師，以後會商幾次，到最後一次會面談話，商定將歷次會談雙方意見整理成紀錄，雙方簽字，各報告其中央，由兩黨中央作最後決定，當時我就照我們雙方原先約定的首先在這紀錄上簽字，但張王兩先生未簽，紀錄係綜合雙方意見而成，張王信裏只是我個人意見，

顯然不是事實。到重慶以後，我黨中央即來電報提出二十項意見，由我於五月二十二日交

張王兩先生，請其轉呈國民黨中央，張王兩先生認爲有些條件，這樣提法無非宣佈國民黨罪狀，不肯接受。本人爲尊重張王兩先生意見起見，向我黨中央請示，將二十條改爲十二條，其餘八條改爲口頭要求，由本人於六月五日送交張王兩先生，張王兩先生同時將政府提示案交給我，但對我黨中央提案則不允收轉，一直爭執到六月十五日，才覆信稱，已轉呈政府，但解決辦法仍照政府提示案不能變更，談判遂成僵局。當時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梁寒操先生曾對外國記者發表談話說：談判停頓，中共要覺悟才好。我於七月二日有談話發表在新華日報，表示我黨的態度是只要對於抗戰團結與促進民主有利，我們都可以商量。七月二十六日，梁部長又發表不合事實談話之英文稿，我黨周恩來同志於八月十二日曾發表談話：說明談判無結果，並解釋此事責任並非在我。但我黨中央仍希望談判能有結果，曾來電請張王兩先生赴延安繼續談判。張王兩先生說：此事可以商量。兩黨談判的經過情形大致如此。

### 攻擊渝方政治不良

#### 要求組織聯合政府

最後我應當聲明，中國共產黨很盼望把問題解決，我們所提的意見，都是正確的合理的，希望政府能一切從抗戰民主團結利益出發，接受我們的合理要求。我們中國的抗戰要保持今天的國際光榮地位，要得到永久和平，都不能坐待盟友的奮鬥，需要更靠我們自己

的努力，需要團結與動員全國力量，才足以停止敵人的進攻及準備力量配合盟邦的反攻。我們認為挽救目前軍事危機準備反攻的急救辦法，必須對政府的機構人事政策迅速來一個改弦更張。這幾天參政員諸先生的各項詢問，也正說明了我們政府的機構人事及政策都有很多毛病不能適合今天戰爭的要求。因此我坦白的提出希望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統治的局面，由國民政府召開各黨各派，各作戰部隊，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團體的代表開國事會議，組織各黨派聯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奮全國人心，鼓勵前方士氣，以加強全國團結，集中全國人材，集中全國力量。

## 蔣介石對國共談判之說明

——三十四年三月一日在憲政協進會之演講詞——

各位先生：中國國民黨繼承國父遺志努力國民革命，以實行憲政，完成建國，為最大目標。七七抗戰發生以前，政府原已決定於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國民大會。不意××發動侵略，因此不能不延期召集。但國民黨實施憲政之意願依然日益加強。第六次中央全會仍決於二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召開國民大會。終以戰事擴大當時參政會同人主張緩開，乃又因而延期。於是在前年有憲政實施協進會之設立。本席於本年元旦，復代表政府宣佈：本年內在軍事形勢許可之下，即可召集國民大會，制頒憲法，以符國民黨建立民國，還政於民之宗旨。就中國國民黨既往的歷史觀察，以實行三民主義領導國民自求解放，以

達到國內各民族及國際之自由平等爲目的。辛亥以來，本黨領導國民推翻滿清專制政府，消滅陰謀帝制之袁世凱以及打倒繼袁世凱的一切軍閥，及至民國十七年，中華民國完成統一。最近八年以來，不避任何犧牲，備歷險阻艱難，領導全國抵抗××的侵略。同時並積極準備實施憲政的工作，凡此事實均明示中國國民黨是一個以解放中國，扶植民權爲其歷沿使命的革命政黨。我們要在這一次神聖抗戰中完成一個永久統一的國家。惟有統一的國家，才能順利的推行各種經濟建設的工作，藉以提高我一般辛勞勤苦同胞的生活水準。而且更惟有統一的國家，才能於戰後的新世界中對人類和平福祉而有所貢獻。我們在××開始侵略以前，本是一個完成的統一國家。大家都知道，國民政府是軍民無量數生命鮮血的犧牲所構成的。吾人上對國父與先烈下對後世民族與抗戰軍民，都有不容放棄的責任，在此緊要關頭，中國國民黨已負起了偉大艱難領導全國的責任。所謂還政於民衆，交付責任於全體人民，必須經過國民大會的這個機構，始可有所託付。但在目前狀況之下，亦已準備其他黨派參加政府的組織。在對外抗戰侵略的時候，如果是實在愛國愛民的政黨派，決不會有妨礙軍權的統一，以削弱國家抗戰力量，而幫助了××的侵略。我們在抗戰時期中，更應集中一切力量，驅逐××必須要軍權統一。共產黨不應有獨立的軍隊，這是很明顯的道理。現在共產黨在各國的宣傳說，如果他們的軍隊，一旦歸中央統一，便不覺要被消滅或歧視。而在國外亦不覺有未明事實的人信這種宣傳的鼓吹，甚至誇張共產黨的軍隊力量，皆與事實不符合。有時且與他們所宣傳的幾乎完全相反。國軍現在已有盟國的通力

合作，政府已準備極強大的軍隊與配備，以進行反攻。並配合盟軍共同作戰，以驅逐××於亞洲大陸之外。本席對於共產黨的要求，已會明白答覆。最近政府曾對共黨代表周恩來說，政府準備在行政院內設置戰時政務會議，為行政院決定政策之機關。將使共產黨及其他黨派人士參加。政府並準備組織一個三人委員會辦理整編共產黨軍隊為國軍的一切事宜。三個委員中，一位代表政府，一位代表共產黨，一位代表是美國軍官。如美國政府同意，固然最好，如美國政府不能同意派人，我政府亦必用其他適當方法確保共產黨軍隊整編後的安全，及與刻下國軍享受同等待遇。此外本席還提出一種辦法，即共產黨如對於其軍隊的改編不免有無端的疑慮，則政府願意在抗戰期中，如美政府同意時，可將共產黨軍隊在最高統帥之下，指派一個美國將官，直接統率。不意上面兩種提議，皆已遭受共黨拒絕。所以共產黨如果真心誠意願與國軍及盟軍聯合作戰，政府實已將公允可能的方法坦白誠意的提出了。又有須申述者自從上年十一月中央與共產黨開始會商以來，中央深信各方意見有爭執時，如果為誠意謀取解決，便不應互相攻擊。因此竭力勸告國內輿論，不應有攻擊共產黨的論調。乃不意共產黨即籍此次商談機會，在國內外廣事宣傳。並且對政府及國民黨肆意抨擊。因之國內外人士，亦聽信此祇為共產黨片面之詞。且在雙方會商之時竟造作各種可笑的流言，並說政府已同××洽商和平等語。本席在代表國家人格與地位認為此係誣蔑。凡我國人莫不深明其本人對於其後世繼起者應盡的責任。決不願重睹國家發生內戰。亦必能深悉政府年來委曲求全的事實。隨時與共產黨籌商一個解決。如果共產黨真正

爲國爲民，有團結一致共同抗戰的忠心，而無推到國民政府，破壞抗戰，以謀奪取政權的企圖。對於政府的提議實在沒有不可以接受合理的辦法，以期共產黨與其軍隊均能貢獻能力竭誠效忠國家。本席所以不厭求詳，反覆說明中共問題者，實在因爲中共問題懸而不決，是目前抗戰與統一大隱憂。至實施憲政問題。立將依下列步驟早日實施。

(一) 預定於本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集國民代表大會，通過憲法正式決定公佈

(二) 實施憲政後即可承認共產黨之合法地位，此項宣示仍爲有效

(三) 國民參政會將於近期內舉行第四次會議，此次參政員人數及參政會職權均將較以前增大，政府擬趁此機會，審議國民大會召集辦法，及其他憲政問題

本席對於抗戰的勝利，與吾國民主政治的前途，均甚樂觀。現在一般輿論要求全國軍事與政治統一、及建設日益增強，此種輿論爲全國民心所向，將成偉大澎湃，而不可抑止之力量。深信全國任何團體，任何個人終必遵循這種輿論的要求，共謀抗戰勝利與建設成功，我們憲政實施協進會，負有促進憲政以鞏固國家統一與永久福利之責任，故特爲各位先生鄭重言之。

## 王世杰對國共談判經過之說明

(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外國記者招待會上所作之公開聲明)

半個月以來我是政府代表之一，曾與共產黨代表周恩來先生，在重慶會談。政府方面

會提出若干重要的讓步：（一）承認共產黨爲合法之政黨，（二）承認共產黨在軍事委員會中容納共產黨高級人員，（三）爲構成一種戰時的內閣起見，在行政院內容納共產黨及其他政黨代表，（四）組織一個三個人的聯合委員會，以考慮改組共產黨軍隊及他們的給養問題，在該委員會內，政府與共產黨代表有同等地位，而可能由美軍官任主席。但共產黨認爲不能接受，所以地們拒絕了。共產黨提出召開一個各黨派的會議，政府之所以允許再次召開一個國共代表及各黨各派無黨無派的領袖會議，以考慮國民大會開會以前，關於政治及軍事團結的過渡辦法，就是接受這個提議的一般的意見。周先生已帶了這個提議返延安，徵求他們的黨的意見。

## 周恩來對國共談判經過之說明

（三十四年二月十五日在重慶新華日報發表）

· 國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博士，本星期三日在外國記者招待會上的聲明，是不坦白和不公平的。因爲他只說了在國共談判中政府方面提出的所謂讓步，而並沒有說明在什麼條件或前提下才有這些所謂的讓步。第一國民政府在談判中要求中國共產黨將其所領導的一切軍隊移交於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統轄。即是說移交於國民黨領導，因爲國民政府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第二在談判中國民黨堅持其一黨專政不能結束。由於這二個條件或前提，這一切所謂的讓步，不是落空，便是沒有任何意義，甚至不是讓步，而是束縛或破壞抗戰。

的力量。具體說來第一不把軍隊轉交給國民黨政府便沒有中共的合法。第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委員，從來就不開會，也沒有任何權力。第三在黨治下的行政院內設置所謂戰時內閣，並無最後決定政策之權。第四不取消黨治，和不改變排除異已的軍事政策。三人委員會改編中共軍隊，移交於國民黨政府。而且照打××的成績看來，應該改編的不是中共軍隊，而是國民黨軍隊。說明了這些便懂得我代表中共中央爲什麼拒絕了國民政府整個的提議，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原因是國民政府拒絕了我們關於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聯合統帥部，以統一中國一切軍事力量，以改革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方面政策的建議。我們又曾向國民黨政府，國民黨，中國民主同盟提議將國民政府改組爲民主的聯合政府。施政綱領便須在取得一致同意後方可實行。但國民政府的答案是一種諮詢性質的會議。而會議中預定的主要內容是繼續維持一黨執政，反對民主的聯合政府。因此我必須回延向我黨中央報告。至於我們希望國民政府首先釋放愛國政治犯，取消一切鎮壓人民的法令，停止一切特務活動，撤退一切包圍陝甘寧邊區和進攻八路軍新四軍的軍隊。數月來兩黨談判外，美國大使赫爾斯將軍熱忱相助，不斷努力，吾人在此表示感謝。

# 中共對付國民黨的新策略

一九四四年四月四日至十三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舉行了中共全國各局聯席會議，這一會議的權力，僅次於中共全國代表大會，所以意義極為重要。出席者：東北局貝嫁夫，華北局趙濟民，西北局羅秀松，閩島局趙靜，兩廣局王永銘，華中江浙局彭浩，晉察冀邊區分局王一飛，平西分局朱繼紅，冀魯豫邊區分局向仕，冀東特別區特委李伯泉，太岳區特委平時進，太北區特委王光僅，太南區特委林振延，蘇皖邊區黨委陳時，豫鄂邊區黨委宋季平，閩浙邊區黨委彭空海，南島特局簡平，簡奇，廈門特局洪建定，畢芳英，並有若干中委及各邊區長官參加。茲將會議中決定對付國民黨之新策略全文錄後：

## 對左翼國民黨應付策略之指示議決如下：

中國的智識份子與有產者等階層，在蔣介石的獨裁專橫壓迫之下，均集中於德膜克拉西旗幟之下，本黨所提出號召的民主集中制為他們擁護的，但民主主義的小有產者，極不願意與本黨共同推翻整個社會，尤其是有智識份子與小商人階層，但他們只努力去改變社會現狀使社會與現政府儘可能的適合於他們自身，絕對不想求澈底解決，因此他們首先要要求限制官僚政治實施民主政治，並擬將主要的稅捐加在大地主和資本家的身上，他們更進一步要求藉公共的信用組織和取締重利盤剝的法律，去剷除大資本家，壓迫小資本家，至於

這種信用組織和法律，將使他們不向資本家乞憐，而可以保護農民利益，藉農民之力，在有利之條件之下，而去剷除封建勢力，他們為實現這種要求，需要一種民主政治，需要一種推行憲政，並且需要國會制度，作為爭取官僚所擔任的職務。

小有產的民主主義者，對本黨持一種什麼態度呢？因在目前的局勢下，要推翻蔣介石的統制是力不從心，如以單獨的力量要求蔣介石改善政治，亦等於零，因之他們要與本黨聯合，共同制裁蔣介石，推行民主政治，以貫澈他們的事業，和那要殲滅本黨想獨佔政權的右翼的頑固派反動派沒有兩樣，他們只會運用，不會革命，而且到了民主主義推行至最後階段時，他們是會迅速反動而與本黨為敵的，一九二五至三七年的武漢政府是明顯的例子。但我們的利益和任務，在目前是民主抗戰，在最近的將來是不斷的革命，使一切大資產階級買辦階層，都被驅逐於統制地位之外，使無產階級奪得政權。至少使各種生產力集中於無產者的手中，本黨的任務不是改變私有財產的關係，而是剷除私有財產；不是調和階級的對抗，而是消滅階級；不是改善現政府，而是創造一個適合於全民的新政府。

然而目前的中國民主主義，小有產者在未來的革命中要佔到戰時的優勢，是有絕對的可能性，因此便有三個問題，橫在本黨的面前，一、在現今的獨裁政治下，他們是同樣受着蔣介石及其黨羽的壓迫，本黨應用什麼策略對付。二、在革命鬥爭中他們將佔優勢，本黨用何種策略應付。三、在他們獲得支配地位時，本黨應如何對付。

民主主義者小有產者在目前是到處受壓迫，於是他們是願意與我們聯合握手，力求造

成一種很大的反蔣陣線。本黨所提出的統一陣線是他們隱藏着特別利益，在後如果我們不提出各項要求這樣的聯合是有利於他們，是完全陷本黨於不利地位，永不能放過機會，我們要用堅絕的態度，實現我們的政治綱領，絕不再替左翼投機份子做歌舞隊，應該在他們的黨內外努力形成一種祕密於公開的獨立組織。此項組織必須以本黨幹部直接指導，使每個左翼集團中的各種組織成為本黨的核心，在裏面必須設立強健的團黨，討論我們利益和地位，組織方面的領導人，必須負責使各種核心組織絕不受資產階級的影響，並嚴防國民黨特工的破壞和小有產民主主義者的暗算，在目前的抗日階段中，本黨採取的政策，是用不着特別與各黨的聯絡，因為在××侵略的今日，無論「國民黨」的各黨派對於抗日的直接鬥爭與本黨的利益，一時間是能暫時一致的，所以這樣暫時一致的聯合在將來也許將和現在一樣。今日形成的不過在反蔣鬥爭之中，和鬥爭之後，如有機會，本黨必須立刻提出自己的要求，一切利益保障絕不放鬆，本黨以各種力量集合起來必須強迫政府實現我們的要求，務使新執政權者，不得不儘可能的讓步，不得不儘可能的下種種的期許，是適當的方法，是訂立協定。同時我們必須急急的展開工人組織和農民運動，使小有產者的民主政府，不僅馬上在工農人中，失去立腳點，並且還要受背後佔有全部工農羣衆的各項社團的監督與威嚇，總之從勝利的第一刻起，不信任的態度，不但加於被打倒的黨派，且當加於他們間來的同志，即加於要攫取共同勝利為私有的黨派。

對右翼反動國民黨之策略決議如下：

本黨經過二十年奮鬥與犧牲，無數的同志費盡許多力量，換來完全獨立地位，決不能失去一絲一毫，無論在任何逼迫環境，絕對的堅絕的不能投降為國民黨的附屬品，對於反動的蔣介石要求解散本黨，是一種極大侮辱，本黨全體同志必須用極堅絕的態度，予以拒絕，甚至加以反擊，我們工農階級，必須配上武器加緊組織，用槍砲子彈武裝整個的無產階級，來抵抗蔣介石，和法西斯的要解散本黨的行動，在本黨根據地的遊擊區的軍隊和各種武器，工農軍必須努力獨立組織，限以最短期間成為完全無產階級的保衛軍，佐以本黨自己選任的將領和自由選任的參謀部，不受國民黨權力節制，無論在任何政治口實下，絕對不可拋棄軍器和軍需，對於國民黨團各種壓力，企圖解除武裝毫無遲疑的用武力反抗，使之歸於失敗，消滅國民黨特工對於無產階級的影響，工農普遍的武裝的組織在國民黨統制力尚在強權之下的目前在不得已的有限度的讓步煩難的工作和犧牲的抵抗，這幾種事，在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當前迫臨眉睫的騷亂中，應深切的加以注意，中央局對於執行此項政策，必須得到全體同志一致的通過，方能執行之。中央局須慎重注意本黨的口號為不斷的革命。

對目前局勢下之宣傳綱要通過決議如下：

一、宣傳是一切工作的開端，宣傳是動員民衆最犀利的武器，在目前有重大的變化局勢下本黨的中心任務，是發揮一切力量，爭取正統地位的勝利，因此這個新形勢的宣傳工作，須特別慎重。如宣傳果能發揮其效力，則全民各階層為擁護本黨抗戰民主的政治主張

，作英勇犧牲的運動就可開展，這是打擊國民黨最有效的武器之一。

二、中國有一個光明的前途，就是由本黨領導下，必須戰勝××帝國主義，但由現在達到那個光明前途的期間存在着一段極艱難的路程，爲着本黨的勝利，和中華民族的解放，必須有步驟的有計劃的，同××××反動黑暗頑固的各種惡勢力作戰，而要戰勝的只要不斷的鬥爭，在這新形勢下的共黨每個黨員應該認識自己，加強自己，團結自己盡自己最大的責任爲黨去擴大宣傳，要擴大宣傳必須推動被宣傳者從事宣傳工作，是最有效力之方法之一，要作到民衆宣傳民衆，士兵宣傳士兵，尤其是國民黨教人去宣傳國民黨，爭取國民黨下級幹部，與下級工作人員，爭取偽軍，教育偽軍，採取俘虜教育俘虜，並優待俘虜，都須積極的從宣傳下手，如宣傳得法，不僅可以瓦解國民黨下層組織，並可促進國民黨內部的分化。

三、克服困難戰勝敵人的中心任務是團結，全民族鞏固擴大統一陣線，發動全民族各個階層的一切活動力量，在本黨領導下爭取政治上的合法地位，這是目前對付國民黨唯一無二的方針，要用最大的努力去宣傳，擴大宣傳，對於暗藏在國民黨統一陣線的奸細，外表上以抗日面貌出現，混進統一戰線，企圖破壞本黨各種細胞組織的漢奸和國民黨特工人員，同志們應用特種誇大展開，以民衆宣揚，以真憑實據爲基礎，以具體情況揭露宣傳他們的罪惡，文字與口頭同時并行，對於友黨與大衆人民警告不要上當的各種宣傳，須有政治警覺性，每個黨員對於宣傳方面，在目前要負起重要的責任，揭露與清除奸細，宣傳是

與本黨的擴大組織，鞏固外圍線的國民黨統一戰線不能分離的。

四、關於統一戰線的認識就是兩個以上的階級和黨派之存在為前提，堅持統一戰線宣傳，方能爭取本黨在政治上的合法地位。堅持這個確定的方針，對付國民黨。但同時必須宣傳「保持加入統一戰線中的任何黨派在思想上在政治上，在組織上的獨立性，容許各黨派的獨立存在，」這是為任何黨派所同意，但為重慶國民黨所不能承認的，要宣傳本黨聯民堅持此點。

五、階級鬥爭與民族的關係，在目前抗日戰爭中，必須取得於民族鬥爭的利益，與本黨的要求實現以後，才能推進，但同時在階級社會存在的條件下，階級鬥爭根本否能消滅與否定的，也無法消滅的，對國民黨特工的胡秋源，葉青，張國燾等企圖根本不認階級鬥爭存在的理論宣傳是必須加以痛擊，這是為目前最主要之宣傳，尤其是對於工人與青年學生，本黨為馬列主義者，以馬列主義為中心之組織，絕對不應放棄於勞工階級，毫無政治上與生活上的保證。

六、抗日戰爭不僅是一場被迫而發的民族自衛戰，而是清算多年國恥國難並為中國勞苦大眾求解放的革命戰爭，在這樣戰爭過程中，變化是極大的，而且是多方面的，蘇聯的革命就是一例，要達到這種目的，本黨是要遭遇到千百的挫折痛苦失敗，鉅大的犧牲，是難免的，這樣的犧牲，還是我們取得最後勝利的必要代價，然而單是有絕大的犧牲，還不得保證我們最後戰勝國民黨，因為在現在革命史上我們儘看見的好些國家在反法西斯戰爭

中，支付了可貴的血肉與物質的代價，而到頭還是歸於慘敗，（西班牙就是最顯明的例子）但只要我們貫澈全民的抗戰政策，獲得合法地位，就決不會被敵人戰敗，不過我們的勝利是在一定的基礎上長成起來，而不能僥倖取得的，在本黨的組織下，有廣大的戰鬥羣衆，有正規配備的八路軍與新四軍和各邊區的遊擊軍，有險要的根據地，有光明的革命傳統，有順利的國際環境，所有這些優越條件，全是有利於我們進行持久對國民黨的反抗，如果我們不能很好的配合這些條件，利用這些條件，我們是不能抗擊日本與戰勝國民黨達到預期目的，在另一方面我們還有許多不可否認的弱點與困難，例如軍備武器的窳劣，一旦被國民黨封鎖，生產方面大受威脅。漢奸特工，××奸細的活動，國民黨方面的壓迫，如不能於短期內設法補償仍能削弱我們的戰鬥實力，至少要延遲我們受難的時日，因此怎樣配合和利用我們作戰的優越條件，怎樣補救和除去我們機構中的弱點，以加強作戰的效率，使我們能爭取勝利，這是今天提到全體同志面前必須用宣傳力量去解決的問題，而尤須合理的宣傳才能有效率。

七、在目前形勢之下，一切鬥爭的條件和因素，在戰爭過程中，事實上是隨時突變的，並不是絕對不變的，要是我們不能靈活的充份的利用各種有利的條件，這是客觀的存在條件，不會對戰鬥發揮充份有利作用，甚至他們本來具有的有利於我們的潛能，會給我們不利的鬥爭條件發生出來的消極影響所抵銷，而在另一方面，如我們不能很好的利用，和應付各種鬥爭的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各方的敵人，也未嘗不可以削弱我們的有利條件

，而以全力發揮他們進攻的特點，更破壞我們的抵抗力量，可以很顯然。的各種鬥爭條件和鬥爭因素，在鬥爭過程中是會隨時改變他們的面貌。我們必須估計到各種條件和因素的可能變化性，綜合一切發揮我們的宣傳，造出我們針對的宣傳方法與文字。

中共要求立即實施的政治綱領決議如下：

- 一、限八月一日召集普選的國民大會。
- 二、由國民大會製成憲法，執行憲法。
- 三、抗日軍隊待遇供應須一律平等。
- 四、宣佈全部中華民國爲唯一不可分離的共和國。
- 五、凡年滿十八歲的中國人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漢奸間諜除外。
- 六、工農社團特派代表參加國民會議。
- 七、普遍國民武裝，此項民兵必須訓練使其不成爲消費的武裝部隊，務使此種軍隊所生產的，且多於他們的生活費。
- 八、司法事務不收費用。
- 九、向來加於農民的一切封建的擔負，賦稅徵工，以及什稅等一律取消。
- 十、凡官僚的及其他封建的地產，礦山等等，都宜由國家管理之下，當借助於最新的科學方法，從全體的利益着眼行大規模的經營。
- 十一、以一種國家銀行代替一切私有銀行，其紙幣有一定的發行行市。

十二、一切運輸工具，如汽車汽船和道路等，都由國家管理之。

十三、國家一切官吏的報酬，不分等級，惟有家眷的官吏，需要較沒有家眷的官吏為多，

故薪水也較高。

十四、嚴懲囤積偷運操縱。

十五、推行高度累進稅，取消雜稅。

十六、創辦國家工廠，國家保證一切工人的生存，並且維持一般無工作能力的人的生活。

十七、普遍的免費教育。

中國的被壓迫階級的利益，在以全力推行上列各項方案，因為有使此項方案實現，然後中國將免為少數人掠奪，此等少數人並且更要求鞏固這種壓迫千萬人可以獲得他們的權利，可以取得那引致一切財富所需要的權力。

前項方案，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李富春，劉少奇擬定，經大會劇烈的辯論，費一個上午始通過如上。

# 中國共產黨法規全文

中國共產黨於一九四四年四月四日所舉行的中共全國各局聯席會議中，修正了黨的法規，修正草案由張聞天所執筆。茲錄該法規全文於下：

## 中國共產黨法規

### 第一章 當

第一條 本黨的目的爲殲滅法西斯蒂，消除封建勢力，使無產階級取得統制權，消滅在對抗上的有產階級的社會，創造一種無產階級無私產的新社會。

### 第二條 當員所當具的條件如下：

一、合於這種目的的生活方法和活動。

二、革命的精力與宣傳的熱忱。

三、信仰共產主義。

四、不得加入其他每種反共產主義的政治的或民族的團體，必須參加任何團體

時，由所屬的領導機關通知。

五、服從本黨的各種議決。

六、保守本黨內部一切事件的祕密。

七、被一組一致認可方能爲準備候補黨員。

八、凡不符合此等條件的人當令其出黨。

第三條

一切黨員都平等，都是弟兄，並負有在任何種狀況中互相扶助的任務。

第四條

凡黨員應用黨稱呼。

第五條

本黨組織分爲組團區局中央局和分局。

## 第二章 組

第六條

一組的或立至少有三個黨員，至多爲二十個黨員。

第七條

每組選一個書記和一個組織宣傳書記，指導開會事宜，宣傳與組織事宜，如書記缺席時，由組織代行職權。

第八條

凡收入新黨員，當由書記及介紹人預先取得本組的同意。

第九條

凡各組如不相識，不必互通消息。

第十條

各組應用互相辨別的名稱。

第十一條

凡遷居的黨員，應預先報告本黨書記。

## 第三章 團

第十二條

一團至少包含三組，至多十二組。

第十三條

各組書記及組織宣傳兩組長構成團部，團部從各職員中公選一個書記。團部與

其所屬的各組及所屬的區委互通消息。

**第十四條** 團部爲所屬各組的行政主權「機關」。

**第十五條** 各零星的組或隸屬的業已成立的團或與其他零星的組組織一個新團。

#### 第四章 區委或地區委員會

**第十六條** 一省的各團隸屬於區委之下。

**第十七條** 本黨各省中各團的劃分，以區委的指任，由中央局提出大會取決之，全國各局聯席代表大會，亦有取決權。

**第十八條** 區委爲一省中各團的行政主權，「機關」區委與其所屬的各團及中央局互通消息。

**第十九條** 凡新起的團隸屬於最近的區委。

**第二十條** 區委員有臨時報告出納帳目於中央局最後報告於大會的義務。

#### 第五章 各局

**第二一條** 各省的區委或特區委，均隸屬於局之下。

**第二二條** 本黨各局的設置，以及局書記的委任，由中央局推選，提出大會取決之。

**第二三條** 局爲各省區委及各特區委之領導機關，有權處理管轄下的政治黨務切卡權。

**第二四條** 局有接受中央局各項指示下之義務，直接向代表大會負責。

**第二五條** 局每日須作報告一次，於中央局每年作縣的報告於代表大會。

## 第六章 中央局——即中央執行委員會

**第二六條** 中央局爲全黨的行政主權機關，對於大會負責，並有接受大會各項議決執行之義務。

**第二七條** 中央局委員由十五個黨員組織成立，委員由代表大會選舉之。

**第二八條** 中央局與各區委各局互通消滅，中央局於三個月中，對全黨情形作報告一次。

**第二九條** 中央局有權整理黨務決定路線與策略。

**第三十條** 中央局有權指揮本黨各路軍隊及各種武裝團體及工聯會。

**第三一條** 中央局有權頒布緊急法令處理一切臨時發生之緊急事件，但事後須報告代表大會追認。

### 第七章 公共規條

**第三二條** 組團區至少每星期開會一次，局和中央局至少每兩星期開會一次。

**第三三條** 區局及中央局的職員，由選舉產生，以一年爲限，但可連選連任，並可由選舉人隨時撤回之。

**第三四條** 選舉於每年四月舉行之。

**第三五條**

團部須根據本黨的目的，指導各組的討論工作之推行，中央局如認某些問題的討論是普遍的和直接的利益，當令全黨對同一問題，加以討論。

**第三六條**

各黨員個人至少須於每四星期內與其所隸屬的團部通信一次，各組至少須於十

天內與其所屬的團部通信一次。

**第三七條** 各團至少於一星期內，將其所屬區域情形，報告區委，區委至少於兩星期內，將其所屬區域情形報告局和中央局。

**第三八條** 凡本黨各機關於本法規範圍內，在其負責，並即刻通知上級機關的條件之下，負有企圖謀本黨安全的有力活動的手段之義務。

## 第八章 大會

**第三九條** 大會為全黨立法的主權機關，凡一切修正法規的提議，由中央局提交大會通過。

**第四十條** 每團派送一代表。

**第四一條** 每一個單獨團中黨員在三十人以下者，派送一代表，在六十人以下者，派送兩

代表，或派送三代表，餘此類推，各團可以令不屬於其他的黨員代表預會。

**第四二條** 大會定於每年八月一日開會。當緊急時中央局得召集全國聯席會議，隨時處理之。

**第四三條** 中央局執行委員得出席於大會，但無表決權。

**第四四條** 大會於每次會議後，除報告外，以本黨名義發表一種宣言。

**第四五條** 大會有清算過去路線，決定未來策略之指導權。

## 第九章 黨規的違犯

## 第六四條

凡違犯黨員條件——第三條——當按照情節輕重或留黨查看，或驅逐出黨，即

不得復行入黨。

## 第七四條

祇有大會或全國各局聯席非常會議，才能議決驅逐出黨事件。

團和單獨的組，在即刻通知高級機關的條件之下，可以將各黨員留黨查看，此事最後取決於大會。

## 第九四條

對於留黨查看之黨員，復行收入須由團局提出請求。

## 第十條

團部能判處違反本黨員的罪行，稚且擔任執行判決。

## 第五五條

對於留黨查看或驅逐出黨的個人以及可疑的人，為本黨利益計，須加以監視，並通知當地切卡，使其不敢危害本黨，對於此等人的行動，須即刻報告所在地的各組。

## 第十章 畫費

## 第五三條

大會對於各局規定一種最小限度的黨費，這是每個黨員必須繳納的。

## 第五四條

這些黨費的半數，送交中央局，其他半數歸入團或組的會計處。

中央局的款項用途如下：

一、充通訊或管理之用。

二、充印刷和散佈宣傳品之用。

三、充中央局因一定目的而派送使者之用。

**第五五條 地方機關款項的用途如下：**

一、充通信費之用。

二、充印刷或散佈宣傳品之用。

三、充派遣使者之用。

**第五六條**

凡組與團不向中央局繳納捐款至六個月，中央局得將其負責任者留黨察看。

**第五七條**

各團對於其所屬各組會計處出納帳目，至多每三個月須報告一次，中央局須將管理黨費及黨中會計處收支帳目，提交大會，凡侵吞黨費之事，當予最嚴厲的處分。

**第五八條**

非常費用及大會費用，和聯席非常會議費用，由地方稅收項下捐助彌補。

**第十一章 當黨員的收入**

**第五九條**

組書記將第一條至五十八條，當著入黨的人宣讀一遍，加以說明，並以簡單的話，特別鄭重聲明入黨者應負的義務，然後向他說道「你是不是願意加入本黨」，他如答應願意，書記即認其言為誠實可靠，願意履行一個黨員的義務，宣佈其為本黨候補黨員，在必要時，令其加入各項組會。

上列法規，由大會通過後，交中央執行委員會提交下次全國代表大會討論，決議後始正式頒行。



# 最近的中共與蘇聯

隨着戰爭的進展，中共的動態日益活躍起來了。她一方面利用美國在某些條件下對戰爭的利害一致的關係，進行着爭取美國的物資援助和政治同情的活動，一方面抓住了重慶政府軍事上政治上的弱點，展開政治鬥爭，要求改組重慶政府和統帥部，進而謀達到她一貫的政治企圖——取得中國革命的領導權。這些活動，在過去一年間，已為舉世所週知了。

由於中共日益活躍，我們自然會聯想到中共和她「過去的」支持者蘇聯之間的關係，近來有什麼新的發展。這是每一個研究中國時局問題者所亟想知道的。

蘇聯對於中共活動，一向是抱着不露聲色的作風的。

去年間，日軍發動中國大陸作戰，烽火蔓延到重慶的西南大後方時，抗戰陣營的軍事危機，達到頂點。中共為了乘機打擊渝方，便高唱這種危機是重慶國民黨實行反共，反民主政策的必然後果，而對重慶展開有力的政治攻勢，藉以引起英美對本身的好感。

就在這個時候，蘇聯也一變過去緘默的態度，公開發表袒護中共的言論。

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蘇聯政府機關報，「蘇聯消息報」評論稱：「中國國內政治形勢的緊張程度，並沒有因為日本軍隊新的進攻而消除，產生中國今日危急形勢的主要原因

，是由於中國反動份子（指重慶政府中的反共份子，包括蔣介石在內）不能加強全國的團結與民主化，而相反的，實行分裂民族力量的政策所致。要知道中國共產黨領導着的五十餘萬正規軍與兩百餘萬人民游擊隊，是國家的偉大政治力量，不能忽視的。重慶政府要結束目前的戰事，首先需要改變已往錯誤的政策，而與共產黨成立協調——這一段評論，不用說，當然是極力支持中共的。

今年一月，當中共代表周恩來在重慶與渝方繼續進行調整國共關係的政治談判之際，駐在延安的蘇聯軍事代表哥拉夫斯托爾木上校，經中共當局授意，以蘇聯政府的立場，對國共問題發表觀感說：

「最近國共雙方之間，雖有美國從中斡旋，但以重慶政府毫無誠意與中共合作，裂隙依然存在。重慶首腦部堅持排除異黨，不願改變中國的局面，實為最大的失策。我們相信，延安共產黨統轄的大批游擊隊和八路軍，在目前，是一種非常的主力。假如重慶當局能與之合作，彼此團結，則中國庶可擔當聯合國家的一翼而無愧。……」

這些，蘇聯響應中共的對渝政治攻勢，而發出的種種言論，我們在上述片斷中，已可知其一斑了。

中共與蘇聯呼應活動的另一幕，傳聞中的是中共要求外蒙古支援八路軍的一回事情。

外蒙古自從以蘇聯做背景，成立了所謂「人民共和國」以後，儼然是一個特殊的政治區域。到現在，外蒙古也有了相當的武裝力量。有十幾個步兵軍團，有裝備新式的騎兵和

砲兵，有空軍和機械化部隊，成爲蘇聯遠東有力的前衛。這支外蒙軍，東面和滿洲日軍對峙，南面控制着內蒙和華北區。牠的存在，就中國立場說，也是北部邊疆隨時掛慮的事。

去年春天，中共中央決定了新的策略與路線後，曾要求莫斯科當局，指示外蒙軍事首腦，集中兵力於邊境，支援八路軍的活動。當時，蘇聯政府因爲遠東國際政治情形的複雜，僅在原則上表示接受而已。

今年一月，中共曾派遣中央執委秦邦憲，張聞天爲代表，張仲實，徐懋庸爲祕書，赴莫斯科，晤史太林，曾再度提出外蒙軍支援八路軍活動的問題，結果，中共代表經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的介紹，與外蒙政府駐蘇代表畢達罕謨軒等會談，交換了雙方的意見。據說，外蒙古軍隊，近來已進駐甘肅，寧夏，綏遠，察哈爾邊境。外蒙東部邊境一帶，也發現了增防的情形。

自一九四三年六月十日共產國際（第三國際）執委主席團宣佈解散共產國際以後，中共與蘇聯的基本關係，雖然沒有變化，但是中國共產黨的走向民族化的道路，是很顯然的。黨內以陳紹禹爲中心的國際派，開始失勢，毛澤東爲首的國內派的集權運動，漸漸獲得了成功。

毛澤東路線的鞏固，在中共與蘇聯的關係上說，不能說是全無意義的。因爲以毛澤東思想爲代表的共產主義，是馬列主義和中國現實社會結合的結果，其目的在使中共成爲一個中國化的政黨。她根據中國特殊的社會條件，訂定自己的黨綱。並且，在最近的幾年中

，中共中央努力實行著整頓三風——黨風，文風，學風——的工作；毛澤東強力地號召著糾正黨內思想上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對於馬列主義辨證法唯物史觀的公式主義以及教條主義等觀點，使中共黨內極端的國際主義思想，概行肅清。這是最近毛澤東在理論上強調布爾雪維克中國化的結果。

所以，中共與蘇聯，在政治理念上雖是一體的，而因目前鬥爭對象的各別，不能採取全面的聯合行動，乃是必然的趨勢。偶然在對渝的鬥爭中，蘇聯在輿論上的袒護中共，是現階段蘇聯對中共唯一的聲援而已。

因此毛澤東也再三提出「自力更生」的口號，他把中共的政治前途，主要地寄託在中共領導下的中國人民身上，這更可以說明中共在求援於蘇聯未得實際援助而感失望之後，對外力援助（連蘇聯在內）是抱著怎樣的態度了。

# 赤都點滴

中共陝甘寧邊區政府轄境，以延安為中心，包括附近之三十縣和一市，擁有人口二百七十萬。行政制度標新立異，人物言動詭譎神祕，割據一隅，自成系統，開歷史上未有之創例。以地勢偏僻，又遭重慶重兵封鎖，其真相遂不易為我人所詳悉。日本中共研究專家波多野乾一目之為「祕密之國」，並斥之為「赤色之梁山泊」，不為無因。

## 日本通的邊區主席林祖涵

中共邊區政府主席林祖涵，日人波多野乾一比之為梁山泊上的朱仝，因為林氏有着一百美髯，所以稱之為「美髯公」。這是以貌賦名，無他含義的。實際上，林氏的地位，較之梁山泊的朱仝重要萬倍，擬之盧俊義，地位尙屬相稱，不過他是一個文人吧了，在中共方面，能與毛澤東並駕齊驅的，僅他一人，林氏今年六十三歲，湖南零陵縣人，常德師範學校畢業。留學日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時加入中國同盟會。返國後，在吉林以小學教員為掩護，從事祕密工作。一九〇九年，返湖南參加革命運動，失敗後，逃亡日本，嗣出任程潛之祕書長。一九二〇年，在上海加入共產黨。一九二二年至二三年，任總理幕僚。一九二四年，任國民黨候補中委。總理逝世後，任農民部長。北伐時代，為第六軍程潛軍

部之黨代表。清共前，擔任武漢軍委會祕書長。南昌暴動失敗，留學莫斯科。一九三二年返國，在江西赤區擔任財政人民委員。遷往西北後，始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邊區政府主席，財政廳長，邊區銀行行長等要職，奠定今日在中共之地位。林氏操日語及俄語，均甚流利，固一中共之日本通也。

去年國共談判，林氏代表中共參加，往來重慶，西安，與延安三地。中間曾一度在西安被扣，不久獲釋。以林氏之高年重望，竟遭重慶軟禁，其焦急怨忿，想不下於伍員昭過關，其滿腮<sup>美髯</sup>，今日必已由黑轉白，直可稱之為「銀髯公」矣。

### 名不副實的三三制參議會

中共現在標榜的是「新民主主義」。一九四一年中共西北局頒布的五一施政綱領裏，又有所謂「三三制」。就是各級參議會及政府的選舉制度，中共黨員只佔三分之一，其他人員佔三分之二。中共中央當時指出，延安邊區參議會，有常駐議員九人，內中共黨員三人，政府委員十八人，內中共黨員六人，其他地區，中共佔百分之三七·二，國民黨佔百分之二七·四，無黨派者佔百分之三五·四。但考其實際，邊區參議會長高崗，曾公開發表，邊區參議會參議員共黨實際佔二分之一。又稱，邊區內沒有國民黨組織。則中共所指有國民黨籍之參議員，自屬不確了。似此，政府人員的選舉，亦為中共所把持，「新民主」「三三制」之設施，恐怕是名不副實的吧！

## 整齊劃一的「生產」計劃

八路軍第二二〇師三五九旅，是中共的標準隊伍。經常以馬克斯主義，唯物辨證法，及唯物史觀教育士兵，但所得效果，是怪可憐的，士兵逃亡很多。有一次，給抓回來幾個，上級追問開小差的原因，逃兵說，我們當兵多年，還沒有老婆；另一個原因，病了沒有好好照料。中共軍事首腦朱德，立即下令，官兵准接家屬同居，並且有結婚的同等機會。於是三五九旅的官兵，接的接，結的結，都有一個老婆在身邊了。他們家屬的住所是窯洞，一排有八九個，每一窯洞住二三個婦女，而且每個婦女都有了一個孩子。於是國民黨方面，就譏笑中共，稱為「整齊劃一」的「生產」計劃。

## 言行不一的民主自由

中共標榜着「民主」和「自由」，但他們在整風演講中說「共產黨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根本就是要集中限制下實行民主自由。最近中共更進一步，發出了反對自由主義之論調。有王實味者，發表一篇「野百合花」，因為內容充滿自由思想，即為中共批判和清算。於是，延安文化人，自心靈以至面部的神經，都變得麻木了。一句話不對，立刻犯禁，而被批判和清算。此外，著名文人蕭軍，在延安文化座談會上，說了一句「延安缺乏社會生活」，即為解放日報罵得體無完膚。所以延安地區的民主自由，是掛在嘴上，寫

在標語上，發現在會場上，躲藏在中共的保險庫裏的。

## 別開生面的集團祝壽

毛澤東，朱德，董必武，林祖涵，吳玉章，徐特立，以及火俠，馬夫，工人，農民等年老的一羣，在延安是被稱爲老頭子的。據說，這種年紀的中共工作員，共有五十六個，而且其中三分之二，是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

去年中共爲了對那些年老的工作員表示「敬意」起見，主辦了一次集體的祝壽大會。舉行的那天，會場正中掛着魯迅藝術學院送的「萬壽無疆」的大扁額，四週掛滿了各團體各機關送的壽燈，壽帳，賀聯，賀詞等。此外，在主席台上，還有兩大盤壽糕，是延安婦女會和少先團送的禮物。當這五十六個壽翁入場的時候，並還有延安民衆組織的古樂隊伴送，這真是別開生面的祝壽大會。

這五十六個壽翁的年齡，總計三千一百六十四歲，平均每人五十六歲半。

## 祕密建設的赤色空軍

中共被困江西時，僅有十幾萬裝備落伍和營養不足的士兵。及二萬五千里流亡之後，接着發生西安事變，使中共有了一個喘息機會。十年來，生聚教養，士兵素質，已日漸提高。最近更因美國援助，一部分裝備，亦日漸現代化。他們目前最感缺乏的，是空軍。所

以建設空軍，是現在延安中共的主要課題。去年六月，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了航空委員會，並決定了建設赤色空軍的具體計劃。一方面利用最近華盛頓與延安的親善關係，向美國取得一部份物資，並派遣青年幹部赴國外學習航空技術。據傳，延安已有完備的飛機場兩處。也有人說，延安已設立空軍訓練班，有學生二百名至三百名。還有人說，延安正在外國訂購飛行機。這些是否事實，還無法證實，但中共正努力在建設空軍，是可斷言的。

### 流連忘返的「國際勞協」代表團

「國際勞工援助協會」代表團一行十五人，在蘇聯人里仁琴積叔率領下，於去年八月底左右，由莫斯科啓程，到延安去訪問。這個「國際勞工援助協會」，就是在第三國際解散後，在莫斯科新成立的國際勞工互助團體。據說，這一羣代表們，到目前為止，仍流連在延安。他們的任務是：（一）援助中共解決生產事業的技術方面，人才方面，經濟方面的困難。（二）協助中共籌募救濟事業的經費。

### 着重理論的教育方針

延安地區的教育方針，和中國其他各地有着顯著的差別。「有了理論始有行動」，是中共的一貫主張，因此，中共領導下的延安教育，具有一個特徵——特別注重「革命」理論，及理論與工作的相互配合。

在那裏，最著名而且重要的學校，有「抗日軍政大學」，「魯迅藝術學院」，「陝西女子大學」，「陝北公學」等。在他們的那種教育制度下，一切學校，都是中共幹部的製造所。其中首推「抗大」，爲中共軍事和政治幹部的發源地。「抗大」，雖在中共根據地都有分校，延安總校，却是比較最完備的。在中共方面說來，也是除了「黨校」之外的唯一軍事政治幹部教育機關。它的組織，是在校長下設教育長；教育長下分設政治，訓練，校務三部；政治部下分設黨務，指導，中共室管理三課；訓練部下分設編輯，設計，管理三課，校務部下亦分設會計，印刷，事務三課。現在，校長是林彪，教育長是羅瑞卿。學生男女都有，而從性別，興趣，學程，分別編隊，一律過着軍隊生活，「魯藝」和「抗大」的教育方面差不多。兩校，除一般軍事術科的訓練及本科專門學識外，都以辯證法，唯物論以及中共諸首腦編纂的理論書籍爲主要課程。「陝西女大」，是延安唯一的女子高級學府，但課程却與上海或其他地區的大學不同，而以「中國革命史」，「中國革命問題」，「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問題」，「三民主義」，「中國婦女問題」等爲理論方面的必修科目，此外，也有簿記，會計，速記，新聞記者，音樂，圖畫，演劇，文學，英文，日文，俄文等技術方面的科目。「陝北公學」的學科的內容，在理論必修科方面，和「陝西女大」大同小異；但實際上，「陝北公學」近乎是「抗大」的預備學校，因爲它的修業期限僅有一年，而畢業後，學生大多是入「抗大」的。

## 自由公開的戀愛結婚

延安青年們的結婚儀式，農民仍沿舊式結婚儀式，但是，一般知識青年及在中共下的青年男女黨員或非黨員們，他們的結婚儀式大多是很簡單的，祇要到當地政府登記，請求許可就行了。在結婚前，大多「差不多是全部」是經過了一段或長或短的戀愛階段。

戀愛，在延安是極端的公開而且自由的事。那裏沒有可以阻止青年男女自由戀愛的家庭，即使有，中共的「政府」，是會支持青年男女而攻擊他們認為頑固的「封建行動」的。

但延安「政府」，對青年男女的結合，也是有限制的。其條件是：第一，男女雙方必須是政治目的的一致的。第二，男女雙方必須是相愛的。第三，結合後對工作無障礙的。

## 走出廚房的中性婦女

婦女們在延安，和男子一樣，十八歲以上的，都有政治上選舉與被選舉權，而且和男子一樣地參加各部門工作，甚至參加軍隊工作。

婦女們一投身在團體生活中，就不願再回進廚房了。記得有一個日本作家，名叫藏士延次，把延安婦女稱為「中性化」的人。

延安婦女工作，和其他中共根據地的婦女工作一樣，在中共婦女部長蔣暢女士的領導

下，異常活躍。成立於一九三七年的「延安婦女工作幹部團」，現由瞿秋白夫人楊之華女士領導，更是該地區婦女羣衆的唯一核心組織。他們現在正積極的從事着戰時生產工作。

在中共各級行政機關中，在參議會中，婦女都佔有相當地位。那些婦女們，亦並不因自身是女子而顯出和男子不同的異樣情態來。一般人也沒有用另一種眼光看待她們。

延安各級層的婦女團體，對中共方面的貢獻，除了政治工作外，織布，製衣，做鞋，去慰勞他們軍隊的工作，倒是一件抹不去的功績。

# 延安的窮途

本年（民國三十四年）一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在上海出版的「新中國報」上，連續發表了日人田尾五太郎所著「延安的窮途」一文，對於延安的整個前途及其出路，根據思想理論及中國與國際現勢的立場，作了一番極詳盡與深刻的批判，內容十分精闢，頗多獨到的見解。茲轉錄全文於下：

## 一 延安與美通好的內幕

大東亞戰爭的決戰行程，隨着時序的更迭，一年又一年地突入了高度酷烈的階段，在現在快將達到戰爭總決算的時期了。在這中間我們又可看到在東亞的事態中，太平洋和大陸兩戰線共同呈現了一種極度的變異與消長，特別自去年九月以後，伴着歐洲戰線的展開，美國對大陸的進攻即產生一種特殊的發展，跟着這種情勢的推移，其中最為顯著變化的現象，即為企圖取重慶而代之的延安立場，驀然乘此機遇擴大其勢力，隨着今後大陸戰線的進展，其動向殊有發為最足注目的新事態之可能。

與重慶問題並存的，甚或足以左右中國之命運的延安問題，由於最近兩黨勢力比重的逆轉，使我們在這一趨勢中，得以推想到其今後發展的傾向，直接對大東亞戰爭的前途，

將與有何等重大的影響？同時對中國重建事業勉爲其難的日本之道義政策，它亦盡了若干警覺和啓示的作用。

作為今日延安當面之中心課題的，乃爲延安與美國通好之事實，這一個事實，將來反映於延安內面的影響，以及在中國全面所投下的波紋之結果，尤其從這一情勢所派生出來的國共交惡與傾軋的深刻化，以上這種種情節業已表現於西安會議中，即就重慶最近的改組問題言，亦莫不與此脈絡相通，而愈益增加了複雜的性質。隨着這種糾紛的加深，重慶與延安自將各在其立場上產生種種變異，這是我們可以預想得到的事，處於這一世界激動的時期中，延安實體的變質，方向的轉變，及其勢力的消長等等，這一連串的問題，告訴我們有對此加以一番新的研究的必要。

這在初初一看之下，似乎表示了延安未來勢力的猛晉，可是在實際上，視思想爲生命的延安，不堪時代的艱難，使我們意想得到判決其「思想能力」的貧困與破綻的時運即將到來，我們敢確定地說，這對於延安是一種空前的危機，同時這也暗示了我們建設亞細亞思想路線的新事業終將委於誰人之手。

一九三四年十月，因迫於蔣介石中央軍的圍剿，不得不離開了他們老巢瑞金的中共，經過著名的所謂長征二萬五千里的大苦難，最後總算完成了它們那種西遷的大事業，自此以後，在陝西延安奠定了根基，迄今凡十二年，中共自誕生到現在，從頭算起，爲時不過二十餘年。在這短短的歷史中，這一新興勢力在今日竟能作爲一個急進的民族黨而橫行闊

步，洶至與重慶正面爲敵，堂堂地演成一齣中國領導權的爭奪戰，像中共這樣迥異於常例的成長過程，在近代世界政治史上實構成了一大偉觀。遽某一著名中共研究家稱，在中國事變以後，如把中共獲得的力量與重慶對比作成了一個測定，則前者之擴大較過去舊勢力時幾達二十倍程度，可是後者反較以前減少四分之一。當然這一推斷，主要是根據中共地盤的擴大情況而言的，亦即所謂係運用了一種比喻上之表現的，固然這一勢力關係在數量上的正確與否可暫置勿論，總之延安蠶食重慶的勢力，不絕地向和平區域進攻，逐年在質量雙方面伸張其力量，對於這一明白的事實無論如何是不能否定的。

甚至有人根據了這一種趨勢，去展望延安今後的發展，在這類人中，他們有認爲中國最後終將是延安的天下，尤其此次延安與美國的通好，使延安凌駕重慶成爲中國之支配者的距離已大爲縮短，也有人認爲，若延安與蘇聯在戰後的民族復舊力相結合，以此爲後盾，使中共取得了世界性的存在，進而將以其威令伸張於亞洲的新有土地。

現在我們對於重慶的將來問題，且暫置一旁不提，就以剛纔這樣祇用一種光明的眼光去觀察延安的，試問這種觀察究竟是否正確的呢？不錯，延安乘此次時會有其多方面的發展，這一點固然是任何人都已承認了的，然而問題却在於是否卽能以此斷定延安已具有無限的將來？

那麼延安與美國的通好，是否就是說明延安的勝利呢？我們以爲延安無論它怎樣在現象上呈露一種雄大的多希望的外觀，但卽欲以此作爲推定延安未來命運的根據，則顯然不

可，我們必須進一步地深入到延安內面的動態中去，非探究它一下本體及其動向不可。

照我們的觀察是這樣的：延安在今日毋寧說已達到了它勢力發展的界限，換一句話說它已經越過了發展的頂峯，所以延安與美國結合的本意，其動機因產生於現實的戰略的觀點，然而其根本的企圖，則無非因本身的前進已至盡頭，遂採取「轉變方向」的方法，急切以圖自拔罷了。延安的智慧是顯而易見的，把其本身的力量直接溶合於現實的事態中以民族爲犧牲企圖奪取一條作爲苟延生命的窮途的血路落荒而走，因此在這一「轉變方向」之中，實際上早已顯示了延安破綻的開始。

延安與美國的通好，爲去年春以來的懸案，延安曾遣密使赴華盛頓，亦曾恭迎過羅斯福特派的密使，又曾互相交換軍事使節團，開始接受美國所援助的武器軍火，並擬提供美國對日的航空根據地，諸如此類的情報，曾不絕傳來，其中也有是眞的事實，自然也難免有謠言與謀略攬雜其間，不過橫斷了大陸戰線的緊迫的情勢，延安和美國的通好，與時俱進地深刻而擴大的必然性，則爲確然而顯明的事實。

這一事實，在現階段中，係基於雙方一致的要求，固不待言，不過在這裏有一件事值得注意，即一向與重慶無嫌隙的美國，在最近短時期中，爲什麼忽然會改變方向而與延安握手言歡起來了呢？這一件不類普通的事實，究竟包含着一些什麼意義呢？這一意義正是今日研究延安問題的核心。

蓋自美國在歐洲東亞兩戰線漸形有利的時候，作爲美國之宿願的置中國於全面殖民地

化的工作，今已開始以其新的侵略方式出現於中國了。美國今已在中國各衝要地帶，佈置妥了作戰的據點，在軍事上它早已有了把握與自信，因此現在美國的心目中可說已無重慶的存在，假如說今日重慶的抗戰力仍有其不可侮的戰力的話，那麼重慶至多也不過作為美國民主主義之附庸罷了。

重慶要是軍事上繼續和美國保持不可分的關係的話，則不久美國即將實行開發中國內地的經濟，更運用侵略經濟的術策以及於中國的全土，這樣重慶即欲不屈服亦不可能了。多年來一向在美國民主主義羈縛下幾已形成僵化的重慶，它的內在本身實早已包藏着為美國所控制的宿命的種子。因此在今日成為美國所該處置的對象，不是重慶而為延安，其理由固在於此，且其時又恰當美國在對日大陸進攻的戰野上連續敗退之際，於是即企圖把自民族戰線以來，繼續從事於抗日作戰的延安誘入大陸作戰的圈套中，以賺取延安的協力，一方面可以作為當面對日軍事力量之一助，他方面則極力利誘延安，俾能使形成中國殖民地化的操縱計劃，得以直行無阻，在這過程中，也令延安逐漸變成與重慶同樣的命運，最後則無非企圖把中國全部作為美帝國主義行施世界政策的一個殖民的據點而已。

考美國對華的這一個新方略，彼之所以然者，實因美國估計重慶的鼎足輕重，發覺未來利用價值最高者乃為延安的結果，而延安方面亦一如前述，因鑒於當面無以掩飾的弱點，以及未來為保持其本身存在的必要起見，故兩者通好的因緣，便不期而然地發生了。故美國利用延安的這一方式，雖在以延安轉變方向為內容的情形之下，乍看對延安似

並無若何惡意，且在這一過程中延安並能取得美國若干物質上的幫助，然而美國對延安的好條件，總將不出於利用延安所必要的範圍，這是無可疑義的。

本來反美性亦為延安自誕生以來的一種思想的骨幹，可是在目前延安沿着物質追求的路線遂有此項利用美國的表現，企圖乘機以伸張它的勢力，這情勢的推展，固然係基於自然成熟的環境，可是延安伺機而發的敏速行動，確為一種名不虛傳的發揚了家傳的祕奧戰術。不過不可忽視的延安，將因此而在思想上，軍事上，胚生一種絕大的危機，延安果能超脫這種危機與否，即為我們正視延安窮途的一個焦點。

延安所以不能不作「轉變方向」之舉者，其根本的要因，乃在於以今日世界之變革過程為主要要素的中國社會之全面的劇變，要具體地說明這一點，其原因有二，這二個原因係基於內外互相關聯之事態上的。

第二個要因是什麼呢？其一即為延安固有思想的貧困。其二則為在中國事變八年來的苦悶中，中華民族的本身已嶄新地產生一種有史以來的「思想的批判能力」，延安之受此項歷史的審判於此乃成必然。

下面所要檢討的，便是這一點。

## 一 延安思想之貧困

如以延安之思想能力為言，延安思想的本質過去向被認為和蘇聯同樣是以共產理論為

內容的，這種解釋似已成爲多年來的迷信，同時在一般的常識上似乎也對延安作過大的評價。然而實際上延安的思想決沒有如成爲蘇聯保姆之列寧主義那麼似的強韌和精緻，其思想的內容有的祇是單純與素樸，而無獨自的體系，毋寧說延安思想是僅把共產文獻巧妙地加以一下縫合製裁，而在急切中趕造出來的一種中共實用的思想。因此延安所臚列的主義主張，在外形上似乎也顯得和蘇聯有着同樣堂堂的風格，可是按其實際二祇是原原本本地借用了馬克思和列寧爲建設西洋社會主義國家所遺留下來的理論以及實踐綱領罷了。當其發生之初，野生似地成長起來的中共指導者們，就先天的思想言，他們是遠在列寧和孫中山先生之下的，唯其因爲欠缺這一精深的理論的結果，他們的頭腦除了一味模倣他人之外，便無法可想。要對以上這一點求其更深刻的理解，我們非把延安思想之成立過程予以一番檢視不可。

### 延安之思想自發生以來，其歷程凡三：

- 一、在初期中一方面抄由莫斯科輸入之列甯思想的舊路，他方面則借用了共產主義之赤化世界政策的要領。
- 二、以獨自的解釋說明三民主義的內容，摻合列寧主義使構成中共的民主主義，並自名爲新民主主義。
- 三、把對日抗戰理論與新民主主義相結合，於此顯示了中共思想的飛躍性。  
在這裏東方道義政治的觀念也與此相結合而並用着，同時以農業構成民族經濟的本體

，把商工業作附隨物的社會觀和經濟觀也在這裏有效地活用着。另一方面延安將其武力基礎建築於民衆身上，堅持民衆日常生活與武力打成一片的軍事思想。但總之這一切都是外爲前述素樸的中共民主主義思想的表現。

延安勢力以這樣野生的幼稚的思想爲指標，在既往二十年中其一切的施策與行動是概不離這一思想之範疇的。

無論經過怎樣長久的時期，可是並非由難手躬自培植起來的一種借物式的思想，它決無成爲高級而深邃思想之可能。莫斯科思想之根基是貫徹了馬克斯學說而後才獨創成爲有機性的列寧主義的，而延安借來這列寧主義之後，在現實狀況下迫於世俗情勢的催逼，因此馬克斯主義本身的痕跡在延安思想中僅有氣味濃淡的分別，却無多大根本的變革。

所以延安思想的本質，實際上與重慶之民主主義國家思想並無大差，縱然延安僭稱中共口中誇張準備把中國的國家機構改造得和蘇聯一模一樣，可是其思想的根基如無東方社會之實體作爲理論基礎的高遠的理想性之構想，那麼延安總將不能成爲可以民族的命運一手相託的有權力的延安。

梁漱溟在其鄉村建設中說，中共勢力的最後界限必不能脫離中國道義社會的本質，而中國社會殊無容納唯物共產思想之餘地，因此中共勢力之伸展自有其行不通的境界。是的這一點正是中共不能踰越的一道防壁。並且根本地說，中共思想的本身狹隘而又低調，它缺乏足以指導中國文化民族之廣汎的社會層的力量。

不過延安過去能抓住民心的理由究竟何在呢？

原來它蟠居於陝西貧瘠之區，銳意研究邊區的戰略戰術，它既不能突破這一個封鎖的環境，於是多年來維護謀求於暴政下的農村社會的忠誠，以及在中日事變後，乘中國空前之大難而坐守漁翁之利，由於這種種消極的外來的條件，才得以日益擴張其活動的地盤。古時日本木曾義仲的悲劇，是在他回到京都以後產生的，如果木曾義仲仍在農村的話，他的小天下便决不至喪失，可是他不此之圖，最後終於給都市文化所淹死了。最近我們看到延安也在頻頻企圖向沿海岸線及都市方面推廣其活動的範圍。

在這裏實已表示了延安思想的貧困，它昧於歷史之必然性，正在迷迷糊糊地踏上衰敗的道途。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延安在今日以前，它之所以能運用其有力的思想以達到不斷發展的，決不是由於其思想本身的深刻性及偉大性，而是由於能以其素樸的思想和現實的行動相結合的關係。他們在思想上主張尊重道義的行動，於是隨之的即為上下一貫以道義化的現實行動表示其實踐躬行的態度，或計劃以他們現實的行動與現實的事態相結合，這種種作風他都視為鐵則的。又如當地如有土豪劣紳之存在，他們便直截了當地加以制裁，雖有妥協與利用的可能，亦不輕易為之。把這種現實的事態，確保並堅持和思想行動的一貫性，這是延安政權自誕生以來二十餘年中的特色。

這一點無可諱言地確屬延安較勝一籌的地方，尤其在中國這般自然社會中，對於生活

於自由狀態的中國民族，延安的作風實在是一種最獨創的方法。中共能以其窳陋的思想，在現代中國散佈新時代的氣息，並以之凌駕重慶政權的原因，其理由僅有一個，那便是它能把思想同實踐有機性地組織起來的優點，才使其得有此種成就的。如果要在延安思想中探求列甯的性格，也許便祇有這一點罷。

現在我們要更進一步地探討延安思想的貧困是在如何形態與經過下暴露出來。

首先值得提出來的，該是黨幹部的思想尖銳性之喪失這一點了。無論對內和對外他們向來是立足於思想的堅確性之上，而有所主張，有所批判，並有所提倡的。每當發表一種臨時方針的時候，他們便立即以鮮明的思想的基調為襯托，每當着手草擬一種行動的計劃的時候，便毅然堅持其思想的態度，這一種特異的延安的性格，在今日和美國通好的情形之下，由於延安路線的變更的結果便完全地喪失了。

在今日延安亦踏上了政治的物質主義的舊轍，這樣他們的主張與說明今後將自然地一變而為機械化了，一旦延安遇到了需要思想批判的事態，試問彼時延安又將何以自解？思想上的混亂與思想能力的削弱，這對於延安正是一個致命罅隙。

在權力機構的壓力之下，由物理上說，縱然猶能維持黨的生命之存續，可是這總究已成爲昨日的勢力。像這種具有遊離思想型態的舊勢力正是延安最最輕蔑而痛惡的，可是在今日，延安竟會自暴自棄地走上這同一的類型，那麼離他悲劇到來的時光恐已爲期不遠了罷。

作為延安思想之貧困的第二個形態，便是黨內部少數派的產生。

在這裏使我們看到了具備鬥爭的深刻性與迫力的反幹部勢力的結合。

從來在延安勢力的內部即潛在着幾個對立的因素，如蘇聯倚存主義者與民族自力主義者的對立，對重慶合作派與反抗重慶派的對立等等，這是其中之瑩瑩大者，再有主張思想之純粹化的少數派與黨主腦部間的對立，該是其中最為嚴重而尖銳的一個對立因素。且由於這一對立而不可免地又枝生出另外二個新的對立來，其一為堅持依賴美國的首腦部派與主張排斥美國者的對立，其二為尊重與重慶政權合作的首腦部派同反對此一行動者的對立。

現在這幾條對立線呈現着一種錯綜複雜的樣相，同時各種局部勢力亦相互離合靡常，最後馴至不可收拾的事態之突發，要亦為意想中的事。

其次黨本身的混亂以及急速地朝分散化途上走去的傾向，則為證明延想思想之貧困的第三個形態。這三個形態也就是將陷延它勢力於絕命悲劇的一個險惡的病症狀。

當然，剛纔所說的同時也在預料中的這三個形態，其過程決不是轉瞬即可形諸事實的。二十餘年來在惡戰苦鬥下磨鍊其生命力的延安政權，當臨到這一危殆的過程的時候，或許反會發揮它的堅韌性也未可知，這是我們不可不考慮到的一點，可是命運的方向業已確定，無論你怎樣企圖彌補現實上每一個錯誤，延安總究已成為美國併吞中國所佈下的羅網中的一條大魚了。事實上既陷入思想之混迷中的延安，即欲自拔又烏乎可得？

與重慶美國人化的民主主義大同小異的延安新民主主義之思想，它到底會不會成爲沒落中的重寶之道伴，而投奔作爲德謨克拉西之宗家的美國制霸的卵翼下，這就中華民族的前途言，實在是一個最最危殆的境界。

### 三 世界變革下的延安

誠如以上所說的一般，今日延安之思想水準處於世界變革的漩渦中，除了自身暴露其弱點以外，已無更好掩飾的方法。眼前的世界變局愈益向前推動演進，延安本身力量的界限以及與此偕來的思想的障礙兩者間的矛盾衝突便無可免。

所以延安今後縱然極力企圖避免這種困難，然而這難局事實上早已在它命運中註定的了。

原來促使延安思想之動搖的一個更大的時代要因，乃是由於世界戰時的嚴重化及其影響所促成的世界史之急轉劇變，於是而使延安思想的動搖更爲深刻而擴大。然則所謂世界的變動在目前是顯示了它怎樣的歸趨呢？對於這樣重大的課題，在今日如僅以延安思想的眼光去觀察，它早已昧於這一情勢而無力透視了。

關於這一點，延安對數年來世界動向的批判，業已顯出了它無數謬誤與偏見，祇要根據這一點我們即得以窺悉延安思想的誤綜與迷亂。試以歐洲戰爭開始以來延安方面代表的言論爲例，無論就延安對英國軍事命運觀察的錯錯說，或就延安對日本總力戰體制分析判

斷的不正確和幼稚說，這都足以證明延安之思想的觀察是何等地淺薄與脆弱。

延安對美國的參戰，特別對於美國和日本的作戰，向以極肯定的口吻加以謳歌頌讚的。可是一當提及美國戰爭目的之時候，延安又為什麼默不應聲了呢？像諸如此類具體的事例，在太平洋與大陸兩戰線四年來的記錄中，我們是可以很清楚地一一列舉出來的。這一切的一切都足為檢定延安思想能力的試驗答案。復就德美的關係說，延安對兩國本質的優劣根本不置一詞，一味以美國為友，而認德國為敵。像這樣的說法實際上是完全脫離了思想的基本調，僅作政略的主張罷了。這是感情上的議論，向以思想的政治勢力為標榜的延安態度，竟能容許這種無意義的反復於感情上的言論之存在，寧非咄咄怪事。

抑延安之思想，係並非基於任何崇高目的或遠大任務所構成者，在世界史的規模上，迄今未獲磨練的機會。延安自其誕生以來，雖努力倣效共產主義觀念的世界思潮，可是直至目前為止，却仍未能創造一種作為世界政策的獨特之思想。

現時之世界動亂，畢竟是以思想革命為其本質的。唯其如此，故過程之推移是出以一種深奧無涯的長期戰之形態的，僅憑一切既成認識殊不足以言理解，此實可稱為超歷史的事態。

這一世界激亂之姿態，無論交戰各國各民族企圖用怎樣方法或目的奮鬥前進，但事實上它決不能踏出歷史替你安排好的那條道路，這道路和他主觀上以及在希望中想走的另一條道路是大大地有其距離的。譬如以八絃一字之大義說，不管各國在主觀上如何否定，但

結局這一理法總將無損其令譽，世界的動向亦一如此所舉之例，它自有其應行趨向之行程，個別的主觀是不能影響它的步驟的。

所以任何國家任何政黨，爲了應付這一個現世界，它們必須一律地超越既成思想，而準備創造獨自的理念不可。

能夠達觀，洞察，並把握世界史之動向的人，這才是思想之力，處今日之世，思想之力的重要實爲向所未有，可是在這樣的時代中，自誇其思着威力的延安却反彷徨於思想的沒落，這對於延安該是一種怎樣森嚴的審判呢？總之，延安的力量對這樣廣大的世界問題暴露其無力之時，那麼它的沒落便已宿命地的決定其爲無可倖免的了。

回顧既往二十年，延安是那樣地刻苦奮鬥過來，它與舊軍閥鬥，與土豪劣紳鬥，又與商業資本鬥，與國民黨鬥，更須與潛存民心的低劣的陋習鬥。以此苦磨練成得有今日之成就，並奠定了它將來飛躍的地盤。可是在這期間世界的動向是廣大猛進的，人類亦由於這未曾經歷的大戰而一洗舊世界的一切，延安對於此項新的情勢與環境之到來，却未能以其新的思想去相應。所以延安的思想縱然是芳烈的，然而那也祇不過僅能指導既往鬥爭過程中的一切思想與行動罷了。雖然它可以在無辦法中去依存蘇聯的思想，不過蘇聯本身也在隨時發揮其思想的尖銳性，蓋歷史的波濤是有其大大的曲折的。

這樣，延安已確確實地陷於茫然自失的狀態中了。這就延安說，它之踏入這種根本動搖的地步委實是一件非可意想的事。試問，今後延安將以何種思想去對東亞的弱小民族

說教呢？今日延安在手中所能取得出的思想，除了莫斯科式的民族理論以外又有什麼呢？恐怕所能給我們聽到的祇是一些打倒獨裁政治，從帝國主義的侵略下解放出來等等公式的標語口號罷。此外便無足傾聽的價值了。在大東亞戰爭未發生以前，這固然無可批駁，可是時代到了今日，使弱小民族能各安其所的大理想已在戰雲下顯露其真面目了，這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認的罷。

延安未能養成足以理解這種新事態的思想之貫穿力，然則它在這裏將以茫然的姿態目送今後新情勢的推移呢？抑將以其既成的公式的用語臚列空虛的批評論呢？這在延安亦將自感技窮罷。

更有必須留意者一點，在延安負有直接任務的中國本身問題中，延安思想的動搖，今後將愈益暴露其無力與弱點罷。世界戰爭的烈火疾風給予中華民族的心氣以新的激動，這一思想的飛沫亦將遙遠地散亂於延安的腦膜上罷。

#### 四 站在民族的「批判能力」前之延安

呈現於世界史前的延安思想之缺點，這是中國有識的民衆層所應深切留意的當面最主要的課題。

蓋延安思想的貧困，在下列二點上實暗示了中華民族的不幸。其一爲迄今依然僭以民族的領導權自居的延安錯誤的自負心理，其二則爲在這一自負心理之下，使中國四萬萬人

民難逃生靈塗炭之苦的這種不可救藥的延安的迷惘與失態。此次延安與美國作野合式的通好，或可謂即係其初期的表現。在這樣同一的理由之下，更難保延安不會演出把將來的中華民族作爲向蘇聯進貢的一齣狂態。

昔時清朝喪失了爲民族後憂設想的至誠，竟恩不可及地作引狼入室之舉，迎來了歐美帝國主義，在這短見識下最後終於播下了中國在今日世界史上的悲劇。現在延安大有第二清朝之可慮，說不定它會把中國再度投向地獄。延安的這種作風它不但違背了孫先生革命的遺囑，同時也爲整個中華民族的慘劇。

本來，作爲中國防衛帝國主義侵略之唯一急進黨的延安，它在多年來的苦鬥中鍛鍊成長，不斷地堅持着嚴峻的自我批判，具有一種能辨別自身所在環境之是非的感官，從而它也在研究着怎樣處理當前中國問題的新方法，不過無論它怎樣做，如上面所既述者，一以固有思着的貧困，二以思想之世界性的缺乏，換言之，在今日延安的利己主義已急急踏上了它老成硬化的階段，自今以後它已失掉了思想上變革的伸縮性。

因此，延安的姿意與行爲，不但在全民族的立場上決不容許其存在，並且中國爲求今後的自存與繁榮起見，它必須迅速地建立一種能芟除延安思想之禍根的力量。在這一意義底下，中國在目前歷史的立場上，恰好是站於一個重大的關頭。

然而什麼又是驅逐延安思想禍因的方法呢？對於這一責任自然已不是既成政權或地方軍閥等一般舊勢力所能負擔得了的，老實說這若不能傾舉全中華民族四萬萬人民的總力量

便不足以言成功。

按中華民族自事變以來，在既往八年中由物質上說有廣袤的領土之破壞荒廢，在精神上說則全面地曠盡了有史以來的艱難與辛苦，馴至一時幾有四千年光榮歷史毀於一旦的隱憂。可是強韌無比的中華民族之潛力，從慘澹的社會經濟的廢墟中，一若物理上草木之得大自然春日的恩惠而重生然，苦難地歷盡了民族生長之奧義，現在終於異常地產生了邁進的覺醒。

中國民衆經歷了近年來民族的苦難之行程，如何以培養民族意識，如何去獲得今後飛躍的條件，從而發揚並擴張其包藏着的豐富的民族的潛力，關於這一問題在這裏暫且省略不提，現在我們所要說到的，却是對於尚在「未成」中的國民革命，如何能善用這一種力量，以達到「完遂」的宿願這一件事。

中國民族發展之歷史，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轉機，開始走上了正軌，而中日事變與大東亞戰爭在規模或構想上實較之具有數十倍重大的意義，在這一過程中所給中國全面的激動以及那裏培養出來的益趨深刻的民族意識的發展，這在世界民族史上說，確為劃時代一頁。

所以事實上中國業已越過了「國民革命」的階段，民族的覺醒現在正將進入第二期的階級，此即中國新民族主義的成立過程。當然，中國新民族主義的出現，目前尚未至具體的形態，可是基於客觀事態的大勢下

的民族精神之發揚，對重慶的思想水準固不待言，即對延安的思想亦遠為超越而過之，並在隨時準備一種更高更深的思想標準而為重慶與延安的力量所絕對不能到的。雖然從表面的加以觀察，荒蕪的中國何處有此新的事象可見呢？可是那一種氣運却正在醞釀之中，而推動着重建中國的行程，外觀上呈露着荒蕪的中國之現狀，實際則為開展了民族有史以來之激鬥場面的一種現象形態。所以已故的 汪精衛先生過去曾對某一清鄉工作地區的領導者發表談話，他說清鄉工作便是一種革命，清鄉地區也即是促使民衆意識發揚至無限的一個試驗的場所。

延安在這裏無可聲辯地顯得它的無力了，如果想以既成的觀念形式地去包攬的話，却祇有促進其思想上的幻滅罷了。

所以在不知不覺中發育成長的民族意識，它跨越了延安的思想，而向着高遠的空間探求着它在未知世界中的新途徑，並企圖在這求之不得的苦鬥中燃點其發揚的火種，這正是民族先進層的所作爲的，同時在這裏我們也發現了以新民族主義爲宗旨而形成的第三種勢力的抬頭。

中國的新民族主義，它脫却一切舊的軀壳，而獲得一種新的民族「批判能力」，對過去存在於中國的和不合理及缺陷，相互糾纏着的政治，經濟，軍事等諸舊體制以一種無言的威力誘導其向變更之途前進，這正是中國爲求革新的生存而併力發揮其野生的生命力的一種姿態，一個民族的偉大性，唯有當它於獲得這一批判力量之後，才最能野生地表現它

所具有的潛力。

延安目前正站在這一批判能力之前，縱然中國的知識階級並沒有急性和一致傾筆討論這一件事，縱然民衆們沒有直接大聲地辯論這一件事，縱然在其他抗戰和平兩區域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分野中，尙無任何確定的各黨各派民衆團體的成立與結合，甚至上自政府要人下迄車夫苦力者流，均可不問其思想之有無，凡屬在八年之戰亂中經歷過來人，都已不分男女老幼合四萬萬顆民心爲一顆心，他們不但明知「自己」，同時也理解了「民族」，蓋在這裏是有其民族意識向無限擴大與深刻化途上行去的社會之波紋的。所以在鬥爭中的中國民族，一堆堆的亂瓦與廢墟毋寧說是其最大的代價，用這一個代價它換來了世界罕有的民族意識之寶庫。

延安所以能在這一嚴格的批判能力下得到估價的，其主要的原因自由於這一思想的力量。現在進一步投到批判之網裏來的東西，乃是延安能否領導明日中國的根本問題，延安現在已處於被民族的新批判能力必須加以根本的檢討的立場中了，也唯有這一向延安投過去的全民族的批判，才是中國準備明日之發展所應有的擴大其自身的一條血路，同時又不僅延安如此，且亦爲拯救重慶，並革新和平政權，而以此使整個中國能得到真正新生的唯一最高的方法論，也唯有這樣才能完成澈底諒解大義日本之真諦的這一個卓絕的民族的悲願。

這樣，在東亞的再建過程中，凡有違反這一中國民族批判勢力的東西，將統統地趨於

滅亡，而能在這一潮流中順水而下的則必將發榮滋長。所以中華民族的前途，在世界今後的史頁上，成爲一般所必須考慮的最大之課題者，蓋有其以上所述之深長意義在。



## 後記

中國共產黨自一九二〇年成立以迄今日，在不滿三十年的進程中，能由少數人的結合，發展成今日中國第二大政黨，甚且掌握了與重慶、南京鼎足而三的三分中國之一的政權，其成長的迅速與活躍，實不能不令人感覺驚異。現在姑且撇開中共所依據的理論，政綱及其策略與陰謀不談，對於二十餘年來中共所經歷的驚風駭浪波濤起伏的種種苦鬥的過程，在二十餘年來的中國政治大局上，以至整個遠東與全世界的局面中，曾引起幾多具有歷史意義的決定作用與影響，又不得不令吾人未能輕視其存在與發展的前途。

十多年前，作者自在中學讀書的時代開始，當時正當中央軍開始圍剿江西紅軍之際，對於中共的活動動態，即發生了極深的興趣。同時因為有不少小學及中學時代的同學與師長，尤其是有很好感情的美芝，先後因共產黨的嫌疑，或已證實為共產黨員，而遭當局所逮捕，有的甚至後況不明了，使我當時除了萬分感傷之外，對於共產黨的地下活動，更引起了種莫名的神祕和好奇的心理。一九三七年二月即在高中畢業後一年，我自費到了日本去繼續求學，當時住在東京早稻田大學附近一家「下宿」裏，結識了一位同住的留東同學鄭君，後來我知道他是一位共產黨員，因在國內被通緝，不能立足，所以遠逃到東京來讀書，實在無甯說是「避難」。他的經濟情況很窘，從國內根本沒有接濟，又沒有親戚，即有也早斷了關係，除了黨的同志外，恐怕也很少朋友。他比我先來東京早上一年，我不

知道他的生活是用怎樣的方法來維持的，他名義上在明治大學讀書，但實際平日極少上課，常常餓着肚子關起房門在房間裏自修看書。有錢的時候，則一連上小館子大吃幾頓，聽說他還不時光臨東京龜戶，新宿那些三四等地方去逛妓女，身上有了病也不醫治。後來我和他處得比較熟了，他就常常和我高談馬克斯的理論和中國革命應走的路線等等大問題，娓娓不倦。他的談論，並非膚淺皮毛之見，很富於學識根底。我在這裏所特別寫出有關他的一段記事，就是我在學識上受了他的惠益很多，至少我現在不至被人譏爲是盲目的反共主義者，或是感情的反共份子，都是他授予我一部份有關共產主義理論的知識，同時因和他的結交，使我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黨人之活動的研究興趣，更進了一層。

後來「七七」中日事變爆發，我就回了國，在上海進了聖約翰大學繼續讀書。在上海四五五年，我先後搜集了不少有關中國共產黨過去活動概況的資料，打算編一本中共內幕的書。那些搜集到的資料中，有一部份是極可珍貴的中共祕密文件。可惜於三年前在京滬車上，和一件行李一同失竊了。當時真使我懊喪萬分，快快不快者數月之久，因爲我搜集和攜帶那些資料，曾費了相當的心血。尤其在當時的環境下，還是一樁帶有危險性的事的。

最近又陸續收集到一些有關中共動態的資料，因再度發願寫成此書，其中有關中共發展的史料部份，則是根據大塚令三氏所著「中國共產黨黨史」一書，因是轉譯的關係，其中關於所引文告文件之處，和原文一定不免大有出入，尤恐不免錯誤，這是必須特別聲明的。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初版

中國共產黨內幕

每冊實價國幣壹仟元

著者李紹忠

發行者中國青年社

印刷者中華印刷所

南京大方巷口

總經售智識書局

南京復興路六〇號

分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第五縱隊

英國祕密情報局

美國戰時情報局

斯太林與「格匹烏」

德國間諜祕話

幾個著名的女間諜

李紹忠著

(幕內報情際國)

(本版再)

目要